

政見
合辑·二〇一三年春

轮值主编: 宿 亮

本期设计: 钱争予

观察员:

陈 磊	陈仲伟	方可成	傅若兰
归 宿	励 轩	刘含章	刘 冉
刘岩川	马 军	缪 莹	邵 立
宿 亮	陶 郁	王 韬	王 馨
汪吕杰	吴 瑶	杨鸣宇	于灵歌
袁 林	袁幼林	张跃然	周 航

制图师:

卜书剑	龚方舟	黄俊如	黄雷蕾
焦佳文	吕 妍	钱争予	苏颢云
魏天瑶	姚 辰	张韧刚	

新媒体运营:

赵蒙晔	江舟忆	操傲文	李大岩
-----	-----	-----	-----

如何理解中国政治

关于政见

面对这样一个古老、庞大而复杂的国家，从官员到农民，从时评人到的哥，似乎人人都可以评头论足一番；但是，似乎又没有人能真正将它弄明白、说清楚。

如此复杂的中国政治，并没有令人们丧失求知欲和讨论欲。每天，在报纸电视上，在聊天室、微博客上，充斥着令人目不暇接的信息和似乎永无止境的争吵。

这些信息和争吵耗去了人们许多时间。然而，如果仅仅依赖大众传媒和社交网络，你无法获得太多关于中国政治的洞见——它们都太局限了。

你需要接触更聪明的头脑，吸取更靠谱的思想资源

政见希望带给你的就是这样的资源。我们的团队由海内外政治学研究和国内一线时政记者组成，秉持专业、独立、理性的原则，跟踪阅读学术界对中国政治的最新研究，从中挑选出最具价

值的部分，以“专业性、趣味性、信息量”的写作风格呈现给你。

我们并不认为来自学界的研究成果就可以成为你理解中国政治的全部资源。但至少，比起大众传媒提供的快餐，比起社交网络上那些泛着情绪化泡沫的争吵，学界的研究有着严格的学术规范，基于丰富的研究材料，经过了理性的逻辑推演，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接近真相，提供更具解释力的观点——总之，是更值得你参考的对象。

政治，也可以很有趣

基于这样的理念，我们建立了政见。我们不是资料中转网站，没有海量的原文照登；我们也不是译者社区网站，一般不提供全文翻译。但我们会选择最具价值、最富启发性的观点进行介绍和评述，这更能节省你的宝贵时间。

更重要的是，我们引介的思想资源，大部分都是在大众传媒上无法见到的。它们呆在仅有专业人士才经常问津的学术期刊、报告、会议中，普通公众鲜有机会接触。然而，这些思想资源并不枯燥，它们往往是鲜活的、智慧的、令人茅塞顿开的。

政见

合辑·二〇一三年春

生活中的政治学——编者的话 1

政见专题——逝者 4

包瑞嘉：难安于象牙塔内的中国观察家 5

华安澜：中国问题的现实主义研究者 10

唐耐心：两岸人民的真朋友 15

邓正来：“批判是学者介入时代的最好姿态” 19

政见对策 23

微博里的民意“战争”：政府不占优势 24

审判委员会制度成为法官逃避责任的渠道	27
背景和经济才干是否影响干部选拔?	34
哪些因素决定党内民主的程度	38
低保分配背后的城市管理逻辑	42
两岸交流未令台湾民众更亲近大陆	46
政见专题——两会	49
两会究竟是什么	50
地方债务危机的政治制度根源	51
人民代表大会到底有没监督作用?	56
政府机构改革的内在逻辑	59
政见经济	63
铁路市场化会有什么影响?	64
铁路民营化的日本经验	70
“国进民退”:以民航业为例	74
国企由谁掌控?	79
新加坡学者:土地私有化对农民有害无利	83
老板当人大代表,企业利润更高	88
政见外交	91
“天下”取代“主权”:中国化的国际关系理论?	92

朝核危机中的中国：从被动到主动	96
中国领导层和精英对“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反应	99
中美关系重新启航？	102
习近平首访光环下的中俄关系：内涵丰富，但问题多多	106
中印竞争的影响已经“溢出”至他国	110
中国已成“中亚帝国”？	114
中英“人质外交”往事	118
经济与战争：1970年代末的中越经济博弈	123
1969年中苏美三方关系之变：一场机缘巧合？	128
政见社会	133
传统淡化？当下中国的婚姻和性观念	134
购物的政治：为什么中国人喜欢“抵制 X 货”	138
中国高等教育面临五大挑战	142
钱并不必然让国人幸福	146
政见对话	150
吴介民：海峡两岸的民主改革和公民社会	151
政见视图	179
十八大贺电背后的政党外交	180
图解中国官员级别	182

政见阅读	183
政见书情	184
政见专题——政好读书	207
政好读书	208
加入我们	227

生活中的政治学

编者的话

春天，姗姗来迟，又似白驹过隙。

清明，济南的春雨欲至不至。书桌前坐下，准备新一期《政见·合辑》，案头一本《Hidden Order: The Economics of Everyday Life》吸引眼球。戴维·弗里德曼说：“经济学不需要借助任何花哨的技巧，其本身足以娱人心智，令我们乐而忘返……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人类是理性的’这一假设为前提，由此，我们开始去征服这个世界……”

政治学似乎亦可套用这样的描述，而《政见·合辑》希望能够帮助大家“以理性”为前提、开始理解周围的世界。

2013年春来冬去的日子里，中国和周边的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年初，北京因为持续不散的雾霾天气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南方的城市上海则因为漂浮着的猪成为记者和官员绕不清楚的话题。“两会”上，讨论多年的铁道部门改革最终变成现实；“两会”后，“国五条”细则出台，买房人“只争朝夕”。

空气、猪肉、铁路和房子，每一项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事实上,追根溯源,“政治”这个词的本源指的就是雅典卫城的城垛,是保卫老百姓每天生活的必需品。

数夜前,编者在秦岭山中遇到一名山村小学校长。他按规定上半学期上报学生数量,领取国家补贴的课间蛋奶。下半学期,一些学生转学,多出不少份蛋奶,校长把蛋奶分给学校里的教师。事情很快被告发,引得轩然大波。

按照媒体的话说,这所学校总计“套用”蛋奶补贴300多元人民币。

这位校长说,蛋奶私分一事是学校十几位教师开会得出的结论,当时没有人反对。教师们也按照规定上缴扣除补贴费用之外的蛋奶成本。就为什么不在下半学期按规定向主管部门报减,这位校长有些委屈。他说,报减容易报增难,一旦数量减下来了,再有需要增加的时候就难获批准。

这件事情本身不复杂,却也体现不少问题。在基层管理中,政府的政策应该怎样落实才能确保有效?执行机构在多大程度上具备灵活处理的权限和能力?贯彻政策的行政人员究竟应当严格依照规定办事,还是合理运用“人治”?

政治学研究的不是步步惊心,也不是甄嬛传,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

如果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中国,如何看待自己的“战略机遇期”,又将如何自处?这种关心并非“屠龙之术”,它关系到每天开哪个国家出产的汽车,关系到手中股票、

货币的涨跌,关系那些国外的成功经验、失败教训能否改变国内的生活。

换句话说,读《政见》,见到得是政治学研究成果,关心得却是日常生活。

新的一期《政见·合辑》集中的2013年第一季度33篇文章、1篇访谈、3张信息图以及按照惯例向读者推荐的图书,讲述的其实都是“生活中的政治学”。政见观察员们关注微博、低保、国企、铁路和土地,关注中外关系、国际环境,关注婚姻、教育和社会,从每一天的生活中需找那些值得留意的政治话题。

正如编者先前制作合辑时所言,我本身并没有奢望,不指望读这本合辑能够给读者带来什么太大的价值或改变。从编者角度看,“政见”希望成为摆在读者案头的一个闹钟,就那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东西,发出小小的提醒。

作为一个志愿者团队,发展中的“政见”渴望获得大家的批评、鼓励和支持,始终期待来自读者的建议与批评。能够在读者浏览器的收藏中看到 CNPolitics.org、在读者邮箱中看到 Webmaster@CNPolitics.org,是我们最大的荣幸。

宿亮

2013年4月5日于济南

政见专题——逝者

2012年至2013年的冬天里,一些学者离开了我们,但他们思想和成果依旧停留在文章中、著作中、“政见”网站上。诚如“政见”团队的介绍,我们“向你介绍世界上最聪明的脑袋是怎样分析中国的”,而这些学者的离世,对于中国问题研究都是最大的损失。于是,在冬去春来的时候,我们开辟这样的一个专题,向离开我们的那些学者致敬,重温他们的思想,记下他们的观点。

包瑞嘉：难安于象牙塔内的中国观察家

包瑞嘉研究的中心问题始终围绕着毛时期与后毛时期中国政治体制与运作的变革。他 1994 年出版的《埋葬毛：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政治》在今天仍被认为是研究后毛泽东时代中国高层政治生态与现象的权威著作。

刘含章

2012 年 12 月 14 日，美国著名政治学学者、中国问题权威专家包瑞嘉（Richard Baum）在与癌症抗争数年后，在美国加州的家中离开人世，享年 72 岁。作为中美建交后涌现出的第一代中国政治研究代表人物，包瑞嘉的离开可以说是该领域极其沉痛的损失。

包瑞嘉 1940 年在洛杉矶出生，本科就读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主修政治学。大四时为了完成专业要求而选修了一门中国政治课程，从此迷恋上了中国这个对当时的美国人来说既古老又神秘的国家。包瑞嘉随后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攻读政治学博士，完成学业后回到母校 UCLA 任教长达 44 年，直至去世。

在 UCLA 期间,包瑞嘉曾任该校中国研究中心(UCL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主任,并长期支持邻近的南加州大学中美学院(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S.-China Institute)的学术活动。作为中国问题研究的带头人,包瑞嘉长期在多份学术期刊编委会任职,包括 China Quarterly, China Information, Asian Survey,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等。

在他四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包瑞嘉主持研究课题逾 50 项,撰写学术专著五本,其中《革命的前奏》与《埋葬毛》被公认为研究毛时期与邓时期中国高层政治运作的权威著作。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前后成长起来的中国问题学者,他的研究承袭了汉学研究的广袤深厚,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深刻见解,并同时注重从政治学理论角度出发,缜密分析中国实际问题。

包瑞嘉的学术生涯伴随并见证了中国的巨大变化,研究兴趣亦十分广泛,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古代中国的国家起源、台湾的特性、及中国的信息革命等。但他研究的中心问题始终围绕着毛时期与后毛时期中国政治体制与运作的变革。

包瑞嘉以治学严谨著称,力求凡论断必有出处与根据。即使在关于中国的信息极度匮乏的六七十年代,也不凭个人直觉下判断。他曾开玩笑说自己是“注释大师”,仅《埋葬毛》一书就有脚注四百多条,详细阐述和记录了任何一个细节或判断的依凭。对第一手材料的渴望与追求让包瑞嘉在这个并不大的学术圈里时常显得特立独行,充满冒险精神。

1967年，还是博士生的包瑞嘉在台北学习中文，课余时间接触到当时台湾情报工作单位获得的一系列中共党内机密文件。通过“借阅”这些文件并加以研读分析，包瑞嘉断言中共党内高层1962至1965年在“四清”运动的路线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毛泽东主张将这次运动发展成阶级斗争，而刘少奇与邓小平则希望运动的焦点集中在查办官员贪腐上。包认为这次分歧为之后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在此基础上，包瑞嘉1975年出版了《革命的前奏：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与农民问题》(Prelude to Revolution: Mao, the Party and the Peasant Question)，当即在学术界引起震动。在有关中国的信息极端闭塞的情况下，包瑞嘉积极大胆寻找原始文件，通过对文本的深入分析，归纳和探讨了包括政治动员手段、官僚制度运作、政治及行政决策等一系列中国政治体制运行的议题。这种研究方法在当时的中国问题研究领域中是前所未有的。

包瑞嘉的另一部代表作是1994年出版的《埋葬毛：邓小平时代的政治》(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这本书在今天仍被认为是研究后毛泽东时代中国高层政治生态与现象的权威著作。在该书中，包瑞嘉详细记录和分析了1976至1993年中国改革的进程，就这一时期的施政特点提出了“收放”周期的观点。所谓“收放”周期，是指中央的政策导向在自由与保守之间的不断反复，在改革的多个方面皆有体现，如宏观经济的掌控、言论自由的边界等。不同于其他学者，包瑞嘉认为“收放”周期不是西方传统中意识形态的左右之争，而是中

国特有的权利集中与下放的上下之别。“收放”周期的产生和持续,也不是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单纯的党内派系角力的结果,而是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体现,包括与改革不相协调的政策所引起的湍流、外源性因素(如波兰的团结工联运动)、领导危机、世代交替等。

包瑞嘉同时强调邓小平个人在改革决策中扮演的关键角色,认为邓的改革彻底埋没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但却没能建立一套系统的政治结构来确保他的改革路线在他离开后仍会被不遗余力地推行。在将近二十年后的今天,这本书的内容与结论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包瑞嘉作为一名杰出的学者,长期应邀为美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提供咨询,从不避讳提出与他人不同的见解。他一生来华四十多次,早在中美建交之前的1975年,就曾作为美国田径队的陪同学者第一次到访中国,并见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

包瑞嘉对中国问题研究的贡献不仅局限与他的个人学术成果,也来自与他对中国观察圈的积极建设。他创建的在线讨论群 ChinaPol 已成为中国观察最迅捷、最前沿、最权威的信息来源。ChinaPol 是一个只对成员开放的讨论群,目前成员有1300多人,来自学术界、媒体、政策界等,皆是受邀或获得批准后才加入的。包瑞嘉在群里被其他成员亲切地称为“包主席”,而进入 ChinaPol 几乎可以说是所有中国观察家们的目标与梦想。

包瑞嘉的一生为中国问题研究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无论是他

早期的史料研究,还是后期的观察分析,都将成为中国研究的宝贵材料。

华安澜：中国问题的现实主义研究者

《为什么是台湾？中国领土完整的地缘战略理由》一书是华安澜多年研究台湾问题成果的集中体现，这本书的关键点十分明确：台湾问题之所以无法脱离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等全球和地区性问题存在，原因就在于多方都希望介入中国周边海域谋求战略利益，引发战略性竞争。

宿亮

2012年6月21日，饱受胰腺癌折磨的美国塔夫斯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副教授华安澜（Alan M. Wachman）离开人世。对于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而言，年仅53岁的华安澜离世是一项不幸的损失。

华安澜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本科学习的是艺术学，随后就读政府管理学专业，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同时，他还在塔夫斯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获得法律外交学（M.A.L.D.）硕士学位。

在塔夫斯大学执教期间，华安澜担任国际政治学副教授，讲授中国外交相关议题。作为一名重视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学者，华

安澜在教学和著作论述中强调外交历史与当代国际安全的联系。在当代美国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研究普遍重视量化研究的今天，他坚持传统分析方法，以宏观历史大战略的眼光看待国际问题。其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述带有强烈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研究风格。

来到塔夫斯大学之前，华安澜曾于1993年至1995年出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和南京大学联合组建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美方主任；1995年至1997年担任美国纽约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主席。其教育、工作经历与中国研究、亚洲研究紧密相关。

与同行相比，华安澜学术成果数量算不上多，但分量不低。华安澜在国际学术界发表的文章多关注亚洲和中国。同时，他还是学术期刊《亚洲政策》（Asia Policy）、《中国安全》（China Security）的编委会成员。华安澜曾经获得史密斯·理查德森基金会、蒋经国基金会、东西方研究中心的资助，并有机会在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等学术机构接触一手资料，从事研究。

去世前，华安澜正在写作一本关于蒙古国家安全战略的著作，但没有机会完成这本书。他已出版的著作包括《为什么是台湾？中国领土完整的地缘战略理由》和1994年出版的早期研究成果——《台湾：国家意识与民主化》。

其中，《为什么是台湾？中国领土完整的地缘战略理由》一书是华安澜多年研究台湾问题成果的集中体现，也是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翘楚之作。这本书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

与其他对台湾问题就事论事的分析不同,本书的亮点在于其使用的方法论,把历史研究和战略研究相结合,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最台海问题作出现实主义的分析。这本书本身就是一本完整的台湾问题教科书,遗憾的是,作者已经无法在第一版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订。

华安澜这本书的关键点十分明确:台湾问题之所以无法脱离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等全球和地区性问题存在,原因就在于多方都希望介入中国周边海域谋求战略利益,引发战略性竞争。只要台湾岛还被中国潜在的竞争对手环伺,中国就不可能在台湾问题上放松神经。两岸统一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国力昌盛和提升国际形象力的必须。

在这一关键点之下,华安澜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政府不惜一战,不放弃武力手段。华安澜把分析的起点放在17世纪,中国自明清开始不断调整海防政策,对海洋的疏离最终导致失去重要的战略“桥头堡”台湾,这也成为中国备受列强凌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精神地图”的关键组成部分。但直到1942年以降,国共两党才真正重视台湾岛的地位和作用。

新中国成立头三十年,政府奉行的是“解放台湾”的政策,希望以武力完成祖国统一。从1979年中美建交开始,中国政府推出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政策,并努力吸引台商,通过贸易促进两岸联系,缓和两岸关系。但1993年后,随着李登辉在“台独”道路上越走越远,以及民进党上台执政,两岸关系逐步紧张。华

安澜认定，1995年李登辉访美是“压迫两岸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之后中国不断提升军力，并释放外交和政治信号，全力阻止海峡对岸的台独企图。

在华安澜眼中，冷战后的中国是逐渐崛起和建设中的世界性强国，台湾则是这个强国在军事、贸易以及国家战略问题上不可获取的重要环节。对长期的经济、政治和安全而言，台湾的地缘位置和价值至关重要。

在《为什么是台湾?》一书中，华安澜大量援引了中国学者的研究，与传统台湾问题研究中这一领域资料的欠缺不同。也正是通过对中西方学者研究的比较分析，本书具备了其他研究者所不及的优势。美国《政治学季刊》谈及这本书时表示，在台湾问题的研究中，华安澜所作的研究是“最具说服力的”。

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华安澜经常参加各类学术活动。他于2008年至2009年期间加入“东亚和平、治理和发展”项目，在北京、首尔和东京多处学术机构讲学。学术研究生涯中，华安澜还曾经在南京、台北、台中等地长期居住，进行实地教学和调研。

与其他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类似，华安澜常常接受国内外媒体采访。2007年台湾当局“正名”闹剧、2010年海峡两岸签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期间，华安澜的相关评论和分析都受到了媒体和美国政策制定方面的关注和重视。

在美国，学者往往不局限于自己的领域，比如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奈就是写小说的一把好手，而华安澜在艺术领域的

造诣也在学界和朋友圈中“小有名气”。去世后,华安澜的家人根据遗嘱,在他任职的弗莱彻学院设立了纪念基金,资助致力于在国际非盈利组织中工作的学生。

唐耐心：两岸人民的真朋友

唐耐心的职业经历使她得以充分接触第一手的机密信息，并令她的学术研究得以与现实关照相结合。她是美国最权威的中国外交问题专家之一。

张友谊 / 特约观察员

2012年12月1日，著名两岸问题专家、乔治城大学历史系教授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女士与世长辞，享年64岁。唐教授的去世在美国学界、华府外交圈和台湾政坛引发震荡，她的生前好友、同事和访谈对象，如前美国在台协会办事处处长包道格（Douglas Paal）、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东亚馆藏部主任林孝庭、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葛莱仪（Bonnie Glaser）、民进党主席苏贞昌等均以不同形式表达了对唐教授逝世的不舍和哀悼。

唐教授于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获得博士学位后，曾在美国国务院中国科及美国驻华大使馆服务，并曾担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主管情报整合分析的助理总监，后长期执教于乔治城大

学历史系直至逝世。上述职业经历使她充分接触第一手的机密信息,并令她的学术研究得以与现实关照相结合,使她成为美国最权威的中国外交问题专家之一。她以对史料的发掘、参照和分析见长,使美国两岸研究别开生面;同行林孝庭称“唐耐心研读史料及档案,言之有物,打破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的刻板印象,重启对华研究。”

唐教授著作等身,写过多本与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有关的书籍,包括《不确定的友谊:1945-1992年的台湾、香港与美国》、《1949年后的海峡风云实录——美—‘中’—台三边互动关系大揭秘》、《海峡谈话——美台关系以及与中国的危机》、《美—‘中’—台危机》、《中美外交密辛》,以及《危险的海峡》等。她最近一本著作,是出版于2009年的《中国威胁:1950年代的回忆、迷思与现实》。贯穿这些著作的主要政策建议是华府、北京和台北应当从历时一甲子以来的猜忌与对峙中走出,强化美台关系、稳固两岸和平、增进中美互信。

随着中国大陆的快速崛起和美国霸权的相对衰退,华府学界和政策圈近年来不断重新检视美国东亚政策、特别是在两岸关系中的角色问题,所谓“弃台论”和“对陆优先”时有抬头。特别是在2011年的诸次两岸政策辩论中,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和葛雷瑟(Charles Glaser)都主张检讨《台湾关系法》。沈大伟认为,两岸之间的游戏已经结束,台湾已无法摆脱中国大陆的掌握,美国必须早日放弃台湾。葛雷瑟则

在《外交事务》上刊发文章称：“美国应当考虑从它对台湾的承诺中后撤”，以“能消除美中之间最明显和争议性最大的冲突点，为两国今后几十年更好的关系铺平道路”。

而唐教授则每一次都坚定的站在反对弃台论的立场上。2012年10月，唐教授还与葛莱仪女士在《华盛顿季刊》(Washington Quarterly) 联名发表文章，建议奥巴马政府应加强美台关系，保持军售，避免对中国大陆姑息主义蔓延。她认为美国不仅不该放弃台湾，还要加强双方关系，否则只会造成严重后果。美国不会从弃台中获益，不会解决美中矛盾，更不会阻碍中国大陆崛起的进度。美国反而可从维持和台湾的关系中获益更多。“弃台论”不但会损害美国战略利益，也背弃美国长年推动的价值。目前为止，唐教授的观点仍然代表奥巴马政府现行两岸战略主轴，近期内也看不到重大调整的可能。

除开参与政策辩论之外，唐教授生前数年还在一直关注中美关系史和两岸关系史的研究。2009年，唐教授与老友林孝庭见面，回忆30多年前在胡佛档案馆查阅资料的诸多趣事，以及她还是研究生时在台湾访问研究的种种。今年上半年林孝庭曾与唐耐心联系，请她阅读林孝庭有关蒋介石与美台关系史的最新书稿。邵玉铭则回忆称不久之前唐教授还写信给她，提到想要研究台湾外交在1949年以后如何在孤立无援的国际环境下能够在外交上有杰出的表现，并希望再次到台湾看第一手资料。可惜斯人作古，无缘再登宝岛。

一般认为,唐教授的观点对台湾在三角格局中的艰难处境充满同情,所以称之为台湾人民的真朋友名至实归。但事实上,唐教授的诸多朋友,包括许多台湾官员在内,对于唐教授的钦佩之情并非源自她的亲台立场,而是她的材料丰富和立论持平。唐教授本人对于中国大陆的内外政策也相当关注。她在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刊载在美国每日新闻(News Day)杂志上关于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的评论。在该评论中,她认为习李改革之路充满艰难险阻。她在病中仍然仔细观察中国的种种问题,诸如贪腐横行、环境污染、社会不公、国有企业积重难返、教育问题丛生、人口老化、一胎化、医疗保险、基建豆腐渣、消费需求降低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唐教授也可以被当之无愧的称为大陆人民的真朋友和关注者。

唐教授的先生、马里兰大学教授孔华润(Warren Cohen)也是著名中美关系专家。唐氏夫妇低调平和、相互扶持,在中国问题专家中有口皆碑。唐教授生前无宗教信仰,遗体火化后不会举行葬礼。华府智库威尔逊中心宣布,将成立一个以唐耐心为名义的美国与东亚关系系列讲座,开春举行第一场讲座的同时将举办追思会。

邓正来：“批判是学者介入时代的最好姿态”

邓正来对哈耶克的解读，走出了中国社会当年对哈耶克的“一窝蜂”。他对哈耶克理论的价值做出独立的追问和反思，跳出时代语境的窠臼，探索哈氏理论的独特内容。

宿亮

偶尔拿起 2011 年第一期的《21 世纪国际评论》，封面致敬当时故去不久的史天健和蔡定剑两位学人。翻到后面，刊登着上海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邓正来教授与学者后辈参加学术活动的留影。看到这里，只剩唏嘘。

邓正来教授于 2013 年 1 月 24 日清晨离世，距离他检查出胃癌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他在世上度过的 56 年里留下太多传奇：第一个“学术个体户”、睡过地下通道的学术研究者……邓正来教授一生勤勉的治学之路就像茂盛生长的大树，经历与成果一样丰硕。

在邓正来的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引入了著名

奥地利裔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的理论。他曾经闭关五年潜心攻读哈耶克的著作，翻译了《自由秩序原理（上、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二、三卷）》、《哈耶克论文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等哈耶克著作。

同时，邓正来没有停留在翻译，而是对哈耶克的思想做出了进一步分析。他所著《自由主义社会理论：解读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哈耶克法律哲学》、《哈耶克社会理论》等一直是国内解读哈耶克思想理论的翘楚之作。

邓正来对哈耶克的解读，走出了中国社会当年对哈耶克的“一窝蜂”。他对哈耶克理论的价值做出独立的追问和反思，跳出时代语境的窠臼，探索哈氏理论的独特内容。他在《哈耶克法律哲学》一书中，认定自己“并不是一个不折不扣地坚信哈耶克思想的‘哈耶克主义者’”，但正是他的独立研究，让哈耶克理论不再是逐社会思潮好恶而动，而是体现真正价值。

诚如吴冠军在《邓正来式的哈耶克》一文中援引齐泽克做出的评价：“真正忠于一个思想家，就必须背叛他被时代所固化下来的那些教条内容，而进入其理论内部，重新拯救出该理论‘创造性的脉搏’。”

之于哈耶克，邓正来教授的研究本身就是中国社会科学治学的一个范例。他或许许多年在体制外从事研究，或许一度远离主流思想界，但他的研究方法和治学态度都是社科界的典范之一。

除了哈耶克，邓正来教授在法学、政治学、社会科学理论等方

面都有较深造诣。他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一书中认为，中国法学一直在所谓“现代化范式”支配之下，尊崇西方的法律理想图景，却缺乏以自我意识为基础的中国法学“理想图景”。这一问题不仅仅点出中国法学的命门，还涉及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化”的关键问题。邓教授还时常提出警惕西方社会科学“文化霸权”的问题，其作为中国学者的学术情怀可见一斑。

或许正是因为对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发展的忧思，邓正来还是一名积极的社会科学学术活动组织者。他主编《中国社会科学辑刊》、《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复旦政治哲学评论》、《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等学术期刊，曾在主持编辑《中国书评（季刊）》、《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2008年底，邓正来在上海复旦大学成立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这一学术机构的成立打破了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学科界限。他在院长寄语中说：“唯有建立新型的学术建制，形成“根据中国”的学术判准，我们才能在根本上超越现行体制画地为牢的学科壁垒与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学术误区。”高研院设立的几年来，学术活动频繁，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交流的重镇之一，在现有体制中做出建构新型知识生产机制的重要尝试。

邓正来曾在澳门大学、江西财经大学、贵州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担任教职，并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

学等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他认为：“带学生就像带学徒，在这种手工作坊的方式下，一代代传授下去，才是真正的传道授业。”他培养的很多学生，已成为社科学术界重要力量。而邓正来教授曾经把这种带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方法用在自己的女儿身上，让女儿在上小学时休学一年，在家中接受教育。

邓正来教授曾经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访谈，讲述从14岁开始做工、脱离学术体制18年的“学术流浪汉”经历，提出“批判是学者介入时代的最好姿态”。关于他的为人、为学，不少学界前辈有太多回忆和评价；而他本人的学术之路则定格在2013年初的上海，给人们留下太多遗憾。

法学教授贺卫方为邓正来送上了这样的悼语：“愿天堂里有哈耶克和五粮液。”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小劲的悼词则很好地概括了邓的一生：“学源西陆，道立南洋，情怀北国，于今赍志归东海，哭问何处云水有灵，存君淋漓元气？声同桴鼓，亲如手足，义兼师友，当年煮酒弹剑铗，岂知此地相逢不语，听我大泪滂沱！小劲泣挽。”

政见对策

在合辑的这一部分中，“政见”收录了6篇文章，内容关联新媒体、司法、社会管理。无论是实证研究还是定性研究，学者们都试图通过学术方式厘清种种涉及日常生活的多样关系与背后逻辑。“政见”团队并不一定同意这些学者的所有看法，但尊重他们严谨思路下得出的结论。这6篇文章所涉及的主题，远非这一版块有限篇幅所能涵盖，也非一季合辑能够讲清，但它们却可以作为我们思考的出发点。

微博里的民意“战争”：政府不占优势

如果说过去几年有科技产品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那么微博肯定榜上有名。它的出现不但使信息的实时传送和互动变得可能，而且廉价和方便。微博不单止开辟了一片新的公共舆论空间，同时也使公民和政府之间的互动形式发生了改变。如果把微博视为是一场民意表达的“战争”，政府在其中并不具有优势，甚至是处于劣势。从这个角度看，微博里的民意正在倒逼现实进行改革。

杨鸣宇

如果说过去几年有科技产品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那么微博肯定榜上有名。它的出现不但使信息的实时传送和互动变得可能，而且廉价和方便。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2012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2012年新浪微博的注册用户已经突破4亿，其中政务微博数量突破6万，比2011年增长231%。无论是最近的“表叔”、“房姐”等反腐案例，还是过去的“7·23温州动车事故”、“郭美美事件”、“钱云会案”等引发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都能够看到微博的身影。

以上的统计数据和案例说明，微博不单止开辟了一片新的公共舆论空间，同时也使公民和政府之间的互动形式发生了改变。

然而比较可惜的是,对微博问政功能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的研究亦并不多。最近,犹他州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童燕齐和博士生雷少华发表在学术期刊《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上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白。

和不少媒体和学者的观察一样,童燕齐等认为微博的现实影响力是建立在“围观”这个特有属性上。通过“围观”,公民不仅可以在微博上跟进和参与到公共事件中,而且拥有了在现实里所不具备的意见表达机会。

通过对2009至2010年间微博上发生的标志性公共事件(如“宜黄钟家强拆事件”、“李刚事件”)的梳理和分析,作者进一步把“围观”的作用细分为“汇集民意”、“实时直播”、“追讨公义”和“网络论战”几项功能。

由于微博具有开放性,无论哪一项功能均可能对政府目前垄断的意识形态和舆论表达的控制权形成挑战。这些功能可能改变公民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并构成对政府现实行为的问责压力,从而迫使政府必须采取一定的行动来维持公民对政府管治的信任。而且,政府难以像对待传统媒体那样运用事前审查等手段来进行监管。因此,童严琦认为:如果把微博视为是一场民意表达的“战争”,政府在其中并不具有优势,甚至是处于劣势。

然而,两位研究者认为,目前不应过分高估微博对现实的影响力。

他们的主要理由是: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

大多数微博用户的身份是学生。这意味着,现实中的大多数人口并未参与到网络“围观”之中。对于执政者而言,这可能是个好消息,因为这表示微博上的民意或不满不会即时转化为现实的执政压力。

但长远而言,随着人口更替的发生,这些微博用户有相当部份将转化为具有现实影响力的中产阶级。而政府只有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应对问责的能力,才可能满足这些“未来的主人翁”的需求。从这个角度看,微博里的民意正在倒逼现实进行改革。

参考文献

- Tong, Yanqi, and Shaohua Lei. 2013. “War of Position and Microblogging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2 (80): 292–311.

审判委员会制度成为法官逃避责任的渠道

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最大漏洞,在于它以“集体决策”为名,给审判委员会内外的法官无差别提供了逃避责任的通道。这一漏洞直接导致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数量激增,但讨论与决策质量十分低劣,最终使整个系统进入一种不负责任的运转状态。

张跃然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审判委员会制度”成为司法改革争论的焦点。

这是一项富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悠久的司法制度。《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或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的最高审判组织,一般由法院领导和资深法官组成。它不直接参与开庭审理案件,但会对重大或疑难案件进行讨论,合议庭必须服从其讨论结果并依此判决。

支持该制度的学者（以北京大学法学院朱苏力教授为代表）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有利于抵抗外部压力，避免司法腐败，发挥集体智慧，提升法官业务水平；而反对该制度的学者（以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为代表）则认为，这一制度与“审判公开”原则相悖，割裂了审理权与裁判权，不利于错案责任追究。然而，关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具体司法实践，公开的可供研究的数据资料一直十分有限，使得双方的观点均缺少严谨实证的学术研究的支撑。

因此，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贺欣副教授新近发表的对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实证研究很有价值。该研究的数据来自陕西某地方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 2009 年全年的会议备忘录，以及研究者对法官进行的访谈。通过定量和定性分析，该研究揭示了审判委员会的具体工作流程和司法意义。虽然这项研究基于单一案例，其结论无法简单推而广之，但无疑能为我们了解中国司法实践的一般现状提供有益的启发。

走样的审判委员会

在 2009 年，该审判委员会共开会 47 次，其中 46 次用来讨论案件，共讨论案件 430 件，平均每 20 分钟讨论一件。在所讨论的案件中，刑事案件占绝大多数，达 363 件，占该法院全年受理的刑

事案件总数的 96.8%。这些数据表明, 审判委员会在具体司法实践中, 并未真正履行“总结审判经验, 讨论重大或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的法定责任——首先, 审判委员会的开会时间基本全部用于讨论案件, 几乎从未总结审判经验或讨论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 其次, 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大部分案件并非“重大或疑难案件”, 因为根据常识可知, 重大或疑难案件不可能平均 20 分钟即可讨论完毕, 而一个基层法院所受理的刑事案件中也不可能 96.8% 都是重大或疑难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审判委员会工作规则规定, 审判委员会采取民主集中制, 应在听取合议庭成员对案情汇报的基础上, 进行充分讨论, 如有意见分歧, 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表决。然而研究者发现, 在具体实践中, 审判委员会的工作流程常常走样。

研究者发现, 全年会议纪要中没有记载任何投票表决的情况。在大多数情况下, 审判委员会成员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且往往是在法院核心领导发表意见之后达成一致意见。与领导持不同意见的成员往往会调整自身立场或不发言。在审判委员会更改了合议庭成员判决建议的刑事案件中, 91% 的案件是按法院院长的意见进行更改的。由此可见, 审判委员会的讨论严重受到法院行政等级关系的影响, 民主成分不明显。

研究者同时发现, 在案件讨论中, 由于审判委员会成员往往

缺乏某一具体司法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深入研讨案情的动力，汇报案情的合议庭成员时常可以通过汇报侧重点的选择或语言表达方式的处理来引导审判委员会成员的思路，使自己提交的判决建议被采纳。

审判委员会如何影响案件判决

审判委员会案件讨论过程中的这些漏洞，对案件讨论的结果有什么影响呢？研究者分别对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进行了分析。

该法院规定，所有涉及缓刑、免于刑事处罚、无罪释放、处以罚金、有组织犯罪、贪污和其他案情严重的刑事案件，都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这一定义几乎囊括了所有刑事案件。在54%的被讨论案件中，合议庭的判决建议被采纳，另有41%的案件中审判委员会修改了合议庭的判决建议。这些修改大多数具有两个特征：其一，修改集中于罚金数额、缓刑年限等次要问题上，而非实刑刑期、是否适用缓刑等关键问题；其二，修改体现出较强的方向一致性——增大罚金数额，延长缓刑年限。

这一现象的发生，与该法院在经济上的窘迫状况有关。但研究者认为，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在基层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较易发生司法腐败，因此舆论往往对案件判决抱有更大的不信任。审判委员会委员希望证明自身的公正廉洁，但又不愿对判决施加本

质影响，因此，在次要问题上提高处罚额度，便成了最佳选择。

而对于民事案件，合议庭成员往往会主动提请审判委员会进行讨论。被讨论的案件往往有以下特点：它们在案情和法律层面并不复杂，但往往牵涉复杂的社会因素，如外力因素干扰、社会影响重大、诉讼人情绪激动等。合议庭成员将这些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的动机，并非希望委员会拿出更佳的判决方案——数据表明，事实上审判委员会拿不出什么更佳的判决方案，全年下来只在4起民事案件中修改了合议庭的判决建议——而是通过这一方式减轻自己对判决结果所负的责任。

另一方面，审判委员同样会试图逃避责任。通常，相比起修改合议庭的判决建议，采纳建议是更好的逃避责任的方式。如果案情实在复杂，审判委员会还会通过征求上级法院意见的方式逃避责任。

审判委员会功能全部落空

基于以上分析，研究者指出，一些学者希望审判委员会制度发挥的三大积极功能，在司法实践中全部落空。

审判委员会未能提升法官的业务水平。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过程草率，一部分成员常年不参加具体案件审理，导致其自身业务水平低下。上文数据分析表明，大多数情况下委员会直接采纳

了合议庭的审判建议,有限的修改也大多局限于增加罚金等细枝末节,这一过程基本不体现技术含量。另外,审判委员会为案件主审法官提供了逃避责任的途径,当法官面临棘手问题,大可将其推给审判委员会了之。这一恶性循环助长法官惰性,反而降低业务水平。

审判委员会未能维护司法独立。理论上,审判委员会可通过抱团的方式加强力量抵制其他部门对司法的干预,但现实并非如此。如前所述,法院核心领导在审判委员会讨论过程中有压倒性的影响力,其他利益团体可有针对性地直接对其施加压力。审判委员会的决议以集体形式作出,成员个人无需承担责任,反而使这些成员更容易屈从外部压力、做出不正当行为。

审判委员会未能抵御司法腐败。由于法院核心领导在审判委员会讨论过程中享有绝对权力,因此腐败空间随之而来。同时,由于案件主审法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误导、干预审判委员会的讨论,其腐败几率也并未因委员会的存在而降低。审判委员会极少对合议庭给出的判决建议做出实质性更改,说明其对案件审理者的腐败纠错能力几乎为零。最重要的是,一旦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任何个人——无论是委员会成员还是案件主审者——对判决所需承担的个体责任大大减少,腐败行为变得更为安全。

研究者据此总结,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最大漏洞,在于它以“集体决策”为名,给审判委员会内外的法官无差别提供了逃避

责任的通道。这一漏洞直接导致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数量激增，但讨论与决策质量十分低劣，最终使整个系统进入一种不负责任的运转状态。

参考文献

- He, Xin. 2012. “Black Hole of Responsibility: The Adjudication Committee’s Role in a Chinese Court.” *Law and Society Review* 42 (4): 681–712.

背景和经济才干是否影响干部选拔？

在中国持续而快速的发展过程中，决定干部升迁的究竟是相关人员的“背景”还是其经济才干？韩国亚洲大学崔恩敬教授（Choi Eun Kyong）最近发表研究报告表明，省、自治区、直辖市一把手的经济治理能力是他们能否晋升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因素。

刘岩川

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人整体浮出水面已一月有余，新华社用长篇特稿介绍了七位政治局常委的成长背景及工作经历。在他们当中，有些人生长在革命家庭，有些人则来自贫寒之家。常委们的共同点，是都曾在多个地区或部门担任一把手，并由此经历了国家治理的历练。

海外学者不失时机地提出了问题：在中国持续而快速的发展过程中，决定干部升迁的究竟是相关人员的“背景”还是其经济才干？韩国亚洲大学崔恩敬教授（Choi Eun Kyong）最近发表研究报告表明，省、自治区、直辖市一把手的经济治理能力是他们能否晋升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因素。

在崔恩敬看来,过往的一些研究者要么将中国领导的升迁简化为派系竞争或者派系内部人员互惠的结果,要么将地方领导人促进 GDP 增长的能力视作晋升高层的主要考量。前者完全忽略了近年来中国领导层换届所体现出的制度化进程,后者则无力解答外界对“背景因素是否影响升迁”的疑问。

曾经与中央高层领导共事并博得青睐的经历能否提升一位地方领导人晋升的几率?地方领导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成绩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作为晋升高层的资本?在统计了1989年至2009年间数百位地方一把手的履历与经济表现后,崔恩敬得出结论:对于从地方一把手位置上荣登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的官员而言,与中央高层领导并肩作战的经历及突出的经济建设能力都是晋升所仰仗的因素。此外,历史资料表明,如果两位有希望晋级的地方领导恰好都有或者都没有与中央领导共事的经验,他们对当地经济的贡献就会对晋升起到关键作用。

作为行政一把手的省长、自治区主席和直辖市市长则有所不同。无论过去是否与中央高层领导人打过交道,他们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作为都会直接影响其晋升党委书记或中央部级领导的概率。

从地方一把手晋升领导人序列,自然要比从行政一把手晋升党委书记困难得多。据崔恩敬观察,在1989至2009年间,省级党委书记晋升的比例只有4%。相比之下,省长、自治区政府主席和直辖市市长的仕途则显得更为宽阔,共有9.5%的人晋升为原地或异地的党委书记。

崔恩敬也注意到地方领导人的其他去向。在任期结束后，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最普遍的动向是留任或同级调动至其他省。此外，地方领导人还可能因为年龄因素而退休，或因为表现欠佳遭到降职。

崔恩敬还发现，基层官员的升迁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比高层更为程序化。例如，中共中央在1995年发布了《关于加强和完善县（市）党委，政府领导班子工作实绩考核的通知》，为地方基层领导制定了相对硬性的审核标准。其中，基层领导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表现是高层审核的重要对象。相比之下，由于中央对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一把手则没有同样系统的考核标准，所以给外界留下了高层领导变动更难预测的印象。

在以经济发展为硬道理的当代中国，领导人建设经济的能力诚然是评价其表现的重要指标。但崔恩敬的研究缺憾明显。首先，中国省部级官员阅历丰富，其“背景”和“派系”归属并非一目了然。其次，经济发展与官员升迁常常是互为表里的因素。有些人的确是因为执政有方而更上一层楼。反之，有些人原本就依靠“背景”因素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任职，经济发展只是顺风车而已，而“背景”才是升迁的幕后推手。

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经济总量的增长，而是整个社会的健康、平衡发展。如何在适当支持国有经济的前提下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全球经济中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如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抑制贪腐和不公，都应该成为

考核和选拔领导人所仰仗的重要指标。

本文已刊发于 2013 年 1 月 4 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参考文献

- Choi, Eun-Kyong. 2012. “Patronage and Performance: Factors in the Political Mobility of Provincial Leaders in Post-Deng Chin.” *The China Quarterly*: 1–17.

哪些因素决定党内民主的程度

“党内民主”并非中国专利，其程度和质量取决于政党的起源、政党的意识形态、政党的存在时间、政党的执政愿望和政党的内部决策模式等五大影响因素。

陶郁

积极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观点，并且在十八报告中被再次强调。

回顾历史，“党内民主”这个概念自从被中共八大报告提出以来，虽然历经反复，但在最近三十年来越来越受到执政党的重视和各方人士的关注。如今，党内民主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和创造能力来源，包括党代会提案制在内的一些旨在增强党内民主的实践措施，也被推向了前台。

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党内民主”这个概念在西方的政界和学界却并不受重视。许多政治学理论家和现实政治实践者要么断言“党内民主”根本不可能存在，要么认为“党内民主”总是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衰竭。这些研究者和政治家的观点，被形象地

总结为“寡头铁律”，其核心观点在于：无论一个政党在成立之初有多么民主，其权力最终必然会集中到少数领导人物的手中，而广大党员的影响力则会不断下降。

不过，任教于英国金斯顿大学的政治学家皮提特（Robin T. Pettitt）并不认可上述传统观点。

通过对英国工党、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和丹麦社会民主党这三个西方政党所进行的比较研究，皮提特发现：并非所有政党的发展历史都会遵循“寡头铁律”；相反，在一些政党的党内民主水平衰退时，另一些政党却能在较长时间内维持高度的党内民主，还有一些政党能够随着时间发展而不断提升党内民主的水平。

在皮提特看来，所谓“党内民主”，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党代会在政党运行中的正式地位如何，党代会与本党议员的实际关系情况如何，以及基层党员在党代会上能否有效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他认为，通过上述三个指标来测量的党内民主，主要会受到五个实际因素的影响：政党的起源、政党的意识形态、政党的存在时间、政党的执政愿望和政党的内部决策模式。

就政党的起源而言，那些由议员发起成立的政党，党内民主程度往往较弱；而那些成立于议会之外、通过选举斗争进入议会的政党，党内民主程度则往往较强。这是因为，前一种政党先天就是精英动员群众的工具，而后一种政党则更有动力去影响和约束那些被它们送入议会的党员。

就政党的意识形态而言，在西方议会中，意识形态越倾向于

左翼的政党,就有倾向于将议会党团置于党代会的控制之下。例如,英国工党和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都由大多数左派和一部分中间派组成,这两个政党都强调通过党代会监督和约束本党议员;而丹麦社会民主党中的中间派则占据多数,而该党议员在党内所受约束就相对较小。

就政党的存在时间而言,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成立年代越长的党,确保党内民主的可能性就相对越低。在这个问题上,皮提特与他所批判的“寡头铁律”支持者其实持有相似的观点,他们都认为:政党为了生存,必然要依靠强有力的领导人物,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些领导人物所具有的权力会不断增强,他们对政党的控制程度也会不断提高。

就政党的执政愿望而言,那些越迫切希望夺取政权的政党,其党内民主就越容易受到威胁;而对于控制议会并不那么热心的政党,则往往更容易保持较高水平的党内民主。这是因为,迫切希望夺取政权的政党,往往需要更强的组织能力和执行能力。这种情况很容易形成自上而下的层级体制,使党的权力集中到少数领导人手中。

就政党的内部决策模式而言,那些采用简单多数原则进行表决的政党,其党内民主的水平往往比较低;而那些在征求全体党员意见基础上形成共识并据此采取行动的政党,其党内民主的水平则往往较高。相对简单多数原则下的表决,征求党员共识显然需要更多地考虑和照顾党内不同意见,而这就给了基层党员和少

数群体更多发表看法与影响决策的机会,也更能有效避免少数精英通过策略性地操纵投票而控制党的组织。

皮提特认为,由于不同政党在上述五个因素上的情况不同,故而这些政党的内部民主程度和发展趋势也各不相同。与“寡头铁律”的鼓吹者和拥护者不同,皮提特不认为所有政党的内部民主都会随着时间发展而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想法,政党存在的时间只是影响其党内民主程度的一个因素,而如果政党随时间变化改善了在其他因素上的表现,党内民主还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强。

当然,应该指出:皮提特的研究是在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框架下展开的,因此他所界定的“党内民主”并不完全等同于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党内民主。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皮提特的研究,不仅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党内民主无疑具有积极地启发作用,也再次提醒我们:贯彻落实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健全党员权利保障制度、扩大党内基层民主等方针,对于提升党内民主的强度和数量至关重要。

本文已刊发于 2013 年 1 月 17 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参考文献

- Pettitt, Robin T.. 2012. “Exploring Variations in Intra-party Democrac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and the Danish Centre-Left.”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4(4): 630–50.

低保分配背后的城市管理逻辑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在日益增大；国企改革、职工下岗、“单位”解体等一系列事件，催生了游离在光鲜与现代边缘的城市贫困人群。那么，中国城市中的最低保障制度秉持着怎样的原则？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两位学者研究指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城市，其低保分配背后的逻辑也大相径庭。

刘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在日益增大。国企改革、职工下岗、“单位”解体等一系列事件，催生了游离在光鲜与现代边缘的城市贫困人群。

在民主国家中，福利制度的分配原则常被认为与选票密切相关；亦有学者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贫困救济的根本目的是维持社会秩序与规管劳动力。那么，中国城市中的最低保障制度又秉持着怎样的原则？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政治学教授苏黛瑞（Dorothy J. Solinger）与博士生 Yiyang Hu 近日在《中国季刊》发表文章指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城市，其低保分配背后的逻辑也大相径庭。

研究者在武汉、广州、兰州等六座城市进行了跨越四年的研究,在对低保户和行政官员进行访谈的同时,也分析了民政部公开的六百座城市低保分配数据以及中国资讯行收集的各省市经济发展数据。

在两位研究者看来,始于1999年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根本目的在于安抚在经济改制过程中受到严重冲击的群体,以尽可能避免改革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社会冲突与矛盾,保障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1999年前十个月,有15亿元通过低保制度发放到了280万贫困人群手中;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经济改革紧锣密鼓地进行的同时,低保系统也随之膨胀。从2000年中国准备“入世”起的一年间,低保人群迅速扩张到1930万。然而2002年中国顺利加入WTO之后,低保人群的增长速度也立即放缓,直到2009年也只是增长到了2330万。

1999年,低保资金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0.113%,至2003年增长至最高点0.688%,此后略微下降,至2008年约保持在0.615%。1998年时,低保金标准约为当地平均工资的20.5%,而到2007年已经下降到10.3%。与其他国家比起来,2009年中国低保总支出占GDP的0.1439%,而拉丁美洲国家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如罗马尼亚)针对贫困人口救济的平均支出约占GDP的0.5%。

由于中国地域发展严重不平衡,中央并未划定城市人口贫困线,而是留给地方自行决定。同时,对于低保支出,中央财政也有不同程度的补贴:最富裕的七个省区几乎100%自行负责,而甘

肃、贵州等较为贫困的省份能够得到 70% 以上的财政支援。

具体至武汉和兰州这两个城市，研究发现，它们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低保政策。在兰州，贫困人口采取各种灵活方式自谋生计是得到鼓励的，特别体现在城管执法较为宽松，各种流动摊贩都能够稳定生存；而在武汉，流动摊贩被严格禁止，贫困人口难以自谋生路。研究者由此提出几个假设，并在此后的数据分析中得到了证实。

第一，愈是富裕的城市，残疾人在低保人群中的比例愈高。这是因为富裕城市更为注重市容市貌，因此希望通过发放救济金来让残疾人留在家里、避免上街自谋生计；而较为贫穷的城市资源有限，更希望鼓励残疾人尽可能自谋出路。

第二，愈是富裕的城市，愈是倾向于将低保延伸至已登记的失业人口。这是因为发达城市的经济模式更技术化和精细化，而已登记失业人口通常缺乏相应的技能，无法在正规经济体系中找到立足之地。相反，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模式更容易重新吸收失业人口，也更鼓励他们再就业。

第三，愈是富裕的城市，低保人群中“灵活就业”的人群比例就愈低。这也是因为灵活就业往往会影响市容，而欠发达城市相对而言对城市形象的关注较少。在武汉、广州等发达城市，为了阻止贫困居民“灵活就业”，低保政策往往采取严格规定，一旦低保户有了临时收入，得到的救济金额就会大大减少。

研究者由此总结，出于吸引外商和游客等需要，发达城市往

往更为重视城市管理，同时致力于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的技术化，因此往往利用低保来阻止“不合时宜的人群”出现在街道上和劳动市场中。尽管该研究只是初步对低保分配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但研究者指出，在日益市场化、全球化和现代化的中国，社会福利政策的背后也隐藏着经济理性的逻辑。

参考文献

- Solinger, Dorothy J., and Yiyang Hu. 2012. “Welfare, Wealth and Poverty in Urban China: The Dibao and Its Differential Disburse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211: 741–64. doi:10.1017/S0305741012000835.

两岸交流未令台湾民众更亲近大陆

总体来看，两岸的和平互动与密切交流的开展，以及大陆对台持续的让利，仍无法显著改变台湾民众对大陆的疏离态度，许多的民众并不认为台湾及个人会在两岸经贸交流中获利，反而会被大陆积极推动的两岸政策引起不安与焦虑。

马军

两岸自 1949 年以来，经历了军事对立剑拔弩张的“相互否认”时期，至 1990 年代渐渐走向了“互不否认”的阶段，并逐步演变出现了“政治疏离、经济融合”的基本结构。如果说李登辉、陈水扁时期的两岸关系还是以“对抗”为主，那么大陆胡锦涛主政、台湾马英九执政后，两岸关系明显活络。大陆改变了昔日“文攻武吓”的对台政策，采取了“先易后难，先经后政，循序渐进”的思路制定对台政策，而马英九自 2008 年上任以来，则秉持“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不统不独不武”“维持现状”等前提，全面开启两岸交流，两岸经贸关系愈趋密切。

根据欧洲统合经验和一般统合理论的解释，经济部门的合作

会全面扩溢到政治部门,进而促使政治联系更为紧密。然而,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调查却显示:自1992年至2012年,台湾民众的台湾认同一直呈现上升趋势。1992年至2008年间台湾民众的台湾认同上升是因为李、扁政府大力推动台湾“本土化”政策所致;值得注意的是,马英九政府上台之后,在两岸社会、经贸、文化交流开始融冰的背景下,台湾民众台湾认同的比例反而上升得更加迅速。

换言之,2008年之后,两岸关系改善所带来的巨大利多,不仅没有让台湾民众对“台湾人认同”议题产生“疏离”态度,反而促使其加速上扬。对于这一问题,政治大学的陈陆辉、陈映男及王信贤三位学者撰文进行了分析。

三位学者的研究显示,约有50%的台湾民众认为两岸交流对台湾整体经济情况并没有太大影响,而认为两岸交流使台湾经济变差和变好的民众各占25%。在个人经济状况方面,约有七至八成的民众认为两岸交流对个人经济情况没有影响,认为自身经济状况因两岸交流而变好的只占10%不到,认为状况变差的则有约20%。

在将台湾民众“整体利益”“自评利益”与“台湾认同”交叉分析后,学者们得知:认为两岸交流对台湾整体经济发展有利的民众,有将近七成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或者“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而认为两岸交流使台湾整体经济变差的民众,则有八成五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同样,认为两岸交流使自身经济状况

变好的民众,有 77% 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或者“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而认为两岸经济交流使自身经济状况变差的民众,有 80% 左右认为自己是“台湾人”。

如若加上传统因素及省籍、政党认同等因素的影响,作者认为,2008 年以来的整体趋势显示:台湾民众的“台湾人认同”,主要受到省籍、政党认同、统独立场以及经贸交流对台湾政治利益及个人利益的评价等因素的影响。理性的诱因虽然一定程度上开始影响台湾的民众认同,但是台湾长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力量,对于台湾民众的政治偏好,影响更为重要。

总体来看,两岸的和平互动与密切交流的开展,以及大陆对台持续的让利,仍无法显著改变台湾民众对大陆的疏离态度,许多的民众并不认为台湾及个人会在两岸经贸交流中获利,反而会被大陆积极推动的两岸政策引起不安与焦虑。物质利益对台湾民众认同的影响,还需要更长时间的验证。

参考文献

- 陈陆辉、陈映男、王信贤,2012,〈经济利益与符号态度:解析台湾认同的动力〉,《东吴政治学报》,30(3),1-50。

政见专题——两会

“两会”是每年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人大和政协委员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商讨国家大事，关联每个普通人。这次“两会”，恰逢中国国家领导人“交接班”，成为举国关注焦点。带着与大家同样的关注，“政见”团队关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何体现监督作用，新一轮政治机构改革的前因后果，以及地方债务危机有何而来。

两会究竟是什么

2.0 动态版

2013年“两会”季再次来临，“政见”团队与《南方周末》合作，对去年的信息图进行了升级，补充了新的内容，并利用HTML5技术制作了动态版本。

CNPolitics.org/2013/03/npc-cppcc-2

方可成 / 观察员 吕妍 / 制图师



地方债务危机的政治制度根源

目前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根源在于政治制度为不负责任的借贷和支出提供了动力、创造了条件。相应的,对预算制度的改革,也应围绕减少道德风险、改变考核制度、保证金融系统自主性等制度安排进行。

张跃然

预算制度改革是2013年全国人大重点关注的议题之一。在2012年7月预算法修正案草案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后,这一议题在舆论界的热度一直居高不下。在已有的各种讨论中,通过制度顶层设计加强对地方政府借贷与支出的管制、避免地方债务危机深化,逐渐成为各方共识。

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王惠玲(Lynette H. Ong)近期在《国际政治学评论》发表论文,系统研究了地方债务危机的制度原因,为当前的公共讨论提供了更为学术的视角。

目前,学术界的一般观点认为,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之后一直奉行“财政联邦主义”原则,给予地方政府较大的财政自主权。

即使在1994年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在融资与支出方面也一直保有相当的自由度。这一原则被认为能够有效地刺激经济增长。但研究者指出，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并未给“财政联邦主义”的长期稳定运行提供必需的制度环境。这一问题正是导致目前地方债务危机的根源。

研究者首先试图回答“地方政府债务从何而来”这一问题。研究者本人在2005-2006年获得的一手数据与世界银行2007年发布的报告均显示，农村信用社是地方政府最大的“债主”，其信贷总额占到某些地方政府债务的一半以上。虽然这些数据基于的样本并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代表性，其准确性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中也难以保证，但研究者认为，它们还是能大致反映地方政府债务构成的总体情况。

那么，农村信用社是如何成为地方政府的大债主的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一问题有不同的答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地基层政府牵头成立了大量乡镇企业，它们成为农村信用社的主要借贷对象。乡镇企业通过税收和非税收渠道为基层政府提供了充足的财源，有些甚至在实质上成为了政府的融资公司。九十年代末期，多地出现了乡镇企业大规模倒闭、改制的浪潮，其所欠的债务自然由这些企业实质上的所有人——政府承担下来。

进入新世纪后，基层政府的融资方式发生转变，大量的地方融资平台、城建投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兴起。遗憾的是，研究者未能通过系统的经验证据直接说明，在这一时期的政府融资行为

中，农村信用社的作用有多大。但近些年来，大量的相关新闻报道似乎可以从侧面支持研究者的论断：在目前的政府融资行为中，农村信用社依然是主要的资金来源之一。

基层政府背负着来自农村信用社的大量债务而又不积极还款，使得农村信用社不良信贷比例很高，严重威胁农村社会的稳定。一方面，统计数据表明，农村信用社吸纳了大量的农民个人存款；另一方面，在目前的制度下，农村信用社几乎是普通农民获得贷款的唯一渠道。信用社对农村的极端重要性，造就了其“太大以致于不能倒”的地位。一旦信用社无法正常运转，将触发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正因为此，在地方政府债务缠身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有强大的动力维持农村信用社的稳定运行。2000年后，央行动用大量资金，对被不良信贷压得不堪重负的农村信用社数次出手相救。

这样一来，基层政府从农村信用社过度借贷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实际上由中央政府承担。这种“地方请客，中央买单”的状况，带来了很高的道德风险，使得地方政府更加高枕无忧地过度借贷、过度支出。舆论界目前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基层政府财政收入少、支出责任重带来的权责不对等，是造成债务危机的主因。研究者的论断实际上反驳了这种说法——研究者认为，目前的债务危机确实是由中央与地方权责不对等造成，但这种权责不对等来自“地方请客，中央买单”的道德风险。研究者进一步指出，“财政联邦主义”若想稳定运行，必须基于一套“谁制造问题，谁承担责

任”的体系,如对造成问题的官员进行惩罚、允许资不抵债的政府破产等。

那么,地方政府为何有如此强大的欲望源源不断的借钱?农村信用社为何甘心成为地方政府的提款机?研究者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政治制度。

不合理的官员考核制度使得地方官员产生不断借贷的强大欲望。研究者通过第一手访谈材料说明,目前的基层政府官员考核中,政府财政收入、工业产值、招商引资情况是最为关键的指标。换言之,决定官员升迁的,依然是辖区经济发展情况。在中国目前经济发展仍由政府主导的局面下,大量的财政投资,无疑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捷径。地方官员为了大量投资而大量借贷,以经济发展换政绩和前程。

地方金融机构的“条块管理”制度,使得农村信用社沦为政府的提款机。目前,农村信用社一方面受上级金融机构管理(“条”),一方面受当地政府管理(“块”)。由于地方政府对农村信用社人事变动的影响力较大,因此能够有效指挥信用社的放贷,而上级金融机构的管理作用则被最大程度地消解了。

根据以上分析,研究者总结:目前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根源在于政治制度为不负责任的借贷和支出提供了动力、创造了条件。相应的,对预算制度的改革,也应围绕减少道德风险、改变考核制度、保证金融系统自主性等制度安排进行。

需要指出的是,近些年由于农村信用社不良信贷比例过高以

及城市化等因素影响,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正在取代农村信用社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信贷来源。由于这一研究以“农村信用社”为主要着眼点,研究得到的直接结论有一定局限性,但其提出的分析框架仍能很好地容纳当前问题现状的上述变化,其基本观察视角有助于发现问题根源的普遍性。

参考文献

- Ong, Lynette H. 2012. “Fiscal Federalism and Soft Budget Constraints: The Cas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3 (4): 455–74.

人民代表大会到底有没监督作用？

根据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它的一项重要功能是监督政府施政。那么，人民代表大会到底是否发挥了这样的功能？如果没有，是什么原因阻碍了人大的作用？Almén认为人大的任何制度改革都需要置于和党的关系中进行考量，中共需要人大发挥的作用是更好地提高地方政府执政能力，而非对其施政内容进行质疑。

杨鸣宇

每年3月份的“两会”是中国的政治盛会。根据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它的一项重要功能是监督政府施政。那么，人民代表大会到底是否发挥了这样的功能？如果没有，是什么原因阻碍了人大的作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政府系研究员Oscar Almén撰文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分析。

Almén的分析是围绕地方人大常委会展开的。在他看来，地方人大常委会和地方人大全体会议虽然都是人大制度的组成部份，但有着非常不同的功能——前者发挥更多的监督职能，而后者主要作用在于选举地方政府领导。Almén认为，虽然总体上说地方

人大监督政府的能力一直在增强,但2006年通过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使这一趋势发生了改变。

具体而言,这项法律使地方人大监督政府的两大工具——“述职评议”和“个案监督”难以有效的使用。

述职评议是人大代表监督政府的利器,它容许人大代表评估除地方法院和政府最高领导外的所有政府部门领导的工作。虽然没有明文规定评估不合格的部门领导应该如何处分,但他们确实可能遭到诸如降级或调离原职这样的处罚。然而,在新的监督法下,不再鼓励使用述职评议,而改为使用“工作评议”——两者的区别是:前者监督的是部门领导的工作,后者监督的则是整个部门的工作。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工作评议使得来自政治上的压力大为减少,这相当于减弱了人大监督政府的力度。

对于“个案监督”而言,它的作用本来是容许地方人大监督同级法院的依法判决,但这项制度一直被批评潜在干预司法独立。因此在人大监督法生效前,很多地方事实上已经不使用该制度。

通过对浙江省一个县级城市的人大机构在1998-2009年间运作情况的案例分析和田野调查,Almén进一步发现:地方人大监督功能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大主任的积极性。如果人大主任积极地参与到政策过程中,地方人大可以较好地发挥监督作用,甚至可以有一定的制度创新;然而一旦该领导离职,留下的制度就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因为新的领导对于无助于其政治前途的制度创新不会有激励去进行延续。

Almén 对于浙江个案的归纳是：人大的任何制度改革都需要置于和党的关系中进行考量，中共需要人大发挥的作用是更好地提高地方政府执政能力，而非对其施政内容进行质疑。已有的研究把这样一种中国式的民主制度形容为“咨询式民主”（consultative democracy）或“协商列宁主义”（consultative Leninism）。在利益主体不断多元的情况下，政府可以借此获取来自党外的声音，从而更好地进行决策，并维持管治的主导权。

参考文献

- Almén, Oscar. 2013. “Only the Party Manages Cadres: Limits of Local People’s Congress supervision and reform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2 (80): 237–54.

政府机构改革的内在逻辑

通过对 1949-2007 年间国务院机构变迁的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可以从三个角度理解 1949-2007 年间国务院机构变迁逻辑:运动式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驱动、政府 - 市场关系和政府 - 社会关系双重维度的调整,从而为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提供理论和历史的借鉴。

于灵歌

在第十二届全国“两会”上,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大部制改革成为热门话题。建国以来,我国的中央政府机构发生过怎样的变迁?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是怎样的?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何艳玲教授曾将 1949-2007 年间国务院机构变迁的数据进行量化分析,为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提供理论和历史的借鉴。

国务院机构改革首先反映在规模上。从机构总数来看,高峰期是改革开放初期的 1979-1981 年,机构总数分别为 94 个、99 个、100 个,低谷期则为建国初期的 1949-1951 年与文革时期的 1970-1972 年,均在 32-36 个之间浮动。1998 年之前,国务院机构

变迁存在“精简 - 膨胀 - 再精简 - 再膨胀”的变迁循环,之后则趋于稳定。

几十年来,国务院机构变迁的程度剧烈。将变迁事件分类后可看出,机构新增最多,共有 259 次;撤销发生了 137 次;随后是合并 90 次、复设 66 次、改名 56 次——总体上呈现出“大撤大增”的态势,在 1988 年之前尤为明显。

从国务院各类组织的数量上看,在 1982 年之前都有比较大的变化。其中,经济管理类组织数量变化最能影响国务院机构总数的变化。到 1998 年,社会事务类组织在机构总数中所占的比例超过经济管理类组织,并保持至 2007 年。各类机构的寿命与变迁程度有关,社会事务类组织平均寿命最长,而经济管理类组织的平均寿命较短。在所有曾经出现的机构中,1949 年以来名称没有发生过变化的有 4 个部委,即外交部、公安部、文化部、卫生部。

这些量化的统计数据反映出的是机构变迁的内在逻辑。何教授认为,理解 1949-2007 年间国务院机构变迁逻辑有三个角度:运动式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驱动,政府 - 市场关系和政府 - 社会关系双重维度的调整。

1982 年、1988 年、1998 年是变迁的“关键年”——这几年都发生了大型机构改革。亦即,历年国务院机构变迁基本上是由数年一次的大型机构改革来推进的,是一种“运动式推进”的变迁模式,而非通过常态化的调整来改革机构。这样试图“毕其功于一役”运动式改革本质是通过巨大的、集中的资源投入,在短时

间内达成当初预设的目标。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已经实现的目标可持久性不强，甚至会为下一轮膨胀埋下伏笔，导致机构精简形成“运动依赖”。

1982、1988、1998这几个“关键年”的关键之处更在于，这些年份代表的是党的工作会议对经济体制的调整。这说明：经济体制改革是政府机构变迁的重要动力。1982年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是建国后对市场调节的第一次承认；1988年进行的第二轮机构改革明确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原则，与之后1992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相配套；1998年，市场机制逐渐完善，体制改革也趋于稳定。

那么，历年的机构改革反映出国家战略调整、政策变化的基调是怎样的？文中对机构改革做了粗略划分：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主要维度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而在此之后，国务院机构改革出现了一个新的维度，即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全新界定与调整。新世纪举行的两次重要会议主旨都表明了这一变化：2002年的十六大，重点内容是确立了科学发展观，2007年的十七大，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促进社会发展。在此背景下，国务院机构变迁一方面仍然继续着“减法法则”，即主要精简经济管理类组织；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加法法则”，即社会事务类组织、执法监督类组织的增加。

1949-2007年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数据显示，组织精简一直是我

国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主要基调。200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通过,突破性地将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确立为“大部制”,政府机构改革不再以精简机构和人员为主要目的。何教授认为,2008年后大部制改革的首要目标应向“为社会公平地提供优质服务”转变,机构改革不仅要有减法法则、加法法则,也要有“乘法法则”——即通过整合现有组织,达到行政最优化。此外,任何机构改革都必须置于“有令必行”的法制框架下来进行,这是实现行政体制改革法治化的基本前提,也是推动政治改革的必要环节。

本文已刊发于2013年3月6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参考文献

- 何艳玲,〈中国国务院(政务院)机构变迁逻辑——基于1949-2007年间的数据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08年第1期,132-200。

政见经济

全球生产、交换和分配体系所反映出来的价值观念能够影响社会、政治安排。这种安排是在各种规则和惯例中做出选举的结果。这就是经济的结果。

在这本合辑中，收录了6篇经济类研究成果的推介文章，大抵可以分成三类。其一有关国内经济建设问题；其二有关中国对外经济问题；其三有关国际经济问题，基本涵盖在经济领域的各种研究方向。受限于“政见”团队经济学背景不足现状，并未收录过于专业性的研究，而是以政治经济互动研究为主。

在这些文章中，值得注意的是，“政见”团队成员以中国铁路体系改革为背景，探讨铁路市场化的影响，以及国外铁路体系设计经验。这两篇文章不是“追风”而作，是冷静的分析与探讨我们身边的政治经济学议题。

铁路市场化会有什么影响？

铁路不仅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经济命脉，又与许多普通人的工作出行密切相关。努尔利斯和伊万斯的研究虽然看似与中国并无直接关系，但他们通过分析英国和日本铁路市场化改革所揭示的某些机制，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对中国铁路系统改革的可能后果做出更加理性地观察与更负责任地讨论。

陶郁

与人民共和国同时建立的铁道部，历经六十余载风雨后，终于在2013年3月成为了历史。按照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国铁路系统将进行以政企分开为目标的改革：原本属于铁道部的行政管理职能被划入交通运输部，主要由新组建的国家铁路局承担；而原本铁道部实际上具有的企业经营业务，则由新组建的中国铁路总公司继续开展。

方案甫一出台，原本就广受关注的铁路系统再次成为举国聚焦的热点话题。无论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实中，人们都表现出对中国铁路系统下一步改革方向的巨大兴趣和热切关心。不少国内媒体甚至国际媒体都在追问：中国铁路系统的未来将是什么样

的？而对于更多需要搭乘火车出行的旅客来说，票价和安全则无疑是最需迫切关心的两个问题。

预言中国是否会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从此让铁路系统走上市场化甚至私有化的道路，如今尚且为时过早。况且，巨大的路网规模和沉重的运输压力，也使中国铁路系统具有许多独特的属性。然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观察和其他国家铁路改革的历程及其结果，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合理地想象与理解中国铁路的未来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两位英国专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十分值得我们重视。努尔利斯（Richard D Knowles）教授就职于英国萨夫德大学城市变迁研究中心；在不久前发表于《环境与规划》（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期刊的一篇论文中，他回顾了英国铁路自1993年实现私有化以来的绩效表现，特别分析了最近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对英国铁路外包项目的影响。伊万斯（Andrew W Evans）教授就职于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交通研究中心；在即将发表于《交通经济学研究》（Research in Transportation Economics）的论文中，他探讨了铁路私有化对运输安全的影响。

私有化的经济后果：不确定性大

根据努尔利斯的介绍，英国铁路的市场化改革始于1994年，至1996年基本完成；在此过程中，不仅包括铁轨、站台和信号系

统在内的铁路基础设施被私有化，而且铁路营运业务也被完全拆分发包，其中：客运业务被分别承包给了 25 家私有企业，而货运业务则被分别承包给了 7 家私有企业。

英国铁路系统市场化改革的指导原则，是通过引入私有企业和市场模式以加强该领域的竞争，同时达到提升服务质量和降低市场补贴的双重效果。就客运业务而言，在外包服务竞标中获胜的企业，其计划方案往往要求更少的政府补贴或能为政府提供更高的承包收入，同时承诺不断为改善服务质量而增加投资。

在英国对铁路系统进行市场化改革之前的 30 年间，铁路客运量并没有明显变化；然而，从市场化变革开始，直到本次经济危机于 2008 年底爆发之前，搭乘铁路出行的人数几乎每年都在增加。无论政府还是承包企业，事前都对此估计不足。同时，虽然企业和政府在承包和同签订之初约定了每年的绩效标准，但一些得到承包权的企业却无法有效兑现承诺。由于上述原因，英国政府对于铁路的补贴在 2001 年到 2007 年间增加了 5 倍，未能充分实现通过市场化削减政府补贴的预期目标。

随着第一轮承包合同陆续到期，英国政府自 2003 年开始着手对其铁路系统进行第二轮外包招标。在吸取先前经验的基础上，此轮投标的合同期间更长，以确保承包企业对那些获益周期相对较长的项目进行投资，并减少铁路承包合同受短期经济萧条影响的风险。然而，即便如此，经济危机依然给市场化运营的英国铁路带来了巨大压力。随着政府对于铁路投资不断减少，承包企业

必须通过削减开支和增加收入以维持运营。这种情况下，一些承包企业不得不通过降低营运密度和裁员来降低成本；但在无优惠的情况下，英国非高峰期铁路票价仍高居欧洲首位。

因此，努尔利斯认为，市场化对铁路系统的发展可能具有复杂的影响。市场化确实能够降低铁路系统的单位运行成本，从而提升其经济效率；但与此同时，如果市场化与运行压力增加、宏观经济疲软与政府削减开支等因素同时发生，也可能增加铁路系统的运行风险，促使铁路承包商采取裁员、削减车次与提升票价等方式保证其利润空间。而市场化能否真正实现减少公共财政对铁路的补贴，则取决于上述两方面因素如何综合作用。

同时，努尔利斯也发现，期限较长的承包合同，往往更有利于铁路运营商应对经济危机等外在冲击所带来的风险；而随着市场化进程不断加深，被拆分的客运市场又逐渐整合到了几家主要的运输集团手中。

私有化的安全后果：不会降低安全性

与专注于铁路系统经济效率的努尔利斯不同，伊万斯在其论文中则重点探讨了市场化和放松管制对铁路系统安全可能造成的影响。

按照伊万斯的总结，认为市场化可能会增加铁路安全风险的理由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原本由同一组织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在市场化后可能会由多个组织提供，增加了确定责任和协调行动的困难；同时，与安全有关的信息必须跨越组织边界进行传递，降低了效率和可靠性。第二，新近进入市场的企业可能缺乏铁路安全经验，且市场化和放松管制可能会改变人们的工作习惯，从而增加风险。第三，私营企业可能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润，而减少对于安全领域的投资。

伊万斯对日本和英国铁路系统的安全性进行了考察——这两个国家先后于 1987 年和 1994 年对铁路系统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在此之前，日英两国与铁路有关的事故均已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统计结果显示，铁路系统的市场化改革并没有改变这种趋势。因此，尽管人们习惯于相信市场化改革会对铁路交通安全带来更大风险，但这些被普遍接受的想法至少在日本和英国并不成立。

不过，伊万斯也指出，虽然市场化和放松管制不会降低铁路系统本身的安全性，却可能促使一些人使用风险更高的其他交通方式来替代铁路运输，从而在理论上依然有可能增加社会的整体交通风险。

应该指出，中国拥有世界上第三大的铁路网和全球最大规模的高铁网络，以世界铁路 6% 的营运里程承担着世界铁路 24% 的运输周转量，这是英日两国铁路系统所无法比拟的；而且，政企分开之后的中国铁路是否会进一步加强市场化程度，目前还有待继续观察。但是，铁路不仅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经济命脉，又与许多普通人的工作出行密切相关；因此，这个系统的变化前景格外

值得人们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说,努尔利斯和伊万斯的研究虽然看似与中国并无直接关系,但他们通过分析英国和日本铁路市场化改革所揭示的某些机制,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对中国铁路系统改革的可能后果做出更加理性地观察与更负责任地讨论。

本文已刊发于 2013 年 3 月 20 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参考文献

- Evans, Andrew W.. 2013. “The economics of railway safety.” *Research in Transportation Economics*.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739885912002077>.
- Knowles, Richard D.. 2013. “Railway franchising in Great Britain and effects of the 2008/09 economic recessio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5: 197–216.

铁路民营化的日本经验

日本国铁改革的经验证明，基础设施的民营化不一定会带来预想的效果，铁路建设以及维护的费用大部分难以回收，属于沉没成本，若某线路长期亏损，经营者会放弃该路段的经营，伤害到铁路的公共性。另外，也不应对民营化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抱有过度期待，公益事业特有的公有或公益的性质，不会因为转移民营而消失。

马军

铁路事业的经营需应市场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迁。在铁路“夕阳化”的过程中，铁路事业被赋予公共性的任务，同时也被要求提供企业型的服务。这种对立使得铁路事业的经营难以好转。在这种背景之下，各国国有铁路事业纷纷在体制内寻求改善之道。然而，在历经多次改革无效之后，多国最后不得不选择体制外的改革方式，也就是转移民营。

日本是最早开启铁路私有化的国家之一，其改革历程已经成为许多国家进行铁路改革的重要参考目标。日本名古屋大学博士，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林淑馨撰文分析了日本铁路民营化的原因、做法和效果。

日本国铁自 1949 年从官营事业改组为公共企业体以来，一直以“国民的脚”自居。根据日本国有铁道法第一条的规定，国铁设立的目的，一方面希望借由公营事业的经营形态，达到经营的自主性、效率性，同时也希望达到增进公共福利的目的。因此，日本国铁具有公共性和企业性的双重性质。

然而，1960 年以后，随着产业机构的变化以及国民所得的增加，国铁逐渐丧失了交通市场上的独占地位，其经营从 1964 年开始亏损。除市场原因之外，国铁的公社制度，使其受到来自行政、政治的干涉过多，缺乏经营的裁量权和自主性，员工“铁饭碗”思维严重，国铁运转效率低下。

来自市场和体制的双重压力，使得日本国铁从 70 年代开始便不断尝试经营改革计划，拟定国铁再造对策，但终告失败。1981 年，自民党向国会提出国铁再造特别法之际，向国会提出：“国铁再造最后的办法，就是全面转移民营”。

1986 年 11 月，日本通过改革法案，决定国铁正式分割民营，采取特殊公司化和分割两种方式。所谓特殊公司化和分割，是指日本特色的“第三部门”运营。与常见的“非盈利组织”的定义不同，日本的“第三部门”指的是公私合营的企业。因为日本存在大量长期亏损的偏远线路，民间公司对于运营这些线路显然没有兴趣，为了保障偏远线路上民众的出行权，日本对现有的亏损严重的线路进行废除或者转换为巴士线路。并将国铁分割为六家铁路公司和一家巴士公司。

同时,为了解决国铁庞大的债务问题,在民营化的同时,设立了国铁清算事业团,继承国铁大部分的债务,负责长期债务的处理,资产管理和处分,以及员工的就职问题。

林淑馨认为,改革初期日本国铁民营化最大的成果是效率的提升和服务品质的改善。改革之初的日本国铁拥有40万员工,转移民营之后则精简至19万人,在营运公里数几乎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营运效率大幅提升。服务方面,民营企业积极修正发车时刻,车辆、车站设备不良、站员态度恶劣等问题获得改善。其次,民营企业获得了经营的自主性,人事、财务、业务方面的多项管制松绑很多,连带也提升了经营的自主性。国铁民营化之后经营成绩改善很多,亏损额逐年减少。

然而,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入,民营化之后的日本国铁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

首先,债务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因为利息滚动增加,所以日本国铁债务反倒有增无减。其次,由于日本型第三部门是以地方政府和民间企业共同出资、共同经营的,所以在实际的运作上因为公私间权责不分导致相互推诿,形成缺乏责任的经营体制。最后,由于民营化之后的铁路依旧亏损,导致大部分公司都尽可能延长车辆的使用年限,车站等基础设施的兴建与维修仍然存在问题。

对此,林淑馨分析认为:日本国铁改革的经验证明,基础设施的民营化不一定会带来预想的效果,铁路建设以及维护的费用

大部分难以回收,属于沉没成本,若某线路长期亏损,经营者会放弃该路段的经营,伤害到铁路的公共性。另外,也不应对民营化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抱有过度期待,公益事业特有的公有或公益的性质,不会因为转移民营而消失。

林淑馨建议:今后的铁路改革可以采用“车路分离”的模式,即将线路部门事业和运输部门事业分开管理的方式进行改革。

参考文献

- 林淑馨, 2001, 〈日、德、英三国铁路民营化之比较分析〉,《中国行政评论》, 10(4), 23-64。
- 林淑馨, 2004, 〈民营化与第三部门: 日本铁路改革经验的反思〉,《公共行政学报》, 11, 109-142。
- 林淑馨, 2012, 〈再探铁路事业民营化——日本经验的现实与困境〉,《公共事务评论》, 1(13), 1-26。

“国进民退”：以民航业为例

经济发展的模式究竟是推动市场化发展，还是保持大型国有企业主导行业的地位，民航业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样本。研究者提出质疑，是否有产业部门借 90 年代末段市场改革跻身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推动国有经济份额控制力，强化国家资本主义，影响市场化程度增加，服务于某些部门机构的利益？

宿亮

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中国推动国有企业的发展，建立领军企业或“国有冠军企业”——这种策略被不少经济学家认为是“国际民退”。这种策略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发展的，背后有哪些逻辑？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政治科学学者莎拉·伊森（Sarah Eason）在《中国研究》（The China Journal）发表文章，以中国民航业发展为例，分析中国发展国企的战略。

伊森认定，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存在着“做大做强国企”和“发展中小企业”的论争。建立大企业集团战略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就已存在。当时，苦于计划经济官僚体系的东风汽车率

先提出成为“计划单列”的企业。这种想法得到刚刚成立的国家发展研究中心支持,认为这是推动国企横向联合、形成大企业集团的方法。虽然当时有发展城镇、乡村所属小企业的呼声,但政府最终决定建立大型“试点企业”,授予进出口权、贷款特权和经营自主权,在国内先做强,然后在国际上做大。这种策略从90年代初就形成了。

国航、南航、东航正是1991年第一批55家“试点”企业的成员。整个民航业的发展也成为一個有趣的案例。这一产业经历了最初的放开展,到之后的集中扶植大型国有运营商。1987年全国总计11家航空运营商、92年24家、95年40家、96年29家、2001年17家,这些数据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民航企业化。1985年,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下辖6个地方机构各自成立运营商,其中最大的三个就是北京的国航、广州的南航和上海的东航。1987年到1991年期间,6个地方局与航空公司逐步脱离。同期,受市场需求驱动,除民航系统外,地方政府与航空公司共同建立航空企业,如厦门航空、浙江航空、邮政航空等。

上世纪80年代,机票价格由民航局和物价局共同制定“公布价”确定,航空公司之间没有价格竞争。90年代价格机制放开,1992年机票开始在“公布价”基础上上下浮动10%,94年达到20%。1995年通过《民航法》,民航总局摆脱物价机构自行制定价格规则。97年开始,“一种票价多种折扣”,即航空公司可根据购

买时间、路程、航线进行折扣。

激烈的价格战随之而起，加上亚洲金融危机，需求减少，航空业 1998 年亏损 240 亿人民币，凸显 90 年代民航业投资过度、产能过剩的问题。多数航空公司政府控制，只追求市场占有率，而不是盈利。

同时，其他工业领域的价格战也愈发严重。在这一影响下，1980 年到 1996 年，工业收入年增长 20%，而 1997 年下降到 7.5%，1998 年仅剩 3%。

航空业中，监管机构开始考虑解决办法。民航局先后采取限制折扣和控制航线数量的措施，收效不大。监管部门面临抉择：一方面，不少人呼吁更加规范的市场化，民航总局不再承担裁判和老板的双重角色，而是政企分开，建立中立的市场管理机构。这一方法得到中小航空公司支持；另一方面，一些人认定市场碎片化眼中，应推动航空公司合并。大型运营商支持这种方法，要求建立两到三家大型运营商，提高国际竞争力。

因此，当时相对较弱的国航得到了西南航空、中航（拥有浙江航空以及香港港龙航空 43% 股份、澳门航空 43% 股份）；东航得到西北航空和云南航空，但因支付这两家航空公司债务失去 90 亿人民币；南航得到经营不善的中国北部航空和新疆航空。这种安排明显利于与民航总局关系千丝万缕的国航，也是中国政府支持大国企的重要步骤。

事实上，在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这种方式在多个产业成为

万能良方,也被认为是加入 WTO 后抵御竞争的好办法,得到政府支持。

伊森认为,民航总局利用了 90 年代末到 21 世纪初期几年,抓住政府推动国企“三年脱困”的契机,从部门利益出发,推动大型航空运营商控制市场。此后十年间,虽然民航总局的权限得到限制,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政企分开、理顺管理机制,控制其制定行业规范的领域,但国有航空公司归属财政部和国资委。2004 新一轮价格改革后,发改委控制定价,民航总局依旧发挥重要作用;而国资委成为新的行为体和国有航空控制市场份额的利益相关方。

2008 年经济危机爆发,民航局通过立法阻止所谓“恶性竞争”;然后要求运营商通过合并形成“拳头”,强化竞争力;最后通过放权和减税来变相注资国有航空运营商。监管部门支持“国家队”,导致 2008 年,除了春秋航空盈利外,其他私营航空均亏损,不少被国有航空公司吞并。

伊森的分析将民航业视为国进民退的代表。她提出疑问:为什么民航业在 2000 年之前没有“国进民退”,而是保持较高市场化程度?这其中是否有部门利益博弈?在此基础上分析 90 年代末段的市场改革,是否有产业部门借此跻身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并推动国有经济份额的控制力,从而强化了国家资本主义,影响市场化程度增加,服务于某些部门机构的利益?

中国经济是一盘大棋。在伊森内容详实的研究背后,涵盖的重要问题在于:经济发展的模式究竟是推动市场化发展,还是保

持大型国有企业主导行业的地位，民航业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样本。国际政治经济学大家苏珊·斯特兰奇认为，分析的重点在于“谁得利”。市场化改革意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造福民众以及打造现代化强国，而行业利益、部门利益究竟是推动改革发展还是阻碍经济进步，是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需要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

参考文献

- Eaton, Sarah. 2013.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dvancing State: The Case of China’s Airlines Reform.” *The China Journal* 69.

国企由谁掌控？

中国政治经济体制中形成了一个具有极强议价能力，对政府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国企集团。尽管如此，文章也指出，执政党对国企集团仍然拥有掌控力。

王韬

由于牵涉利益复杂，且事关意识形态性质，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一直争议不断。近年来，大量人才纷纷涌向国企，而民营经济面临的环境日益恶化，贷款难、“玻璃门”等现象普遍存在。

国企改革陷入僵局，普遍观点认为：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既得利益群体。中共新任总书记习近平也表示，“改革要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然而，所谓“既得利益群体”的界定并不明确。当下中国是否存在明确的国有企业势力的利益集团？国有企业集团是如何逐步形成的？它们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央决策？这一系列问题，正是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 Kjeld Erik Brødsgaard 教授在 2012 年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中试图探讨的内容。

在文中，研究者着眼于研究执政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国企势力的掌控问题上，中央的政治控制和国企的自主性两种力量兼而有之。一方面，国有企业拥有前所未有的独立经营权力，获得数额巨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由于国企高管由中央任命，党对于国企仍然拥有掌控权。

改革开放初期，行政体制改革造就了一批国有企业。为创造有效率的经济环境，简化官僚体制，原先由部级单位承担的职能逐步被若干大型企业所承接。比如，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相继成立，石油部于1988年被撤销。这一过程意味着体制内企业集团的产生。新建立的企业仍由原先行政官僚所管理，虽然转变为企业编制，其正部级的行政级别仍得以保留。

九十年代，为促进国有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号称“国家队”的央企集团形成。这些企业在利润留成、投资和国际贸易方面的自主权大幅提升。1998年，煤炭工业部、机械工业部、冶金工业部等10个原部级经济部门分别改组为国家局，交由国家经贸委管理。行政级别降低使得相关部门对其负责领域的国企集团的管理权力弱化，人员编制也大幅减少。此外，各领域大型企业兼并融合，留存2-3家大型企业。比如，中石油和中石化逐步在石油领域取得垄断地位。他们不仅享有在企业经营方面极大的自主权，在资本市场上也掌握有巨大权力。

2003年，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代表国务院管理国

有企业。但是，由于不掌握收缴利润分成和高管任命的权力，国资委对大型国企的管理权力十分有限。相关部委人员编制不足、部门间职能交错等问题导致其无法充分履行监管职能。在财政政策方面，国企利润上缴比率长期处于低水平，在舆论指责中仍然掌控高额利润。

上述历史沿革的结果是：中国政治经济体制中形成了一个具有极强议价能力，对政府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国企集团。

尽管如此，文章也指出，执政党对国企集团仍然拥有掌控力。由于国企高管大多为党员，中央有权对其进行管理。此外，中央还拥有在国企和政府部门之间人事调动的权力。这些人事控制维持了党与国企集团之间的权力平衡，避免了国企领导人对党执政权威的挑战，确保国有企业的发展服务于党的利益和政权稳定。

那么，国企到底是否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作者对此持谨慎态度。

他指出，一方面，国企集团并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政治立场，国企集团到底以何种方式对政策形成施加影响有待研究。此外，集团政治理论预先假定了一个多元化的政治制度，这一点却与目前的党政制度并不兼容。但另一方面，国企集团的成长的确导致了政策制定的利益分化，它们超出了官僚体制的运行逻辑，作为市场主体独立运作。它们拥有极大的自主权，缺乏相关部门监管。而且，入选中央委员的国企高管也形成了一股独特的政治力量。

针对国企改革困境，这篇论文与其说给出明确的解答，不

如说抛出了一系列值得探讨的问题。正如研究者在文末所言,针对国有企业集团在政治决策中的作用、党与国企的互动和博弈等问题,仍然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 Brødsgaard, Kjeld Erik. 2012. “Politics and Business Group Formation in China: The Party in Control?” *The China Quarterly* 211: 624–48. doi:10.1017/S0305741012000811

新加坡学者：土地私有化对农民有害无利

通过对近些年来中国农村研究领域出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综合整理分析,两位研究者认为土地私有化对农民弊大于利,并针对土地私有化支持者提出的几点主要理由进行了具体批驳。

张跃然

以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为标志,中央开启了新一轮的土地制度改革。这一轮改革旨在通过修改《土地管理法》、制定《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等方式,达到提高征地补偿标准的目的。虽然此番动作不涉及土地所有制改革,但不可避免的,土地所有制之争再次成为媒体和学界关注的焦点。

按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农民拥有土地使用权。除非政府征收土地,否则农民的这一权利终身受法律保护,不可被剥夺或主动让渡。同时现行《土地管理法》也规定,

农民有权使用的土地必须用作农业用途,变更土地用途必须靠政府征地来实现。近些年来,呼吁废除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明确土地私有和自由交易权利的声音在媒体与学界不绝于耳。支持土地私有化的人士认为,此举能推动农业生产规模化、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率,更好地保护农民的经济利益,加速城市化进程。

对于这一问题,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张谦和政治学副教授 John Donaldson 持截然相反的看法。通过对近些年来中国农村研究领域出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综合整理分析,两位研究者认为土地私有化对农民弊大于利,并针对土地私有化支持者提出的几点主要理由进行了具体批驳。

(一)

支持土地私有化一方认为,土地私有化通过鼓励土地流转和土地兼并,使种粮大户能获得大量土地用以大规模、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率。

但研究者指出,实证研究已经证明,中国传统的精耕细作、小规模家庭农业生产方式是资源利用效率和单位产出最高的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之所以看起来更有竞争力,是因为其通过机械和技术上的投入以及对市场的掌控,弥补了资源利用效率的不足。而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一方面是人多地少

的压力,另一方面是政府通过直接扶持或引导农民互助的方式给小规模传统农业同样提供了机械、技术、资金、市场方面的优厚条件,传统农业比现代农业更能代表中国农业的核心竞争力。

研究者进一步指出,其实现行的土地制度并未给大规模、现代化农业生产造成任何障碍——种粮大户大可通过租借土地的方式获得大量土地的实际使用权。而作为土地实际所有者的农民,也可以通过收取租金的方式共享利益。而一旦土地私有化,土地兼并加剧,大量作为土地实际所有者、靠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生产或收取土地租金为生的农民,将会成为失地农民,进入廉价工业劳动力市场或为种粮大户打工,均要受到剥削,失去稳定的生活保障。

(二)

支持土地私有化一方认为,土地私有化可以更好地抵御政府肆意征收土地、补偿不公的行为。另一方面,作为私有财产的土地可以为农民提供贷款抵押品、扩大农民的资金来源,从而更好地保护农民的经济利益。

但研究者反驳说,政府肆意征地的行为在现行制度框架下也是违法的,执法不力的责任不能归到土地所有制头上。土地私有制若要保护农民,须有两个基本条件:独立而完善的司法系统,

以及农民拥有坚实的经济基础而避免因生计所迫绝望地抛售土地。在目前中国尚不具备这两条件的情况下,现行土地制度对农民的保护效果更好。另一方面,若土地能够作为私产为农民提供贷款抵押,一旦农民因为自然灾害等原因经营不善、无力还贷,土地流失便成定局,农民利益受到极大损害。

(三)

支持土地私有化一方认为,在现行土地制度下,一旦农民迁往城市定居,其土地会被收归集体重新分配,而一旦土地私有化,农民可以通过出售土地获得迁居城市的资本,因此土地私有化会成为加快人口城镇化的动力。

研究者认为,当前阻挡农村人口城镇化的真正阻力在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而非土地所有制。以现阶段土地所有制度为基础的农村家庭代际分工(父辈务农,子女打工),恰恰是在当前政治经济环境下对农民最有利的。即使农民举家搬迁或放弃务农,也可通过出租土地的方式获得收益。在目前的户籍制度下,农民进城定居几乎不可能,最终还是要回到农村,而土地便是他们应对失业、养老等问题时最可靠的社会保障。

研究者最后指出,从最纯粹的道德立场来看,土地不应私有化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农民拥有土地的权利,是一项不能被分离、

放弃、转移、让渡的基本人权,正如美国人不能出售自己的公民投票权、加拿大人不能将免费医疗权交易变为现金一样,这项权利同样不能被商品化。在市场运作逻辑逐渐渗透到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的今天,拒绝农村土地的私有化、商品化,是保护农民权益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 Zhang, Q., and J. Donaldson. 2013. “China’s Agrarian Reform and the Privatization of Land: a contrarian view.”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2 (80): 255–72.

老板当人大代表，企业利润更高

全国人大代表逐渐摆脱“橡皮图章”的形象，利用提案和建议的制度设置推广真的政策建议。但是企业家代表的提案基本都和个人的利益攸关，大部分精力关注商业环境之上，很多时候甚至只狭窄地关注他们的细分市场，而且还高效地充当了企业的游说者。

邵立

随着新年的到来，又到了各地“两会”召开的季节。随后，新的一届全国人大将于3月举行。对于当选人大代表的企业家来说，这个五年的任期意味着什么呢？耶鲁大学的博士生 Rory Truex 在美国政治学年会提交了一篇工作论文，探讨了企业家当全国人大代表的好处。

Truex 搜集了2008年以来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料。他发现，有差不多500位代表的身份是企业CEO或事实上的一把手。他把这些企业家所在企业的业绩报告收集起来作为研究对象，然后将一些没有全国人大代表的企业的业绩作为对照组。在比较2008-2010三年的业绩后，研究者发现，有人大代表的企业具有三

个特征——更高的回报率,更高的利润,国家持股的比例一般更高。具体来说,拥有全国人大代表的企业比其他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平均高出 1.7% 到 2.3%, 边际营业利润高出 5.7% 到 8.5%。也就是说,在企业一把手当选人大代表之后,企业的经营状况会变得更好。

除了研究企业经营之外, Truex 还收集了 2008 年到 2010 年间公开报道的超过五百名人大代表的议案和建议, 观察企业家代表在人大会议里的活动。他发现, 比起非企业家代表, 企业家的议案和建议更集中在工商业的管理之上, 而不是履行作为全国代表对各类议题都应关注的责任。有的企业家甚至直白地提出有利于自己企业的议案。例如, 人大代表钟发平就提出新能源汽车产业应该有财政和政策支持——他是湖南科力远新能源公司的主席, 专门生产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的蓄电池。人大代表李大鹏在 2009 年的两会提出要增加政府资金到“现代中药”的研发上去, 而他是康莱特制药的董事长。

作者总结道, 全国人大代表逐渐摆脱“橡皮图章”的形象, 利用提案和建议的制度设置推广真的政策建议。但是企业家代表的提案基本都和个人的利益攸关, 大部分精力关注商业环境之上, 很多时候甚至只狭窄地关注他们的细分市场, 而且还高效地充当了企业的游说者。

人大代表的位置也的确给这些企业带来了明显的好处。他认为, 未来的研究需要综合考虑这些代表的职业背景、教育程度、

被提名的原因, 以及支持他的选民等因素, 用以分析这样的现象: 为什么有些企业家代表会在两会上提出比较尖锐的问题, 有的只关注自己的行业, 有的则什么都不做。

本文已刊发于 2013 年 1 月 24 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参考文献

- Truex, Rory. 2012. “Does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Matter? The Returns to Office in a ‘Rubber Stamp’ Parliament.”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http://ssrn.com/abstract=2098086>,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2098086>.

政见外交

对于中国而言，既是全球欢呼的热点，又是各国关注的焦点。都说外交是一门“艺术”，中国应该怎样操作这门艺术，中国的国际利益何在？

中国外交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他国对中国的立场、政策，中国对他国的立场、政策，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立场、政策，这些都让研究中国外交的学者深思。

这本合辑向读者介绍 10 篇研究中国外交的成果，力图囊括中国外交政策分析领域的各个角度，努力做到不放弃永恒追问，也不忽视时下热点。

“天下”取代“主权”：中国化的国际关系理论？

阿伦·卡尔森认为，随着国际社会发展，中国外交必定会越来越地强调主权概念，因为主权不再是一种“零和游戏”。从这一意义上看，源自中国古代国际关系经验的“天下体系”可能有一定作用。但正因为这一体系概念的明显排他性，现实国际关系中任何国家不会接受，反而将这种说辞理解成威胁。

宿亮

从17世纪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形成开始，“主权”概念就成为国际政治秩序的基础。然而，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演进，各种多边主义机制、组织以及跨国力量出现，人道主义干预、集体安全、主权让渡集中等原则构成了所谓“后主权时代”。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作为国际社会行为体之一的世界观，也就是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观又当如何？

康奈尔大学学者阿伦·卡尔森（Allen Carlson）在学术期刊《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撰文，梳理中国外交精英学者眼中的国际观由“主权”向“天下”的变化过程，并从这一侧面解读了“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中国仅仅是一个低调的地区行为体。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建立在主权基础上，也以此理解国际体系。外交执行者和学者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接受美国霸权，对国际多边干预持灵活的态度。这一时期，国际社会对“主权”的看法有所转变，国际集体行动增多，经由国际组织而产生的“主权让渡”程度加深。

一些中国学者开始评论外交领域过于强调“主权”在国际交往中的局限性。在承认西方所谓“主权过时论”是满足自身利益的同时，不少人意识到：不能忽视世界的变化，在使用“主权”表述时，应越来越小心，以避免陷入困境。随后，伊拉克战争、苏丹危机等涉及多边干预和联合国维和的议题中，中国逐步在外交实践中顺应这一变化，开始接受并探求诸如“全球化”、“国际社会”、“地区组织”、“利益相关方”、“人道主义危机”等概念。

基于此，很多学者开始探求国际关系理论，即国际秩序观的“中国化”。他们试图用中国历史实践构筑国际秩序的中国观念，很多人都提到了“天下体系”。

所谓“天下”，不考虑其复杂多变的哲学和文化内涵，仅仅附会在国际政治中，有几个特点——在一个其他多国依附中心国家的国际体系内，中心国家是超级大国，享有针对其他国家的比较优势；同时，不存在民族主义和主权边界。在这种观念看来，联合国只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机构，而不是全球性机构。“失败国家”等概念导致美国“赢者通吃”变成合理，这不是历史终结，

而是世界死亡。

“天下”源于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被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部分学者及一些外交实践者重新整理后,形成了“中国化理论”。也就是说,以一种全面的世界观取代传统黑白对立的观念,体现全球化的视野和国际社会等级制的特点。“天下”不是平等的国际秩序,但却是善意的国际秩序。从这一理论出发,国际社会可以存在“良性扩张”的情况。也就是说,一个奉行“天下”体系的不断扩张强国可以给依附国带来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天下”在中国学术和外交话语体系中出现时间不早,但也不算新理论。普林斯顿大学学者金淳基数十年前就提出过中国古代思想在当代中国构建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可能的作用。1979年,金淳基就提出过,古代的中华体系就是一种稳定等级社会,这种社会基于中国力量的绝对强大和在海外虚拟存在的震慑作用维持均势。另外,江忆恩、康灿雄也都谈到过这一概念。

阿伦·卡尔森认为,由于国际社会的发展,中国外交必定会越来越来少地强调主权概念,因为主权不再是一种“零和游戏”。从这一意义上看,“天下体系”可能有一定作用。但这一体系明显具有排他性,任何现实中的国家不可能接受,反而会将这种说辞理解成一种威胁。

按阿伦·卡尔森的说法,部分中国外交精英和学者严肃分析“天下体系”的可能性,甚至以之构建“中国学派”,这是值得国际社会警惕的。

中国“和平崛起”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学科讨论的重要话题，被视为构筑今后国际社会秩序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潜移默化的观念与理论决定行动，同时还决定形象的被动构建。“天下体系”作为理论争辩，有其理论趣味和思辨价值，但这一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尝试是否能真正服务于“和平崛起”，值得打上问号。

本文已刊发于 2013 年 2 月 20 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参考文献

- Carlson, Allen. 2001. “Moving Beyond Sovereignty? A brief consideration of recent changes in China’s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tianxia concep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68): 89–102.

朝核危机中的中国：从被动到主动

对比两次朝核危机，中国从一个小心翼翼的幕后协商者成为了一个积极的国际秩序构建者。转变并不是因为中国国家利益的改变，而是因为中国国家身份和自我认同经历了从韬光养晦到负责任大国的变化。

袁幼林

2013年2月12日，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再次引发了世界对于朝核危机的关注。中国对此事件的回应也成为了国际社会的焦点。在1993年以及2006年，分别发生过两次朝核危机。中国在两次危机中的应对措施分别如何？这又映射了中国什么样的变化？

韩国国际关系研究协会会长，国立仁川大学政治学教授Hochul Lee在《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中通过对中国在两次危机中具体行动的对比，认为中国从一个小心翼翼的幕后协商者成为了一个积极的国际秩序构建者。作者认为转变并不是因为中国国家利益的改变，而是因为中国国家身份和

自我认同经历了从韬光养晦到负责任大国的变化。

第一次朝鲜半岛核危机起因是朝鲜在1993年3月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的意向，美国立即回应称将此事提上安理会议程，对朝鲜进行经济制裁。1993年5月、1994年5月和6月，中国三次警告朝鲜不要跨越红线和期待中国无限的支持。在巨大的压力下，金正日最终被迫邀请美国总统卡特前往平壤进行谈判。

在第二次朝鲜半岛核危机于2003年初爆发后，中国在2003年4月即邀请朝鲜和美国前往北京共同协商，并且开展了第一次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其后，中国屡次更加强硬地对待朝鲜并且积极主持六方会谈。从第一次朝核危机的将问题交予美朝双方解决，到第二次的积极协调美朝双方并且推动对话进程，中国从“被动外交”走向了“主动外交”。

学者在分析中国在第二次朝鲜半岛核危机中的积极行动时，通常将其归因于中国的战略和安全考虑，即保持朝鲜作为缓冲区，保证东北亚稳定，确保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避免因其产生的日本韩国研制核武器的多米诺效应。这些国家利益使得中国必须主动插手朝核事务中。但是本文的研究者认为：考虑到在两次朝核危机中中国的国家利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从国家利益出发的分析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在两次危机中截然不同的作用。

作者指出：任何一个行动都是由利益和身份两者共同影响而成的，因此在两次朝核危机中国利益相同的情况下，转变的原因来自于中国国家身份和自我认同的转变——所谓的国家自我认

同指的是国家对于“我们是谁”和“我们做什么”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在两次朝核危机中,中国体现出了明显的从“韬光养晦”到“负责任大国”的国家身份转变。

作者注意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仍然按照着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的方针处理国际事务,真正的转变来自于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中,中国抵制国内的经济压力拒绝将人民币贬值,最早脱离了经济危机并且向东南亚国家提供了援助和低息贷款,得到了地区内的认同以及鼓励。这给了中国参与国际事务中更多的信心,促成了中国向“负责任大国”的转变,也导致了中国在两次朝核危机中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

参考文献

- Lee, Hochul. 2013. “China in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es: ‘interest’ and ‘identity’ in foreign behavio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2 (80): 312-31.

中国领导层和精英对“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反应

胡佛研究所《中国领导者观察》发布了考察中国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反应的报告，报告从中国官方、准官方和非官方三个方面进行考。报告认为，经贸、外交、军事等一体的美亚太战略有转向军事和安全的趋势。报告从地区战略和中美关系、美国军事战略和国防理念、美国军事存在（基地、部署和行动）、南中国海争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同时分析了中国克制反应的原因。

袁林

过去几年，美国最重要的对华政策就是转向亚太或者称之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政府和官员在各个场合都强调这一战略，来应对日益强大的中国在亚太地区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卡内基高级研究员史文在胡佛研究所《中国领导者观察》上发文考察了中国对这一战略的反应，文章从中国官方、准官方和非官方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官方考察了外交部和国防部，准官方考察了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非官方考察了民间媒体和香港媒体。

文章首先对“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行了分析，指出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三大政策支柱和目标。这一战略至少具有三

大政策支柱：一是美国强化亚太地区盟友和安全合作伙伴之间的双边关系；二是与亚太地区大国开展更为广泛深入的接触，比如中国、印度和印尼；三是更加积极和直接地参与亚太地区多边机制的建设，特别是在经济、外交和安全领域。可见，这是一个包含外交、经济、军事和安全等多位一体的美国国家战略。这一战略的目标是“美国在亚太格局及其未来的问题上拥有重要和长久的影响力”。

史文认为，这一战略 2012 年有向军事和安全方面转变的趋势。2009 年至 2011 年这一战略的经济和外交活动比较频繁，但在 2012 年的实施中却转向军事和安全领域，首先是 2012 年美国国防战略纲要强调亚太地区是全球防务优先区域，其次美国防部长帕内塔承诺美国将继续保持亚太地区优势军力，尤其是海军。这一转变或许是因为 2012 年中国在南海和东海与其邻国发生的海洋主权争端。

史文通过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地区战略和中美关系、美国军事战略和国防理念、美国军事存在（基地、部署和行动）、南中国海争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分析后发现，中国官方保持了较为克制的态度，但准官方和非官方的民间态度较为强硬。

因此，史文认为，中国的领导层和精英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保持了较为谨慎、克制的态度。文章分析原因可能有四个：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中国处在政治领导权的过渡时期。其次，由于很多亚洲国家已经对中国近期的“强硬”表现出了担忧，这

些担忧有可能被美国用来加强亚洲国家对美国政策的支持，减少强硬对抗是明智选择。否则有可能导致亚太地区势力快速极化。第三，北京可能持有这种看法：很多亚洲国家或许认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可能导致地区极化和不稳定，这样它们将减少对美国政策的支持。由此，北京采取加强同其他国家的经贸和外交联系，而避免与美国的政策直接对抗。最后，中国领导层或许不能确定“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前景如何，因此先静观其变。

史文认为，中美对于保持亚太地区稳定和繁荣所需条件的认识上，有着重大差别，这有可能加剧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分歧甚至危机。

文章的论述逻辑非常完整，其结论也建立在对诸多媒体资料的分析之上，部分观点或有猜测嫌疑，但其指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军事化倾向值得警惕，中美对亚太地区稳定和繁荣的认知分歧也需要仔细考虑。

中美关系重新启航？

美国新国家安全团队对中国的表态已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对中美关系而言，能否一扫阴霾，重新走上双赢的、建设性的道路，可能仍然需要双方的具体行动和进一步努力。

归宿

随着奥巴马新的国家安全团队组建完毕和中国“两会”的到来，中美这两个当前最具影响力的大国都将完成政府换届，步入新的历史阶段。2009年以来，中美关系走过了一段比较曲折的道路。中国在西方世界眼中“日益强硬”的对外政策和“霸道”的作风，让美国人觉得很不舒服；奥巴马政府的“转向亚太”（PIVOT）战略，也被广泛认为直接针对中国，更愈发加深了一些中国人对美国早已根深蒂固的敌视和提防心理。“中美战略互疑”甚至一度成为两国政界和学界热烈讨论的议题。

从近期奥巴马新安全团队的表态看，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华政策出现了一些变化：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讲话中只提到一次

“中国”，较前几年大幅减少；国务卿克里在任命听证会上表示支持与深化关系，并称不确信美国有必要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力；国防部长哈格尔也在听证会上表态支持增进中美两军交流，加强沟通对话，避免“因误传、误解、误判带来的风险”。这些迹象似乎暗示：美国对华政策正进入新的轨道。

事实上，去年以来，美国学界已出现了一些对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质疑和反思，“转向亚太”战略更是美学界着重批评的对象。美国学者认为，奥巴马政府误判了中国的战略意图，而在此基础上的“转向亚太”战略反而刺激了中国对美敌对心理。波士顿大学教授陆伯斌（Robert S. Ross）去年发表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的《问题重重的“转向亚太”战略》一文，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作。

作者指出，中国对外姿态日趋强硬，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对外战略发生了变化，而是因为近年来中国经济下行风险加大，社会不稳定苗头增多，中国领导层需要通过对外展现强硬姿态获取国内民众的支持，从而增加执政的合法性。

美国有很多人对于近些年来中国军力的快速增长感到“担忧”，但在作者看来，这是杞人忧天。目前中美在军力上相差甚远，美国对中国仍然保持着相当的优势。在短期内，中国在亚太地区还不具有挑战美国海上统治地位、打破地区局势平衡的能力。中国的所谓“示强”，仅仅是“纸老虎的咆哮”（Paper Tiger Roars）。

作者认为，中国领导人已意识到，相比于军事现代化方面的

不足,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遇到的问题更加值得警惕。2009至2010年间,中国的通胀率增长近十倍,房价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群体性事件频发。面对日益加剧的内忧,中国领导人“对外示强”以图增强国内凝聚力。而2010年以来美国对台军售、中日岛争等一系列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民众感到中国外部安全环境恶化,民族主义情绪急剧增长。

作者指出,奥巴马政府误判了形势,没有认识到中国政府的真正关切,转而全方位加强对中国的遏制。中美之间的互动出现恶性循环,刺激中国对外姿态更加强硬,直至发生中日钓鱼岛危机等一系列棘手难题。总之,奥巴马的“转向亚太”战略不仅没有促进亚太地区稳定,反而使地区局势紧张,发生冲突的危险加大,美国自身卷入周边国家与中国冲突的可能性也在上升。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美国的一系列举动,让中国怀疑美国是否已经放弃了长期以来奉行的对华“接触”战略,两国可能陷入直接对抗。

作者建议,美国未来的对华政策,应在维持地区秩序的同时,规避中美冲突的风险。新一届奥巴马政府应认识到,增加在亚太地区军力部署并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也不应该陷入东亚国家错综复杂的历史和领土争端。由于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亚太占绝对优势,美国有足够的实力与中国博弈。面对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保持警惕,而非过度反应,更符合美国的利益。

可以看出,学者们提出的建议已有一些被美国新国家安全团队采纳。这说明奥巴马新安全团队听到了美国学界对其对华政策

的批评,也再次表明美国政界和学界之间的沟通是畅通的,美国学界的思想成果可以有效转化为国家政策。然而,就中美关系而言,能否一扫阴霾,重新走上双赢的、建设性的道路,可能仍然需要双方的具体行动和进一步努力。

参考文献

- Ross, Robert S.. 2012. “The Problem With the Pivot: Obama’s New Asia Policy Is Unnecessary and Counterproductive.” *Foreign Affairs*.

习近平首访光环下的中俄关系： 内涵丰富，但问题多多

研究者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是标准的“基于利益的同盟”。中国主动向俄罗斯靠拢，主要考虑还是为在与美国打交道时寻找“大后方”。俄罗斯对此也是“心知肚明”，也将中国作为与西方博弈时的重量级筹码。中俄表面上亲密无间，但却远非盟友。中国的那句老话“同床异梦”，也许可能更好的描述中俄关系的现状。

归宿

3月22日-2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了俄罗斯。这是他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的首次出访，具有极强的内涵和象征意义。近日，美国智库卡内基基金会发表研究员 Douglas H. Paal 和 Dmitri Trenin 的文章《为什么习近平首先去俄罗斯?》(Why Xi Is Going to Moscow First?)，分析了习近平首访俄罗斯的原因。文章中指出，尽管习近平将俄罗斯作为出访的首站，充分体现了中俄之间良好关系和互动。但事实上，中俄之间还存在很多根深蒂固的问题，中俄关系远不能用“盟友”概括。

作者认为，习近平将俄罗斯作为出访首站，主要基于以下六点原因：

其一，中国仿照美国的传统，将与自己关系最密切的国家作为元首首次出访的目的地，正如奥巴马访问中国前要先去日本和韩国一样。而习近平此次访问俄罗斯也会和普京展现出良好的工作关系，“给奥巴马脸色看”。

其二，中俄在国际舞台上拥有广泛共同的目标和利益。中俄在朝鲜、伊朗、叙利亚问题上往往有着相似的看法，对于中国来说，普京也是应对美国“战略再平衡”时可以借重的一股力量。

其三，习近平首访俄罗斯是在给日本施加压力。去年以来，由于钓鱼岛问题发酵，中日关系持续紧张。俄罗斯与日本也存在岛屿纠纷，习近平首访俄罗斯，似乎也是在对日本说：俄罗斯是我们站在一起的。

其四，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将进一步提升中俄关系水平。特别是在军工军贸领域，中国早就想摆脱与俄罗斯之间的“买卖关系”，转而建立技术转让关系，甚至共同开发某些武器系统。近几年来，由于俄罗斯认为中国仿制俄罗斯武器对俄罗斯武器出口造成顺势，中俄军工军贸关系比较紧张，发展一直不顺。中俄双方也都想借此机会，走出这个“怪圈”，开辟一条合作的新路子。

其五，在朝鲜刚刚进行核试验，美国在东北亚“磨刀霍霍”的情况下，习近平此访也表明了中俄领导人对东北亚的关注。中国领导人担心美国借朝鲜问题将手伸进东北亚，进一步围堵和规制中国。而美国强化朝鲜半岛的导弹防御系统，表面上是针对朝鲜，实际上还是针对中国和俄罗斯。对俄罗斯而言，虽然更担心美国

和北约在西部对俄罗斯实施战略围堵,但是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环境对其也非常重要。中国也毫无疑问也是东北亚大博弈中的“好帮手”。

其六,此访标志着中俄在能源合作上取得突破。中国一直被能源短缺问题困扰,亟需俄罗斯的能源供应,普京也不想把俄罗斯能源市场的“宝”全部押在欧洲。而俄罗斯国内的一些小能源企业也渴望来自中国的资本,双方有可能在能源领域达成新的合作协议。

但作者也指出,尽管中俄关系看上去“热热闹闹”,但其实问题多多。俄罗斯始终担心中国会向其远东地区扩张,双方的“政热经冷”也一直没有得到改善:俄罗斯不满足中国仅仅将其看作能源供应基地,而中国则抱怨俄罗斯国内市场太不开放,不给中国人足够的投资机会。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的协议迟迟得不到落实,就连双方共同在黑龙江上建造一座大桥的计划都一拖再拖。而对于俄罗斯来说,欧洲属性永远是第一位的,“向西看”终究是其主要发展方向:俄罗斯多次向欧盟施压要求给予免签待遇,但却从来没有向中国提过。中俄可能在中亚地区“迎头相撞”,也给中俄关系的发展蒙上了阴影。更何况双方还存在历史和领土争端,犹如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炸。

作者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是标准的“基于利益的同盟”。中国主动向俄罗斯靠拢,主要考虑还是为在与美国打交道时寻找“大后方”。俄罗斯对此也是“心知肚明”,也将中国

作为与西方博弈时的重量级筹码。中俄表面上亲密无间,但却远非盟友。中国的那句老话“同床异梦”,也许可能更好的描述中俄关系的现状。

参考文献

- Paal, Douglas H., and Dmitri Trenin. 2013. “Why Xi Is Going to Moscow First.”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3/03/18/why-xi-is-going-to-moscow-first>.

中印竞争的影响已经“溢出”至他国

尽管领土争端是中印两国间最突出、最直接的矛盾，但随着两国实力的不断上升，中印竞争的影响早已超越双边层面，并出现“溢出效应”，对地区乃至全球格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归宿

最近，因一名女大学生在新德里搭乘黑车时被七名暴徒轮奸，印度全境爆发抗议示威浪潮。此事也在中国互联网上引发热烈讨论，有人声讨印度社会发展落后、法制不健全、民主失效。但另一些网民却认为，印度已确立民主制度，政治总体稳定，“乱也乱不到哪去”。

不同的中国人看印度的视角各有不同，而印度人看中国时似乎更加统一，而且都带着一些“瑜亮情结”。近日，詹姆斯敦基金会（The Jamestown Foundation）的“中国简报”专栏刊登了印度学者 Chietigj Bajpae 的文章。他提出，尽管领土争端是中印两国间

最突出、最直接的矛盾,但随着两国实力的不断上升,中印竞争的影响早已超越双边层面,并出现“溢出效应”,对地区乃至全球格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章称,由于中印竞争的“溢出效应”,南亚、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已经作为第三方被卷了进来。中国不断在印度周边国家(比如巴基斯坦)加大投入力度——尽管巴安全形势堪忧,但作为巴的“全天候朋友”,中国仍有60个公司的超过10000名工作人员在巴基斯坦从事122个主要工程项目建设。双方也已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在经济上深度整合。当前,中国已是巴基斯坦最大贸易伙伴。在阿富汗,继印度与阿在2011年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之后,中国也与该国在2012年6月建立起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在斯里兰卡、孟加拉和尼泊尔等国,中国的影响力也不断上升;与之对应的,则是印度的传统影响力被不断侵蚀。

当然印度也没有“闲着”。缅甸启动民主化进程后,印度和缅甸越走越近。目前,印度在缅甸的影响力仅次于中国。缅甸民主领袖昂山素季访问印度,凸显印缅两国在民主意识形态上的“共同语言”。近年来印越关系也迅速升温,印度向越南提供海军舰艇、导弹等武器装备技术支持,越南则邀请印度国有石油公司开发中越南海争议海域。特别是随着美国“战略再平衡”和中日关系恶化,印美、印日关系也成为印度外交的重要方向,印、美、日合作不断深化,2011年印度、美国、日本举行三边会谈,日本也首

次加入了印美共同举行的马拉巴海军联合演习。

在全球层面，中印竞争的“溢出效应”体现在对海上战略通道的争夺。传统上看，中印两国都是大陆型国家，对海洋权益不那么重视。但随着两国日益融入全球体系，对海洋的依存度也越来越高。中印两国出口大多依托海运，同时两国也都是能源相对匮乏的大国，都需要通过海运进口大量能源，海上战略通道对两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两国都在拓展海军实力，印度正积极将自己的海军改造成“全新的多功能海军”，并试图将势力范围从印度洋扩展到太平洋。而中国则在打造“蓝水海军”，努力冲破“第一岛链”。两国在海上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在上升：2011年7月，一艘在南海“自由通行”的印度海军船只，就接到了中国海军的警告，要求其离开中国领海。

在该文作者看来，中印竞争的“溢出效应”也带来了许多利好。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等国从中印竞争的“溢出效应”中受益颇丰。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改进，政府也获得了投资，民生也有所改善。两国对于海上战略通道的重视，也促使两国携手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共同打击海盗等非传统安全威胁。

作者最后指出，中印两国历史上并没有深仇大恨，也不像冷战时的苏联和美国一样在意识形态上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但由于两国都是潜力巨大的大国，在二十一世纪仍最有可能成为竞争

对手。作者提出,两国应管理好竞争产生的“溢出效益”,固化利好,努力建立一种“建设性竞争关系”,避免陷入恶性竞争,波及地区乃至全球权力平衡,最终导致全面失控。

参考文献

- Bajpae, Chietigi. “Spillover” in the Sino-Indian Relationship: An Indian Perspective Jamestown Foundation.” *China Brief* 12 (24).

中国已成“中亚帝国”？

中国无意间构建了自己的“中亚帝国”。之所以称为“无意间”，是因为中国政府尚未有一套深思熟虑且统一部署的中亚“大战略”，而中国在中亚影响力的崛起则更多归因于中国总体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和中亚目前的地区形势。

周航

世界大国近年来纷纷调整自身地缘战略，如美国政府的“重返亚太”战略、印度的“东望”政策等等。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认为，中国也需要地缘战略的“再平衡”，并提出了“西进”战略。其中，中亚属于这一战略关注的核心区域之一。

最近，两位长期跟踪中国与中亚双边事务的学者 Raffaello Pantucci 和 Alexandros Petersen 在 China Brief（中国简报）上发表文章，评估过去两年的双边合作关系以及未来一年的发展前景。

研究者认为，在过去两年里，没有任何一个域外国家像中国一样如此深入和广泛地影响着中亚地区的局势和发展，中国无意

间构建了自己的“中亚帝国”。之所以称为“无意间”，是因为中国政府尚未有一套深思熟虑且统一部署的中亚“大战略”，而中国在中亚影响力的崛起则更多归因于中国总体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和中亚目前的地区形势。

中国政府对其中亚政策的定调十分谨慎，主要寄望中亚能成为新疆经济发展的伙伴，并发挥“亚欧大陆桥”的作用以连接东亚和西欧。中国倡导成立的上合组织原本可成为中国影响中亚地区的重要平台，可是该组织至今在体制上仍发展不成熟，因此更多时候仅仅发挥着“象征性”的作用。长期来看，来自中国的中小企业主、边境商人，以及在孔子学院交换的学生和援助教师才是中国巩固和维持其在中亚地区地位的重要保障。

在未来的一年里，能源合作仍然是中国与中亚各国双边关系的核心。哈萨克斯坦在近年内成为中国能源供应最为稳定的来源之一，而中国也已成为哈国岸上石油勘探开采的最大投资国。分期建设完成的中哈石油管道预计从2014年起也可每年向中国输出2千万吨石油。中亚另一地区大国乌兹别克斯坦也从去年9月开始每年计划通过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向中国输气100亿立方米。

中国与土库曼斯坦在能源领域的深入合作也令许多国家“眼红”。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起始于土国，预计在未来数十年内可每年向中国输出600亿立方米天然气。这一输气量是连接里海和东南欧的跨安那托利亚管道的四倍。然而，为了防止过度依赖

中国市场和投资,尽管中石化与中石油都曾对土阿巴印天然气管道(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的建设表现出浓厚兴趣,土库曼斯坦更加希望非中国企业参与该管道的投资。

在阿富汗,尽管该国在后美国时代的和平前景未卜,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加大在阿投资。中冶集团和江西铜业搭档开采阿富汗世界级的“艾娜克铜矿”,中石油也开始在阿北部开采石油。与此同时,中国也探讨取道阿富汗北部以建立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新支线的可能性。即便是在能源资源相对匮乏的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也能发现中国企业的投资身影。

尽管中国与中亚在能源合作方面成果颇丰,但是双边关系的发展仍遇不少障碍。

在哈萨克斯坦,中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老旧油田,开采潜力小。许多当地员工对中国雇主也有诸多怨词。此外,在一些重要的双边合作项目,如建立在中哈两国霍尔果斯口岸的跨境经济贸易区,哈方投资和建设的力度与中方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以致于整个经济贸易区的建立进度缓慢。这也有可能反映出双方在经济合作方面存在一定的摩擦和不同步。

在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工人与当地百姓也不时有发生冲突。最近一次较为严重的冲突今年一月发生在中国企业在吉国南部奥什项目部的一处工地。一名当地窃贼在偷盗时被中方工人抓获,随后约百名当地村民与中国工人群殴,中方18名工人受伤。吉国的经营经商环境常为外国投资者所诟病,其他国外企业也遭遇过

类似事件。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仍鼓励中方企业扩大在吉投资。

影响中国与中亚未来经济合作发展的最大变数可能是俄罗斯提议建立的“欧亚联盟”。普京希望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关税同盟的基础上成立这一新的区域一体化组织，以协调前苏联国家的经济和货币政策。目前，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也对加入该组织表示兴趣。其中，吉尔吉斯斯坦作为中国商品进入中亚、俄罗斯和欧洲等地区的重要中转站，其加入“欧亚联盟”的可能性将对中吉双边贸易，乃至中国与中亚地区的贸易发展带来不确定因素。

作者最后指出，尽管中亚国家非常需要和期待中国的投资，但也对中国的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存有戒心。中国在中亚地区地位的上升已成事实，但中亚各国和俄罗斯将如何应对这一新局面则尚未清楚，而这也正是 2013 年里需要细心观察的。

参考文献

- Pantucci, Raffaello, and Alexandros Petersen. 2013. “China and Central Asia in 2013”, *China Brief* 13 (2).

中英“人质外交”往事

上世纪60年代末，中英之间经历一段“人质外交”。中国最高领导层在特殊政治环境中，控制国内情绪、保证外交稳定；而英方奉行“沉默外交”，没有对中国严苛制裁，促使双方谈判团队在彼此准确理解对方想法的前提下开展外交解决，避免类似美国和伊朗1979年人质事件后外交关系不断恶化的状况。

宿亮

外交是妥协的艺术。外交技巧是制造平静的技巧。一旦平静被打破，一国政府外交部门的谈判技巧随即受到极大挑战。

在漫长的外交史中，1979年伊朗扣押美国使馆人员长达444天是经典事件，直至今今天还有人指责美国政府外交团队的无能。而国际外交史上另一段互相扣押人员的经历却鲜为人知，这段经历的主角是英国政府和成立仅有二十年左右的新中国政府。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中英关系专家 Chi-Kwan Mark 在《外交与治国》杂志 (Diplomacy & Statecraft) 撰文，梳理了这段历史。

他认为，冷战之中，中英既非朋友，也不是敌人。两国之间有

很多互不赞同的地方,但又有很多共同利益。面对外交危机,他们之间的互动体现了特殊时期的外交技巧,同时体现不同政治文化间外交互动的有效做法。

1967年夏天,受到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影响,香港社会发生动荡,引发全球关注。在极左外交思想影响下,中国于5月18日关闭了在上海的英国代办处,将外交官集中到北京。7月,港英当局逮捕了中国驻香港官方新闻机构一名记者,以煽动罪名判处两年羁押。中方随即软禁英国路透社记者安东尼·格雷。

8月,形势急转直下,港英当局继续扣押中国新闻记者,而中国部分极左势力火烧英国驻京代办处。伦敦政府随即控制中国代办处,并派警力监视,导致中国外交人员与英国警方冲突。两国“人质外交”紧急展开。

当时,英国在国际上奉行“沉默外交”,并不希望卷入激烈冲突,而中英双方当时的贸易状况不错,所以英国没有孤注一掷与中国断交。

此时,中国问题专家、英方驻中国代表霍普森向伦敦发出建议,希望英国“示弱”。首先,霍普森建议伦敦做出善意姿态,争取中方信任。他强调中国人重“面子”,既然英国先在香港抓人,就应该先“服软”,这样中国也会相应让步。其次,霍普森和英国外交大臣都认为,这时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高层反对冲击英国使馆的行为并对此纠责,关系缓和的窗口已经打开。

英国随后放松中方人员在伦敦的活动范围限制;而中国也通

知霍普森将解除对英方驻京人员限制。事实上，中方高层在8月份情况恶化时就希望缓和中英关系。周恩来将冲击代表处称为极左行为，毛泽东也表示这是“坏人”所为。

中方此时取消了所有英国外交人员签证，这种情况下，英国外交官无法出境，实质上成为“人质”，而中国驻英人员，包括外交官和新闻工作和也受到同样待遇，困在伦敦。

于是，谈判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个是外交官的签证；另一个是记者格雷获释。霍普森清楚地看到，格雷事件的原因是港英当局扣押中国记者，与另外两名中国记者在伦敦遭遇签证问题的情况性质不同。所以，签证和格雷两件事要分开解决。因此他建议解决中方人员，包括新闻记者和银行工作人员的签证问题，主张“一步一步来”。

但英国外交部负责远东事务的官员认为中国的主张没有考虑英国立场——换句话说，没给英国面子。英国外交部人员担心，解决了中国记者的签证，但格雷依旧受羁押的事实可能会引发公众和议会强烈反弹。所以，英方给予中国外交官签证，但没有取消新闻机构的签证限制，主张格雷事件与签证问题“相关联”。

正如霍普森所料，中国没有因为英方让步而解除对英国外交人员的签证限制。霍普森再次急电伦敦，建议在解决格雷事件前先“搞定”外交官们的签证。霍普森建议伦敦向公众表示，不会撤出代表团，只是替换人员，这样就可以避免民众认为政府“抛弃格雷”。

就在英国政府准备做出让步、港英政府也答应了中方探视被捕记者的要求时，中国政府却没有履行承诺，仅仅对6名低级别外交人员颁发签证，没有任何一个签证给到高级外交官头上。究其原因，美国航空母舰“企业号”此间访港，这一举动被中方视为利用香港作为基地侵略越南的行为。

英国政府走出一步“硬棋”，联合多达26个国家声明支持英国对外交官的权利要求；中方在压力之下让步，包括霍普森在内的高级外交官于8月份获得签证，合法离境。

英国外交官离开中国后，两国谈判桌上剩下的任务就是解决格雷事件。一些英国外交官认为要从中英大局考虑，不宜过于压迫中国政府，要给中国“台阶”，释放在押香港的中国记者，换取格雷自由。但反对者认定，香港殖民安全最为重要，不能随意释放。

在这期间，英国媒体舆论对格雷事件疯狂介入，他们认定格雷没有享受到合理生活待遇，担心他的健康。向港英当局施压，要求其在安全条件好转的情况下释放中国记者，以换取格雷的自由。最终，英方在内部达成妥协，港英政府放弃增加刑期的准备，而为了香港司法稳定，也不考虑提前释放中国记者。

1969年10月4日，随着最后一名中国记者即将在随后一天释放，格雷在北京恢复了自由，并在4天后离境。中英两国的“人质外交”宣告结束。格雷认定，自己被“两个无耻的政府当成了抵押物”。但分析师指出，无论如何，正是两国政府的努力才导致他

获释。

这段“人质外交”将当时的中英关系带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但值得注意的是，两国同期的经济联系没有受到政治影响，1969年是两国贸易额自1950年以来最好的一年。甚至在联合国中，英国还是投票支持了让中国易于夺回联合国席位的方案。

研究者认为，中英之间的“人质外交”之所以没有导致美国和伊朗最终不断恶化的双边关系，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在特殊的国内政治环境中，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国内情绪，努力保证外交的稳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英国奉行“沉默外交”，没有对中国施加相对严苛的制裁。谈判双方当时完全准确理解了彼此的想法，英国外交团队也充分利用了舆论作用给伦敦和香港当局施压，中英的谈判方案远比美国伊朗“高明”。

外交是一门“大艺术”，特别是在外交危机发生时，能否通过谈判妥善把问题的解决和阻止关系恶化结合在一起，决定着国际关系的“阴晴圆缺”。在现代外交错综复杂的现状下，或许回溯历史也能获得教益。

本文已刊发于2013年1月30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参考文献

- Mark, Chi-Kwan, and Hostage Diplomacy. 2009. “Britain, China, and the Politics of Negotiation, 1967–1969.” *Diplomacy & Statecraft* 20: 473–93.

经济与战争：1970年代末的中越经济博弈

外交是一种大艺术，其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挥动经济杠杆，迫使对手就范。这种手段在如今的国际关系中依旧屡见不鲜。30多年前的中越关系紧张正是中国亲身操作国际经济外交的难得经历，其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

宿亮

中国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随后与越南的边境冲突持续约十年，造成人员和经济的损失。南加州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者科赛尔·帕斯（Kosal Path）把视线定格在冲突发生前几年，梳理了中国1977年至1978年对越南进行经济制裁的一段历史。

1975年，越南共和国击败南越阮文绍政权，结束了越南战争。在此之前，中国一直是越南的主要援助来源方，但越战结束使越南领导人发生了一定的心理变化。越南方面开始摆脱20世纪中期那种“学生”或“小兄弟”的自我定位，不再坚持认为中国在印度支那以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重要地位。相反，越南认定，

当自己在进行一场英雄般的战争同时，中国却把自身陷入文革的社会动荡之中。

从国内来看，越南希望用一种新斯大林主义经济模式对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中国则在国内政治动荡、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开始寻求改革开放。越南领导层心中满满都是“胜利经验”，自认为21世纪初就会成为工业国家，其他国家会期待与自己发展紧密的经贸联系；而中国则希望越南像以前一样做“忠实盟友”。双方理解上的差异导致政策上针锋相对。

与此同时，越南启动与老挝、柬埔寨和中国的边界问题谈判。中越边界冲突在美军撤离越南后不断升级，1974年冲突100起、1975年400起、1976年900起。越南违背1958年承认南沙、西沙群岛归属中国的政策，1975年接管了西贡政权此前一年非法占领的6个南沙岛屿。而苏联趁机鼓动越南在南海问题上挑战中国。

同时，越南配合边界谈判，在北部地区推行排华政策。1976年，因为害怕遭越南政府迫害，26.5万华人回国，其中95%居住在距离中国130公里的越南广宁省。

不过，从经济上看，此时的中国对越南至关重要。不少越南领导层认定，贸然激怒中国会殃及越南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中国从1955年开始，20多年来一直是越南最为慷慨的金主，庞大的国内市场还能够为越南出口提供机会。双方地缘贴近，交通网络便捷，贸易基础牢靠。

根据越南官方数字，1955年到1975年，越南从中国进口总额为20亿美元的货物，其中90%是中方援助。那20年里，在北越政权从国外输入的货物中，来自中国的货物占半数以上。

在一些经济主导型官员的推动下，越南政府一开始并不愿与中国为敌，甚至拒绝苏军进驻金兰湾军事基地。很多人意识到，一旦中国停止援助，苏联不会轻易接手中国正援建的430个项目。这些项目多在轻工业领域，是越南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而越南国内此时也危机四伏，原本支持北越的工人和农民对经济失望。

1976年，越南领导人致信中国领导人，要求中国在四年内向越南提供价值1.1万亿人民币的原材料，8000万人民币长期贷款。另外，在当时进行的120个项目中，中国应优先建设大型和重要项目，并在1980年前完工。此时的中国，三位主要领导人刚刚去世、四人帮倒台，加之自然灾害影响，拒绝了越南要求。

越南把中方的拒绝理解为：中国害怕独立的越南崛起，要想尽办法削弱越南。

中国方面，随着领土冲突不断增多、程度恶化，以及越南排华政策的深入，决定动用经济杠杆。当时双方在边界谈判中都指责对方利用谈判拖延时间；而越南华人要么被赶回中国，要么被迫迁往所谓“新经济区”。中方将这些事件理解为：越南在苏联的怂恿下对抗中国。

1978年1月，中国代表团访越期间，越南要求中国在已有46

个项目基础上,增建 15 个项目,在 1978 年完成 61 个项目;中国只承诺完成 7 个。帕斯分析,考虑到那几年的中国经济指标,中国并非没能力援助,而是决定制裁越南。

5 月,中方不再执行 1963 年《布拉格协定》中关于越南进口中国商品享有优惠价格的条款,要求中越在进行除贸易外的金融结算时,使用独立的中间货币;在双边贸易中使用硬通货结算,并适用国际货币兑换汇率。这一措施有效地削弱了越南政府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6 月,中国派船前往胡志明市解救当地华人,但由于越方不配合,解救船空船回国,让中国颜面尽失,彻底切断对越援助。

按照越南经济官员的数字,截至 1978 年 7 月 3 日,中国共完成 331 个援越项目,价值 18.77 亿人民币,而剩余被取消的 99 个项目价值 20 亿人民币(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当时为 1:1.86),被取消的项目多集中在重要的经济领域。局势随即不断恶化,直到双方兵戎相见。

帕斯认为,基于当时中国对越南经济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国内政治局势,战争是双方最坏的结果,但双方在多轮接触中相互误读和越南当时不断膨胀的民族主义热情,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战争。

外交是一种大艺术,其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挥动经济杠杆,迫使对手就范。这种手段在如今的国际关系中依旧屡见不鲜。30

多年前的中越关系紧张正是中国亲身操作国际经济外交的难得经历,其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

参考文献

- Path, Kosal. 2012. “China’s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Vietnam, 1975–1978.” *The China Quarterly* 212: 1040–58.

1969年中苏美三方关系之变：一场机缘巧合？

一直以来，学者们普遍认为 1969 年中苏边界的冲突直接导致了中美关系的缓和，以及在中美关系史上有分水岭意义的尼克松访华。然而新的史料披露证明：1969 年中苏美三方关系的变动其实缺乏规划，充满了随机性，1969 年底中美关系的缓和其实是意料之外的。

缪莹

一直以来，学者们普遍认为 1969 年中苏边界的冲突直接导致了中美关系的缓和，以及在中美关系史上有分水岭意义的尼克松访华。然而新的史料披露证明：1969 年中苏美三方关系的变动其实缺乏规划，充满了随机性，1969 年底中美关系的缓和其实是意料之外的。美国学者 Lorenz Luthi 就这个问题在《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 里做了一番解释。

从传统的研究角度来看，中苏两国 3 月份在珍宝岛的冲突是 1969 年一系列事件中的始作俑者。尼克松的国土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强调此次以苏联为首的冲突不经意地开放了中美关系缓和的机会，而学者们先前也同意珍宝岛的冲

突是之前一系列外交事件的高潮。MIT 的政治学教授 M. Taylor Fravel 和中国海事研究学院教授 Lyle Goldstein 都认为之前的证据指向中国先行威胁中苏边境，苏联而后还击。在他们看来，中国对 1968 年苏联干涉捷克先有不满，而后对苏联在中苏边境的武装戒备充满警惕，再加上毛意图通过制造一个小型国际关系危机来鼓励国家团结，种种原因合在一起造成了这一系列边境冲突事件。记者 Phillip Short 更是指出，毛曾主动要求和美国缓和外交，以便平衡和苏联之间的关系。

那么，三月的中苏边境冲突到底和中苏美三方关系有什么影响呢？在这篇研究论文里，Luthi 表示新的来自中苏美方的资料显示 1969 年的事态并非是线性发展的，三方国家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足够的政策去仔细规划事态的走向，69 年的中苏美三方关系变动在一定情况上靠的是机缘巧合。

尽管美国早在 1967 年底便有了与中国建交的宏伟展望，但尼克松团队直到 1969 年都没能给出对此可行的政策和方案。他的上台演讲似乎表示了美国想要重新打开和中国外交谈话渠道的意愿，而中方也对这种意愿表示十分欢迎，然而仅仅几天后，尼克松便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会对现有的对华政策做出任何改动，这直接导致了中国国内新一波反美浪潮。

与此同时，中苏在珍宝岛的边界展开了一系列的冲突，双方都有伤亡。苏联告知其他的华沙盟约国：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以防新的边界冲突，并同时在苏联境内播出中方带有战争威胁意味的

广播。3月，尼克松政府发表声明，称将采用一系列新的反弹道导弹系统，以防“苏联的直接攻击”，以及“在十年内中国有可能采取的攻击”。这个声明让中方十分意外，毛泽东甚至感叹道：“我们被孤立了。”

然而，在罗马尼亚、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瑞士等国共产党代表的坚持下，苏联没能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并以苏联总理柯西金（Kosygin）为代表对中国表达了和谈的愿望。1969年3月21日，柯西金试图拨打毛泽东的电话，可惜不成功——毛的接线员大骂他是“苏修分子”，并直接挂了电话。周恩来事后表示“两国开战不斩来使”，但此时中方已经收到了珍宝岛事件升级的报告，并出于战略考虑，决定拒绝电话直接联系，而是通过外交部交换信息。

此次事件后，苏联的反华宣传迎来了新一波热潮，苏联高层人物纷纷访问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以寻求“新的地方合作”，但并不成功。苏联再度尝试和中方和谈，也不甚成功——事态进入了僵局。

这个僵局最终被美国打破了。8月，美国公开发表声明说他们得知苏联有计划主动袭击中国，但史实披露他们所谓的“内部消息”其实是来自一个KGB工作人员和国防部中层人员的假设性对话。中国立刻开始了备战准备。在这个时候，苏联已经意识到中苏关系的紧张打开了中美关系缓和的大门，并及时做出了政策调整，并更多地对中方表达友好：9月，柯西金再次访华，中苏

边界一度平静下来。五天后，苏联对外声明苏联并无核战之意，可惜的是，这一举动让人想起了日本袭击珍珠港前的欲盖弥彰，从而引起了中方的怀疑。

与此同时，尽管美国口头发表声明说不会和苏联一起“对付”中国，中方高层仍然十分担心美国期望中苏开战，以便渔翁得利。叶剑英、聂荣臻等人已经推荐和美国展开外交谈判，中方也对苏联老大哥做了最后的努力：9月18日，周恩来写信给柯西金，意图让苏联停止对中国核计划的威胁。一周后，苏联回信说希望重新开展和谈，而对核弹问题一字未提。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战争即将爆发。

当然，北京所担忧的战争并没有来。在 Luthi 看来，中方当时的战略准备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国门的自闭导致了中方对国土安全问题格外敏感，第二，苏联包含侵略性的行为的确令人担忧。第三，美国在中苏问题上迟迟不明确表态，导致了中方很多猜忌。10月，美国宣布从台湾撤退战舰，这一公开声明直接确认了中美关系缓和的可能。10月到11月，中美双方都放出了一系列的友好信息，1970年1月，中美非正式外交谈判在华沙重新举行。在此次“难得友好”的会谈中，中方表示了“从根本上改善中美关系”的意愿，最终导致了1972年尼克松历史性的访华。

总的来说，中美苏三方在1969年的关系变动是一系列的猜测、巧合和意外的结果，而并非事先规划的政策性变动。美国的含糊、中国的猜疑和苏联的威胁直接导致了事态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以至到了 1969 年底, 苏联已经无法挽回中美关系缓和的大趋势。

本文已刊发于 2013 年 1 月 9 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参考文献

- Lüthi, Lorenz M.. 2012. “Restoring Chaos to History: Sino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1969.” *The China Quarterly* 210: 378–97.

政见社会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在变迁中，习惯是适应的阻碍，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顽固和落伍并非只是口头上的讥笑，而是生存机会上的威胁。”在变迁中，社会必须如一只正在捕猎的狮子，集中精力不要丧失转瞬即逝的机会。

这本合辑中收录4篇文章，记录学者们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分析，内容不一而足，关注社会思想、价值观念和教育学者们对这些问题冷静的思考和分析有益于更理性的理解这些话题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传统淡化？当下中国的婚姻和性观念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仅表现在社会经济等方面，更存在于人的观念中。其中尤其明显的，是婚姻和性方面观念的改变——尤其是在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同性恋和性交易这四个一直属于道德禁忌的话题上。那么，是否中国也在经历西方学者所谓的“传统淡化”（detraditionalisation）呢？

缪莹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仅表现在社会经济等方面，更存在于人的观念中。其中尤其明显的，是婚姻和性方面观念的改变——尤其是在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同性恋和性交易这四个一直属于道德禁忌的话题上。那么，是否中国也在经历西方学者所谓的“传统淡化”（detraditionalisation）呢？浙江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的六位学者就这个问题联合做了一番研究。

为了寻找比较全面的结果，研究者在三个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省（浙江、云南、贵州）一共抽取了两百多名20-39岁的志愿者回答这些问题，其中53%来自农村地区，55%是女性。

对婚前性行为的看法在几十年间变化最大：在1990年的一则研究里，有73%的男性和78%的女性认为处女贞洁是一个女孩最重要的财富，这个数字如今已经下降。研究者们发现，婚前性行为在当下中国十分常见。92%的农村居民和94%的城市居民表示他们认识有婚前性行为的人。多于三分之一的人对此现象表达了负面评价：略年长者中53%认为这是不好或不能接受的，略年轻者中则有44%持有这种观点。在这个问题上，地域和男女差别都不大：在认为婚前性行为不妥的人群中，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各占36%和39%，男性和女性各占39%和36%。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下接受婚前性行为的人群往往认为：只有在长期稳定交往、以结婚为前提的情况下进行性行为才是恰当的，他们大多并不赞成随便的性关系。

研究者们发现，人们对婚外性行为也持有较高的容忍度，这一点和世界上大多数社会不同：一般来说，外遇比婚前性行为更让人难以忍受。在这次的调查里，三分之一（32%）的参与者说他们认识已婚外遇人士，并有49%的人不直接反对婚外性行为，甚至表示同情，尤其当夫妻已经不爱对方之时。尽管女性比男性更憎恨外遇（65%相比于57%），也有一定数目的女性参与者认为：在婚姻里，男人的忠诚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经济能力。这意味着人们已经不再认为婚姻是实用的、为多方着想的，而更注重个人感受。

但是，尽管离婚、外遇等等逃离令人不满的婚姻的方式已经

有增多倾向，结婚生子这个经历在中国却依旧是不可避免，更没有选择的——在这一点上，中国依旧十分传统。

相比之下，同性恋这个话题更加敏感。直到2001年，同性恋才不再被普遍认为是“精神疾病”，但它依旧不被社会主流接受。哪怕是理应更宽容的大学生，在这个问题上也十分保守：01年和02年的研究表明有57%–77%的大学生完全不接受同性恋。在此次调查中，有七位参与者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同性恋；24人说他们认识身边的同志，其中18人是城市居民；64%的参与者认为同性恋是不能接受的，农村居民和女性尤甚（72%和71%）。不过，更为重要的是，也有30%的参与者对同性恋表示了宽容和接受。不过，21%的参与者对和同性恋相处表达担忧，其中13名在表示接受的同时，认为自己不想和同志接触或交友。尽管这一观念也有了开放的倾向，但大多数人还是不接受自己身边的同性恋，同志们也常常被迫进入异性婚姻。

最后，研究者们发现：有将近一半的参与者表示他们听说过参与过性交易的男性。所有的女性对性交易皆表示不赞同，但表示反对的男性只有80%。18%的参与者表示他们认识身边的性工作者，并且有三分之一的人对她们表示同情和宽容。研究者们还做出了这样的预测：在传统淡化的背景下，女性倘若能够继续独立，性交易这一行当将会逐渐衰落，因为不用付钱的性机会会很充分。

综上所述，研究者们认为这些结果表明：中国正处在观念变

化的模糊时期。在他们所问的四个问题上,传统观念和开放观念并存。这和西方学者所提出的“传统淡化”理论相符合,因为传统在“后传统”(post-traditional)世界里并不会马上消失,而相反可能更加牢固。这些并存的观念恰恰符合传统淡化理论中重要的一点:在后传统社会中,新生文化的冲击会让相当一部分的人从传统的观念和行为中寻找慰藉。

参考文献

- Zheng, Weijun, Xudong Zhou, Chi Zhou, Wei Liu, Lu Li, and Therese Hesketh. 2011. “Detraditionalisation and attitudes to sex outside marriage in China, Culture, Health & Sexu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Research, Intervention and Care* 13 (5): 497–511.

购物的政治：为什么中国人喜欢“抵制 X 货”

“消费者民族主义”特指某国消费者作为一个民族群体对外国产品的特殊喜好或厌恶，它往往和某个特定事件相连（比如钓鱼岛冲突中的抵制日货）。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可以被称为“公民消费者”：他们消费的不仅仅是商品本身，还有商品所附带的含义和宣传。

缪莹

又是一年 3·15，消费者权益保护再次成为大众目光聚焦的中心。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消费者更加被视为一个完整的、有着相近利益的整体。

实际上，相比起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倡导的权益保护，更有一种大众自发的消费者民族主义（Consumer Nationalism）存在，值得我们一窥。

“消费者民族主义”特指某国消费者作为一个民族群体对外国产品的特殊喜好或厌恶，它往往和某个特定事件相连（比如钓鱼岛冲突中的抵制日货）。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可以被称为“公

民消费者”：他们消费的不仅仅是商品本身，还有商品所附带的含义和宣传。这和“原产国印象”（Country of Origin Effect，特指对某个国家的某些产品的刻板印象，比如日本的电子产品质量好）不同，因为消费者的民族主义反射了他们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身份和忠诚。美国 Purdue 大学的 Wang Jian 曾对这一现象做了一番研究和解释。

从理论角度来说，消费者民族主义是由三种前提构成的。第一，消费可以满足个人身份的需求；第二，民族主义是全球化下不可避免的产物；第三，民族主义不仅仅和政治以及领土有关，还与文化象征有关。在哈佛学者 Karl Gerth 的眼中，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是两股互相肯定的力量，而消费主义在中国民族主义的成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 世纪的反“洋货”运动就是最好的例子，当时民族主义的广告和新闻充斥着大众媒体，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Wang Jian 指出，在消费者民族主义的情景下，一起普通事件很可能将民族消费者和某个特定的国际企业联系起来。而这个时候，媒体的重要性便突显了出来：媒体报道的角度和选择性将极大地影响到消费者的行动和印象。

以 1999 年的东芝硬盘质量问题事件为例，媒体的报道可以有三个切入点：第一，东芝同意对问题硬盘赔偿美国消费者，而不赔偿中国消费者的行为，是对中国的歧视；第二，这种行为伤害

了中国消费者的权益；第三，这种结果是两国市场情况不同的产物。很明显，前两种观点都注重于民族主义的声张，以至于有些报道主张东芝的做法是将中国消费者当成“二等消费者”，而是一种侮辱。经过分析，Wang 发现，“歧视”观点是最常见的媒体报道方式，其次是“权益损害”，最后才是“市场情况不同”。在这次风波中，东芝出现的形象并非一家跨国公司，而是彻头彻尾的日本公司，而中国消费者也不是单纯的消费者，而是彻头彻尾的中国人。在这次报道中，最常出现的词是“歧视”、“看不起”和“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之所以会有这种现象，是因为民族主义在中国消费者中有着历史性的文化共鸣，与此同时又没有另一方为此做出辩解。在某种程度上，东芝事件唤醒了中国媒体和大众深深埋在心中的民族情结——这种情结来自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史。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消费者的民族主义说明中国对自身发展过程中外国的影响感到不安。民族主义是一种强大的情绪力量，这种力量不仅仅来自于国家和民族本身，还来自于这个国家的历史象征意义，而消费和选择性消费恰恰是表达这种民族性的最佳渠道。99年的东芝事件并非唯一，从20世纪起到现在，消费者一直通过对某种产品的褒贬来表述自己的民族心。从某种角度来说，“反X货”的行动意义并不仅仅在给敌对企业带来的经济损失，而是一种大众的象征意义上的胜利。如此看来，消费者民族主义

恰恰给予了消费者们更大的权力 (empowerment), 因为它给了他们一个平台以表达互相的身份和团结。

参考文献

- Wang, Jian. 2006. "The Politics of Goods: A Case Study of Consumer Nationalism and Media Discourse in Contemporary China."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6 (2): 187–206.

中国高等教育面临五大挑战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约翰·奥布雷·道格拉斯在《社会研究》撰文指出，尽管近年投入不断增加，中国高校建设仍存五大挑战。即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贫富状况城乡、东西分化，就业市场，中国高等教育方法论，高校自主性和学术自由性。

宿亮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步伐。”目标华丽、吸引眼球，但同时越来越多人把孩子送往国外大学学习。这种对比引发讨论，中国高等教育建设目标能否如期实现？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约翰·奥布雷·道格拉斯在《社会研究》撰文指出，尽管近年投入不断增加，中国高校建设仍存五大挑战。

高等教育在中国面临的首要挑战来自经济社会的宏观变化，即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贫富状况城乡、东西分化。

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地区分布不均,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高等教育以及其他公共服务资源相对匮乏;另一方面,在5000万城市劳动力中,65%拥有城市户口,意味着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但其他人则正好相反,“户口”制度等特殊因素决定了这些人接受教育和其他服务的可能性相对低。

第二大挑战是来自就业市场。在中国、以及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亚文化中,人们对于学校教育总是寄予很大期望,认为接受教育就能改变人生,总觉得教育接受时间越长、程度越深,带来的益处越大。

在这种文化状态背景下,上大学成为更成功就业的代名词。这就导致大学毕业生过多,特别是“均质”毕业生过多;另外,政府投入大量金钱建设“研究型大学”,打造深入研究和学习特定领域的机构,而忽略了其他形式的教育机构建设。

从就业市场的需求方来看,中国经济依旧以廉价劳动力性经济为主,不需要太多高学历人才,导致不少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反而找不到工作;从供给方面看,学生又愿意集中在大城市就业,加之“海归”回国,就业压力不断增加。2012年,680万中国应届毕业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四分之一的人未能及时找到工作。

第三大挑战在于改进中国高等教育方法论。

中国文化一个特点是学者倾向于解读、诠释权威,避免争论、探讨害怕被批评,不想显示个性和独立思考,导致学术气氛不足。

总体而言，中国学生把上大学看成是吸收的过程，是听众和从属，创新能力和思维活力不如西方学生。

从教授者组成看，教师水平有待提高。75所教育部部属大学中，教授只占23%；其他大学中比例只有10%。从教学和研究方法上看，评价体系过度依赖由政府教育机构。比如政府强制要求教师发表论文和出版专著的数量，以提高排名。但执行机构似乎忽视这种政策对学校 and 个人的影响。学术文章的剽窃率增加。

2008年，浙江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的一份研究认为中国学术文章中31%涉及过高重复率，“令人无法理解”。对于中国学术文章引用率大幅上升，道格拉斯认定，大部分中国学者文章的引用源自中国国内大量新增学术刊物，实质增加有限。

高校自主性是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另一挑战。

好大学需要有效的内部激励机制和相对灵活的机构独立性，要求更加平面化的机构分布，而非垂直权力构架。

在中国，尽管不少大学在进行改革、提高水平，但几乎所有学校都必须遵循教育部规定的特定必修课，而不像国际知名大学那样自主设立课程内容。不仅在教师评定上统一管理、强制标准，教育部在大学评估也采取自上而下、制定统一标准的办法，导致学校疲于应付适应标准条目。

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最后一挑战是学术自由性有待提升。

学术自由是研究者和高校教师得以前进的重要因素。世界一流大学的学者，特别是人文学者，其研究往往不仅仅局限于自己

的领域,也会讨论许多社会问题。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更加文化自由、多元的大学应该是处于时代大问题探讨的前沿。

中国大学在学术自由方面还有不少差距。一方面,不培养对人文知识有全面认识的学生;另一方面,不鼓励教师参与全球时代性大问题的探讨。道格拉斯认为,这种大学可在多领域领先,但整体看只是顶尖大学“追随者”,而非“领导者”。

全球领先的高校是一个先进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这样的高校不仅能够培养出了不起的学生,还在社会各方面各领域成为一呼百应的“智库”。这样的高校也是所有中国人所心仪的。不少人批判高校“教而不育”,呼唤改革;同时,认清问题、有的放矢更加重要。

参考文献

- Doughlass, John Aubrey. 2012. “China Futurisms: Research Universities as leaders or followers?” *Social Research* 79 (3).

钱并不必然让国人幸福

经济收入远非影响当今中国人生活满意程度的唯一因素。即便社会经济条件相同的两个人，也可能因为在对不平等的体验和感知、对物质的欲望以及对人生的目标取向等方面存在差异，产生完全不同的生活满意程度评价。

陶郁

过去三十年间，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改变了中国人看待生活的态度。

今天，许多中国人在对自身生活状态和社会发展程度进行评判时，已不再满足于仅仅追随冷冰冰和硬梆梆的经济统计数据，而更在乎自己内心的实际感受。甚至连一向严肃正统的央视新闻，也于去年中秋国庆前后主动向街头巷尾的普通人问起了“你幸福吗”。

随着这个简单的问题迅速走红全国，各式精彩回答也层出不穷，有些让人忍俊不禁，有些使人唏嘘感叹，也有些促人长思久

虑。而对于这个简单问题的回复如此五花八门,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今国人不仅对生活水平的满意程度各不相同,甚至在界定生活是否满意的标准上也存有差异。最近,美国得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助理教授韩春萍博士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普通公民的生活满意程度,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话题。在其他国家进行的大量调研数据表明:经济条件的改善,并不必然会使人们感觉自己生活得更加幸福;相反,与经济发展所伴生的社会地位、文化价值、生活态度和心理气质等方面的改变,同样可能塑造人们评判生活是否满意的标准,而上述因素对于不同背景人群的影响往往也各不相同。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鲜有针对当今中国人生活满意度和满意观的系统研究。而韩春萍通过分析自己与不同领域多位专家合作收集的数据,有效填补了这一空白。

通过分层随机抽样,韩春萍及其合作者与中国 23 个省份中的 3267 名受访者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这些受访者年龄介于 18 岁到 70 岁之间,其中 1295 人拥有城市户口,1776 人拥有农村户口并居住在农村,196 人拥有农村户口但居住在城市。

韩春萍的分析显示:在全国范围内,有 32.3% 的受访者对生活表示满意,有 29.4% 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另有 38.2% 的受访者则表示自己的感受介于满意和不满意之间。那些拥有农村户口、教育程度较低或者生活在西部地区的人们,虽然从经济收入等客

观指标上看在社会上处境并不妙,却往往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比较满意;与此相反,那些拥有城市户口、接受过良好教育或者生活在沿海地区的人们,相对来说往往对生活现状更不满意。

可见,与其他许多国家的情况一样,经济收入远非影响当今中国人生活满意程度的唯一因素。从韩春萍的分析结果来看,即便社会经济条件相同的两个人,也可能因为在对不平等的体验和感知、对物质的欲望以及对人生的目标取向等方面存在差异,产生完全不同的生活满意程度评价。而人们对不平等的体验和感知,既有可能直接形成于在生活中遇到的坎坷,也可能是与自己进行纵向比较和与他人进行横向比较的结果。

更加有趣也更有意义的是,韩春萍发现城市居民、农村居民与流动人口判断生活满意程度的标准存在显著不同。相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城市居民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更容易受到收入、教育、生活经历、处境变化、物质欲望等因素以及与他人比较的结果所影响。而从总体上来看,流动人口对于生活现状的满意程度比较一致——这个群体的生活满意感主要受到个人生活目标取向的影响,也在某种程度上与人们的家庭收入有关。

韩春萍的研究成果,能够启发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分析当前中国社会。满意感和满意观,虽然听起来可能不如经济收入和消费水平那样直观和实际,但它们却与每名中国人都息息相关。它们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每个人日常生活的质量,更深刻影响着

整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对执政者而言，“让人民满意”具有比“让人民富有”更丰富的内涵，或许也是一个更具挑战性的目标；但是，只有让富有的人民满意起来，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本文已刊发于 2013 年 2 月 6 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参考文献

- Han, Chunping. 2012. “Satisfaction with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Reform-Era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212: 919–940.

政见对话

吴介民：海峡两岸的民主改革和公民社会

作为台湾研究公民社会和民主化问题的重要学者，吴介民教授最近接受了“政见”团队的访问，他在台海热门议题、大陆政治改革问题以及民主化相关议题上给出了他的见解。

宋广易

精彩观点预览

- ※ 中国的中产阶级，在过去三十年，都是市场经济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的受益者，到目前为止，这个阶级当中的大部分，都是在争取公民自由权利运动当中“搭便车的人”。当然，也有若干个个别运动可以见到许多中产阶级的身影，这些运动主要是和环境以及消费者权利相关的运动，因为这些议题都和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相对而言不是具有高度政治上的敏感性，风险较低。
- ※ 如果执著于民主素养不够，就不敢进行民主改革，不愿意赋

予人民更多自由，不愿意给人民参政权，这会变成一个借口，使中国可能进入更退缩的政治状态。所以，“民主素养不足论”本身是一种“反动修辞”，表面上说赞同民主政治这个进步目标，实际上却用它会造成一些反作用、反效果的可能来反对民主。

- ※ 平等权益和发展能不能同步并进？其实这个问题在历史上并不是那么悲观，以东亚四小龙，尤其是台湾为例，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一直八十年代末期的这一段时期，台湾的经济发展是被许多人当做模范的，因为它兼顾到了发展和经济权益的相对均等。
- ※ 客观条件先存而不论，我觉得人民的心中要存在一种追寻乌托邦的想像和勇气，如果他们都没有这种追寻乌托邦的想像和勇气，改革是不可能的。
- ※ 从民主发展的历史就能看到，民主化起步时经常伴随精英阶级对于群众的莫名恐惧，把群众想像成“恐怖分子”。然而事实是，中下阶层群众最后在民主化过程中并没有变成“可怕的群众”。
- ※ 一方是资本和国家的结盟，另一方是两岸公民社会的连结。从这个视野来看，两岸是有很好的合作可能性，这个合作可能性。

作为台湾研究公民社会和民主化问题的重要学者，吴介民教授最近接受了“政见”团队的访问，他在台海热门议题、大陆政治改革问题以及民主化相关议题上给出了他的见解。

吴介民教授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副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博士后研究员；曾任国立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他最近出版了《第三种中国想像》，并合编《秩序缤纷的年代：1990-2010》。

一、中产阶级与民主

政见 CNPolitics:

您曾提到，中国的中产阶级“站出来争取民主参政权”，可能性并不高。在您看来，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推动者将另有其人，还是中产阶级在推动民主化方面的能力和意愿尚未成熟？

吴介民:

中国民主化推动者将是中产阶级？或另有其人？中国中产阶级推动民主的意愿是否尚未成熟？关于这组问题，我认为大致有三个重要概念需要先厘清：民主化的动力、民主转型的不同阶段、以及中产阶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民主化的动力从哪里来？

根据西方二战之后的现代化理论，一般认为中产阶级的成熟是民主化的一个重要结构性条件。中产阶级的成熟又可以从经济水平（一般看人均 GDP）、教育水平等方面来看。这种理论实际上提供了一个结构条件论：比如，一般预测一个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可能促成民主化的条件就趋近成熟。而中国目前人均 GDP 超过 5 千美元，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

但是，观察每个国家的民主化历程，都会发现它有一个具体的民主化动能（包括行动主体性 agency 以及复杂的因果动态）。民主化在每一国家都是一个历史的动态过程。挖掘下去，会发现它有一个（或一组）推动民主化的主要因素。

我们观察这个主要因素，就会发现有的地方这个因素可能是宗教，比如说欧洲一些国家，例如英国。而在其他区域比如东亚，先以日本为例，它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有一个内生性的民主动力——大正民主，但是大正民主后来受到国内外局势影响，在地缘政治变迁的作用下，军国主义浪潮上升之后，民主化的动力就萎缩掉了。之后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战后日本的民主化动力从哪里来？其实是来自于占领军，日本目前的宪法是在占领军（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指导下建立的，因此它的西式民主体制的重建，其实是一个外铄的过程。

接下来看韩国的民主化，它内生的动因很强，而且具有某种区域渊源。全罗南道的民主化运动一直特别强劲，而“光州事件”在促进全国民主化的过程中也起了关键作用。另外，韩国民

主化还有一个因素是，从威权到民主化的过程中，一直有美军的驻扎。美军驻扎具有复杂矛盾的影响。在冷战的格局下，美军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以支撑韩国军事威权统治的功能而存在的，像朴正熙政权能够从事威权发展主义，其实跟美国有很大的关系，而“光州事件”时，韩国军队开入光州血腥镇压，一般认为至少是得到美国的“默许”。

台湾民主化也具有很强的内生性，这个内生性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党外运动（民进党于1986年成立），再往前到五十年代末期的组党运动，还有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影响。二二八事件时期，台湾已经有一些从政的知识分子、士绅阶级具有坚强的民主理念，而且在二二八事件中成立的委员会就已经在争取人民的参政权、自治和民主制度的建立。所以，如果我们把历史的轴线拉长，就会发现台湾的民主化动力，其实和台湾本土的民主化力量在面对外来统治政权的对抗有关。背后的线索，一直存在着本土性和外来性的强劲对抗。在权力分配的层次上，国民党作为一个外来政权，它同时涉及一个大量移民的历史过程，它从大陆把整个中华民国体制搬到台湾来，这个搬迁、流亡、重建的过程，又伴随著庞大的官僚人员和军事部门的迁移，以及各式各样的流亡者或逃难者，包括想要逃离中共统治的人，或者有些是下层的士官兵，这些人是被拉夫*过来的。

* 此处指的是，军队强行征召老百姓充当军中夫役。

这样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就造成台湾在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上一个重大的影响因素。台湾在 1949 年的时候，本地人口数大概在 700 万左右，之后国民党政权所带来的人口数就有 120 万人（具体数字存在著不同的估计）。对于一个 700 万人口的岛屿，突然增加了一百多万的人口，对生态资源的冲击是相当大的。回到台湾民主化的内生性问题，台湾面对的是一个外来的威权政权，把它的那套体制搬了过来，这一定会产生很多摩擦。暂且抛开政治问题不看，只看人口冲击，也可以想见这个影响是多么巨大。再加上这个政权所宣扬的意识形态和语言文化政策，和本土在地社会生活格格不入，可以想像那个被压抑、被支配、被镇压的社会潜藏著多少的不满和创伤，多少的忿怨和痛苦。（我把国民党政权在冷战时代的属性成为“类殖民体制”*。）这个社会，因此潜存著丰沛的反抗能量，当支配政权展露衰弱的迹象，当被镇压的民间社会逐渐复原、强壮的时候，就会从威权控制的弱环迸发出不满的声音。

谈台湾的民主化一定要注意到这个大的历史倾向。在这种历史倾向和政治形势下，台湾的民主运动就一波一波的产生。早在 1960 年有一个《自由中国》组党运动，筹组“中国民主党”，是外省知识与政治精英中的自由派跟本土的民主人士合作，但是那一次运动很快就被蒋介石镇压掉了，雷震自己就被关了十年。下一

* 参见〈台海上空的粉红色幽灵〉，收录于《第三种中国想像》。

波组党运动还要再等超过二十五年，直到 1986 年民进党成立的时候。

所以谈到民主化的动力，如果只看所谓中产阶级的成熟，人均 GDP 到达什么阶段，就做预测的话，其实并不精准，因为这些都属于结构条件问题，民主化需要集体行动主体上、主观上的强烈动能。

第二个是“民主参政权”的问题，这会牵涉到“政体转型”的观念（这里谈的是民主转型），即一个政体从威权到民主化，这个过程一般来说牵涉到两个阶段，一是自由化，另一是民主化——这是两个不同概念。有时候这两个阶段很贴近，几乎同步发生，有的时候则拉长时间发生。

我们首先看香港社会。它在英国殖民统治的晚期，就是 1997 年之前的一二十年间，社会的自由化程度是很高的，也就是说人民享有相当高的自由权利，受到国家机器的保障，但是香港人民基本上没有参政权，也就是说香港是一个没有民主化的自由社会。

台湾的政治自由化，有几年特别快速发展，自 1986 开始，一直到 90 年代的初期，那五、六年是属于自由化的阶段。1992 年开始全面改选立法委员（之前绝大部分立法委员都是从中国大陆跟随国民党来的老立法委员，在台湾被叫做“万年国会”），之后台湾进入民主化的转型阶段。

我们用这个视角来看今天的中国，那么现在的局面是没有民主化，而自由化呢？现在中国人享有若干自由权利，但是还有很

多权利仍被限制。

第三个问题关于所谓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的定义很纷杂,先撇开学术上的严格定义,我们暂且将之定义为:受过良好教育、从事白领或管理工作、家庭收入在中上水平的阶级、阶层、或社会群体。回过头看台湾民主化过程中,有一群中产阶级,他们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包括出钱、出力,捐款、参与街头示威游行,他们是中产阶级,但是他们不在上述这个通常意义上的中产阶级里。他们是台湾很大一群的小型企业的老板,包括台语中讲的”黑手*变头家”的一群人。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许多劳动者从学徒、师傅慢慢变成老板。很多小商小贩都算是”小头家”。他们的收入是属于中产阶级的,但是他们的教育水平,在当时可能就没有到达一般所说的中产阶级那一群人的平均水平。并且,在戒严时期,台湾的大学教育的总量控制得很严,这个社会群体在求学的阶段,一般而言也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是却不妨碍这个群体追求民主的向往。

所以,我们具体谈每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谈它的中产阶级,谈它的定义,很多特定性都要注意。反过来看中国大陆,收入在中上水平,受过比较高教育的(大专以上),职业是知识文化界、白

* “黑手”在台语中泛指具有技术的劳工、工匠、技师等,“头家”在台语中指老板。黑手自行创业就成为头家。

领管理阶层、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企业老板的“中产阶级们”，都和国家的关系很紧密，与国家有高度连带和依附性，和在台湾民主化运动中起到很大作用的“头家—中产阶级”有很大的不同。在台湾，军公教（军人、公务员、教师）一直是国民党的“铁票”。设想中国如果实施民主选举，军公教投票给哪个党？中产阶级支持谁？劳动阶级支持谁？农民支持谁？这个思考，会促使我们去想：中产阶级必然自动争取民主的这个普遍命题，是否是一个“迷思”？

总之，中国的中产阶级，在过去三十年，都是市场经济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的受益者，到目前为止，这个阶级当中的大部分，都是在争取公民自由权利运动当中“搭便车的人”。当然，也有若干个别运动可以见到许多中产阶级的身影，这些运动主要是和环境以及消费者权利相关的运动，因为这些议题都和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相对而言不具有政治上的高敏感性，风险较低。

根据中国政府每年统计的群体抗争事件，大概每年的群体抗争事件 30% 都和土地征收有关，土地征收的主要受害者是农民；还有许多群体抗争是与城市管理有关的，就是一般民众和城管产生冲突。所以，中国这些年的群体抗争主要参与者，多是市场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下的受害者，很多时候，是这些中下阶层的受害群体的集体行动在推动着这个国家的“事实上的自由化”（*de facto liberalization*）。

所以，如果期待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未来能够站出来争取民主

参政权,就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这个问题是:以什么样的政治组织,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政治参与管道,可以让中产阶级参与到争取自由民主的政治运动当中。但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答案。

政见 CNPolitics:

很多人认为现在中国的民众还不具有很高的民主素养,不能为自己在网络上或者现实中的言论和意见负责,还出现所谓“五毛”和“反五毛”,因此实现民主的条件欠缺。对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吴介民:

“五毛”,我的理解,是指国家僱用的网络评论员,是国家不信任人民,想要分化人民,才会出现这种奇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网路现象。在这个脉络底下,民主素养是一个不相干的问题。“五毛”和“反五毛”都是在扭曲的、备受压抑的环境下在网络上出现的,这当中可能会出现很多言论过激或者言词暴力。但是在一个具有文化(或文明)素养的社会,即使匿名,民众大致上也不会胡乱发言,他们会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在台湾,很多人使用代号、笔名,在网路上写文章,他们会珍惜这个代号背后所代表的发言主体,因此他们就能够得到信任、也会被敬重。

我倾向相信,只要你给人平等的权利与尊重,慢慢形成一个

公共领域,是会改善舆论品质的。民主素养问题是一个“蛋生鸡,鸡生蛋”的问题,中国社会到现在,基本上还没有体验过民主,中国人还没有真实地感受到民主是怎么运作的,民主生活的形态是什么。台湾民主经历的发展也算是很短时间,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台湾民主的许多缺陷,因此不能无限的吹捧台湾民主。而好和坏其实也都是相对的概念,我们知道台湾民主好在哪、问题在哪、怎么去改善,才能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民主政治本身就包含很多不确定性和对于人性黑暗面的承认。所以这里的问题是,如果执著在民主素养,就会在看到一些所谓的“暴民”的言论时产生恐惧感,对于民主缺乏信心,担心这些暴民掌握了“民主”的权利之后做出可怕的事情。

但是,从我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假命题,因为他是在一个不民主的环境里面,把很多不需要负责的言论都倾倒出来,如果真是进入一个民主的社会结构和民主政治体制当中,人们开口说话的时候,就会考虑到他的言论和实际的政治决策是有一种关联性的。所谓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就在这里。进入一个公共领域,沟通在一定层次上须要诚恳而真挚,讲话不能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信口开河就没有人愿意倾听。台湾网络上这种“五毛/反五毛”现象总体而言比较少。

所以说,如果执著于民主素养不够,就不敢进行民主改革,不愿意赋予人民更多自由,不愿意给人民参政权,这会变成一个借口,使中国可能进入更退缩的政治状态。所以,“民主素养不足

论”本身是一种“反动修辞”，表面上说赞同民主政治这个进步目标，实际上却用它会造成一些反作用、反效果的可能来反对民主。

最后，要补充一点，虽然拿它来作为一个藉口会使事实扭曲，但是民主素养在一个民主社会不是假命题。实际上，参与民主政治的过程，会使得民众的民主素养一步步提升，这是一个必然经过的历程。当然，我们这里还没有讨论到其他许多因素，包括劣质的资本主义和过度的商业竞争，这种种因素会让民主品质变坏或民主品质无法提升，台湾现在就有这个问题。但是，在一个威权社会，老是把“民主素养不足论”挂在嘴边，总是给人借口、托辞的感觉。

二、平等权益与快速发展之外的第三种选择

政见 CNPolitics:

您对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曾经有过严厉的批判。然而有人认为，若取消二元体制，可能就会在一定时期内涌现人口流动高峰，对城市运转造成巨大压力。对于这一矛盾，您认为当前是否有解决的途径？

吴介民:

你的这个提问本身，是站在政府和国家管理者的角度，站在

城市中上层的既得利益阶层看问题。这个问题我没办法给出解决方案,而是应该由政策制定者、智库(包括城市管理学界等等)给出解决方案。

根据我的研究,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当中,毛时代旧形态的二元体制被转型、转化、移植在新的城市体制当中。因为这种转型、转制和移植,就出现了我所称之为新形态的城市自我保护主义。也就是说,二元体制已经出现了空间转型,以前的二元体制是通过城乡二元区隔,迫使农民定居在乡村,让他们不能够自由移动到城市来;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为了释放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国家把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乡村挤压到城镇,尤其东南沿海,所以旧时代的二元体制已经被打破了,但是东南沿海在吸纳这些剩余劳动力的同时,却创造了一种新的二元体制——就是通过城市内部的许多政策规范,让这些被安置到新的城市体制的外来移民,虽然具有某种居住权,但是没有获得完整的当地的市民权或公民权,他们在城市里只能够享受二流、三流的社保、福利,或者根本没有任何福利,子女就学权利也受到严格限制,变成了次等公民。他们是在自己祖国土地上的异乡客。这样一种观点基本上很多学者都证实了。

回到这个问题:农民为什么必须离乡背井,长途移民才能谋生?在中国,这个长途移民的距离,甚至超过许多其他国家间移民的距离,比如欧洲之内国与国的距离。说到底,还是因为中国一大片区域仍是低度发展,如果没有区域间的均衡发展,这种移

民的动力就会一直存在。

另外,从人权和宪法所保障的公民权利的角度来说,对任何的移民者、或民工,他都有权利在他自己的国家内部自由移动,选择他的住所和职业,至于他们的迁徙行为在宏观上会造成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经济后果,这些因为大量移民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和政治社会议题,应该由国家来想办法解决。毕竟,移民之所以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很大程度是国家政策结果造成的,国家有责任解决这个问题。

政见 CNPolitics:

您在著作里有讲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依赖于对农民工的剥削,您如何评价这种以牺牲平等为代价的发展策略? 在平等与发展之间,您认为究竟有没有第三种选择?

吴介民:

众所周知,农民工是这些年促成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国家获得大量外汇的力量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农民工,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肯定不是这个局面,有人甚至具体算出了农民工被剥削的价值的规模。这一块被剥削的价值,就是被内资、外资、官僚国家合力拿走的。最近秦晖教授就评价说,这是一种“低人权优势”。“低人权优势”这个词本身就让人感受很深刻的反讽,后进国家要发展有很多优势,包括人口红利、制度上的快速学习,

可是用低人权去争取,实在是一件让人鼻酸的事情。在这三十年的发展中,低人权的优势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且被中国政府当做一个优势来使用。随着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未来是否还要持续低人权优势的发展策略?现在中国的发展已经到达一个关键门槛,这个门槛有没有决心要跨过去?要怎么跨?就是目前中国政府遭遇的重要难题之一。

在平等权益和快速发展之间有没有第三种选择,平等权益和发展能不能同步并进?其实这个问题在历史上并不是那么悲观,以东亚四小龙,尤其是台湾为例,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一直八十年代末期的这一段时期,台湾的经济发展是被许多人当做模范的,因为它兼顾到了发展和经济权益的相对均等(但不要忘记,当时台湾也是存在着低人权的事实)。也就是说,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它的基尼系数没有拉高,而不像现在的中国,它的基尼系数已经徘徊在5,很多人估计已经超过5的地步。所以,第三种选择是存在的。权益均等和发展之间并不是两难的问题,而是存在诸多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如何发生?这是政治问题。我们知道中国过去的发展策略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资源向东南沿海倾斜,这种非均衡的发展模式贯穿了改革开放的整个三十余年,这种发展方式某种程度上也深入人心,尤其是受益的中产阶级的内心,这群人就变成现行体制的政治支持力量。

但是目前,依靠这种发展模式持续发展的潜力已经接近耗竭,中国要依靠开发国内市场来维持经济成长、促进均衡发展,而国

内市场的发展关键在于普罗大众要有购买力。如果相反的,购买力还是集中在国家和少部分的中产阶级,国内消费市场很难发展出来。而普罗大众具有购买力的前提是,他们的工资和所得水平需要大幅度提高,他们可以在发展的大饼上分到比目前多一些的比重。追根究底,经济分配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很大程度是由政治决定。虽然这几年东南沿海民工的工资是在大幅提高,但是提升的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CPI等等指标)相比,显然没有达到应有的预期,他们的工资还不足以构成慢慢进入准中产阶级(或下层中产阶级)的条件。所以,经济发展从外向型向国内市场转移的过程顺利与否,就与是否继续维持低人权优势有关联。

总之,第三条路的选项是存在的,但是要经过多道政治关卡。

三、改革的机会永远存在

政见 CNPolitics:

您认为十八大以后的中国存在政治改革和制度改革的契机吗?您怎么看“习李新政”?

吴介民:

十八大之前中国政局已经有所变动,但统治精英内部没有分

裂。关于习李新政的氛围和期待，我们可以看到新领导班子做了很多我们可以称为“象征政治”或者“符号政治”（symbolic politics）的举措，像“四菜一汤”、禁酒、公布七常委的家庭资料、习总书记南巡到深圳不住豪华宾馆。摆出这些象征符码与身段，都是要为新人新政造一股气象或气势，每个新领袖即位之后都一定会摆出类似的姿态。

他们现在已经实际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反贪。反贪到什么程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上升到政治局常委这个层次。尽管如此，我觉得反贪对于整个中国的政治自由化氛围还是会有帮助，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让各阶层官吏的贪污腐败、寻租行为曝露在公众面前，透明化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上的进步，所以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可以乐观其成。但是，目前的贪污腐化行为的揭露，并不是靠制度改革，而是倚靠新领导班子创造的新政氛围或气势，这是维持不久的，并难以累积为制度成果。

另外一个观察点是劳教制度，公安部门已经放出风声说要改变劳教制度，但是内部似乎还没有达成共识。（最新的报导说，某些省份已经暂停受理新的劳教案。）因为把劳教制度拿掉的话，就等于把国家的警察权力砍掉一只手指。劳教制度如果真的废除，我们可以认为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改变是一个好的迹象。但具体怎么改变，到目前为止，情况还不明朗。

回到你的问题：即目前中国政治改革是不是存在契机，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些观察，回到老百姓或者公民社会这边，我觉得需

要回归到一个基本观念：改革的机会是永远存在的。客观的条件先不论，我觉得还是人民的心中要存在一种追寻乌托邦的想像和勇气，如果他们这种追寻乌托邦的想像和勇气，改革是不可能的。

人们除了必须心存乌托邦，还要能够团结在一块，催生集体行动，如果只有一个个孤立的个体有乌托邦，那没有用，那是唯心论，要能够使得原本是孤立的个体乌托邦能够连接起来，成为集体力量。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元素呢？如果人民之间没有横向组织，人民之间没有政治上的信任，如果人民之间没有集体行动，来自民间社会的改革运动就起不来，而且这些改革组织会被由上而下的力量各个击破。

刚刚说过，朝代历史告诉我们，在领导班子更换的时刻，经常让人有所期待。如果没有这个期待，我们就不会看到七十一一个知识分子共同提出“改革共识倡议书”这一行动，也不会看到《南方周末》会有“宪政梦”新年献辞的规划，这些都是因为人们心底还是存有乌托邦，他们有所期待，他们想要行动。但是，让人们期待的这个领导班子更换的历史时刻，新的领导者也总是懂得“新政”符号政治。对于改革派或者进步行动派来说，有一件事很根本：就是不能跟著新的政权的风向起舞，要很清楚，这样做可能只是策略地搭顺风车，也可能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如果跟著新政权起舞，有可能最后被利用、被消费，被分而治之，各个被击破的命运，然后在这个各个击破的过程中，个别反对运动的精

英会被拔擢。

至于历史上的对照，一样是华语世界，台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蒋经国接班时也是部署开展了新政形象，有局部的自由化倾向，那个时候就有一些知识分子团体被动员、或者主动动员起来，要求政府做这个、做那个改革，台湾的保钓运动也是那个阶段产生的。回头看那一段历史，就会发现那时的情况和现在中国的局面是有一些雷同性和可比性的。蒋经国很懂得玩符码政治，那时他开始重用一些台湾本省籍的年轻政治人物，被称为“吹台青”^{*}，就是“吹捧台湾青年”，因为当时有一个有名的歌手叫做崔苔菁，人们取谐音来讽刺这个政策。

进步派看到这个局势要冷静，要利用这个新政契机，至于具体怎么做，没有任何放诸四海皆准的普遍规则，因为具体都要在实践中摸索。这件事情，不能依靠外面的人来下指导棋，而是身处在历史风暴当中，身处在浪头上的人们，必须每个时刻做出

^{*} 蒋经国从七十年代起推行“本土化”政策。自掌握实权后，他倡言拔擢所谓“本省籍的青年才俊”，而这些被拔擢的人，被台湾民众俗称为“吹台青”（会吹牛的台湾青年），主要是由国民党所逐渐培养起来的本省籍青年党工。在1972年国民党一次提名12名党工干部竞选县市长，结果全部都获得成功，取代了旧有的地方派系。这使得国民党大受鼓舞。不料在此后的几年中，国民党这一替代政策进行得却不顺利。到八十年代后，党外势力日益活跃，最后以蒋经国在执政的最后阶段开放党禁、推行民主化转型而告终。

的决定,清醒地抉择,下一步该怎么走。

四、跨海峡的公民社会

政见 CNPolitics:

您如何评价当前台湾民主化的程度以及对于台湾的民主是“民粹”的批评?

吴介民:

我引用过钱钢的一篇“台湾游记”,他有深刻的观察和批判。钱钢前些年来过台湾,观察这裡的民主政治如何运作。

不少中国人认为台湾国会里面就是打打闹闹;还有就是新闻媒体经常报导的“民粹”。关于“民粹”这个词汇,首先想到的是我们以前经常讨论的旧俄革命前的“民粹派”,但是俄罗斯的“民粹派”所涉及的“民粹”概念和现在政治学中所说的“民粹”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我们现在使用的“民粹”概念,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结果。所以当我们谈到“民粹”,我们谈的是政治学中的英文词汇 populism,不是俄罗斯的民粹传统。

钱钢写道:有人说要看文化大革命,就到台湾看,此说大谬,非常荒唐,台湾的民粹政治怎么可能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混为一谈,完全不同一回事,不管在起因、过程、还是规模、后果,以及社

会动员的情况，都不能类比。

我要补充的是，台湾就是有一些当权派、保守派或者反动派，他们在民主运动中遭到挑战，采取一个反守为攻的角度，把这些动员群众的政治手法称为民粹。这本质上是一种污名化。这个现象跟这个观察，就通过媒体的有色眼镜传输到中国的媒体，然后中国政府也乐于通过这样的观念来诠释台湾的民主，就觉得台湾民主是可笑的、儿戏般的民粹，更好地衬托自己统治模式的优越。

这样的历史回顾，是在我刚刚说到的保守派如何泛指进步派的脉络里谈问题。现在我们跳开这个脉络来看，民主政治就它的本质，其实和政治学当中的群众主义 / 民粹，有高度的接近性，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一般在讲到政体时，大致可以分为几大类型，独裁的一人统治、少数人的元老政治集体领导、以多数统治为原则的民主政治等等。民主政治本身，就是让所有的公民，都有平等的公民权以便参与政治，所以当公民数不断增加，公民身分不再局限于所谓的中产阶级，直到接近政治共同体的所有成员的时候，才接近真正的民主的理念型。民主运动一定会动员群众，这是必然的，不动员民众是不可能民主化的。而那些所谓的有文化教养的、彬彬有礼的，这种“优雅”的中产精英，如果整天沉浸于主流想像当中，是没办法忍受这些五花八门的群众的政治行动的。可是如果这些中产精英能够改变他们的身分，调整他们的角度去审视，就会发现五花八门的群众都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是因

为意识形态差异所导致的不同的视野，这里面没有绝对的是非优劣判准。要先承认一点，就是民主政治具有差异多元性，很多“优雅”的中产阶级不能忍受的所谓“粗鄙”的行为，但是这些行为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民主活力。所以民主和民粹原本就具有亲近性，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如果没有接受这个事实，就是没有活在当代的民主政治当中。从这个认识出发，我们才能够真正处理民主衍生的问题。

怎样防止民粹变成多数暴力、破坏自由，怎样避免民粹破坏民主品质，当然也是重要的课题。但是，就我们目前关切的问题性质，这些是下个阶段的议题。

回过头看十九世纪中期的英国，正处于民主化的关键变革当中，那段历史裡，即使是当时主张改革的中产阶级，他们还是非常小心翼翼地讨论：能不能把选票交给那些在他们眼中还没有文化素养的劳工阶级和下层群众，因为如果在一人一票这个原则之下，中产阶级们担心因为这些人的文化素养不够，可能会做出令人恐惧的决定。所以从民主发展的历史就能看到，民主化起步时经常伴随精英阶级对于群众的莫名恐惧，把群众想像成“恐怖分子”。现在我们回头去看欧洲的这个过程，就会发现这些内在的恐惧有多大，而这个提问本身也投射了这样的恐惧在里面。然而事实是，英国的中下层群众最后在民主化过程中，并没有变成“可怕的群众”。

在全世界的民主政权中，用选票选出共产党政权的例子，并

不多。人们熟知的，拉美曾经有一个政权，智利的阿连德，是通过民主选票选上的，他是左派，选上之后很快就遭到政变，背后有美国操纵的痕迹，这些是少数靠民主选票选出来的左翼政权。当然拉美最近这些年有比较多的左倾的、或中间偏左的政权，像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巴西的卢拉等等，但是选出纯粹是共产党政权的例子非常少。那种右派精英所说的，群众很恐怖会用选票来从事革命的这个想法，基本上是不成立的。但是，一些人担心的，“煽动者”利用选举搞“民粹”而夺取政权，之后实施独裁统治与迫害，这是另一个问题了，不在台湾目前的政治脉络中。

政见 CNPolitics:

在两岸关系中，您如何评价“九二共识”、“台湾共识”和“一国两区”？您曾提到，“跨海峡资本联盟”将成为中国对台施加影响力的有力杠杆。台湾依靠先进的民主制度与文化，能够达到与资本力量抗衡的效果吗？

吴介民:

北京对台，最终目标就是一个中国，完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马英九的国民党政府去年拿出在“中华民国宪法”底下的所谓“一国两区”的说法，来回应北京的要求。这代表了马英九政府是怎么去迎合（或应付）北京的需求。当然，这个“一国两区”提出来之后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

台湾凭借自己现有的民主制度跟本土的民主文化,有没有可能去抗衡跨海峡的政商联盟、跨海峡的资本操作?我觉得有希望,但是很困难、很艰辛,而且变数不少。

台湾的民主制度并不完美,还有很多缺陷;台湾的公民社会日渐成型,但是还有很多弱点,没有美化的必要。我们的社会在抵抗这种“跨海峡的政商联盟”的入侵,它本身就是没有经验的。对于台湾来说,这是崭新的经验,中国的崛起有人类政治史上很多新的经验,“陆客团”就是一个“新发明”。中国人海战术一路下来,从以前的中国“一穷二白”的人海战术,变化到现在的“腰缠万贯”的人海战术。所以台湾面对的是全然崭新的现象。因为没有经验,台湾针对它的反抗运动不是传统的运动,它是新形态的,对抗资本和人民币的反抗运动。这种运动一定是且战且走,有很长时间的学习过程。台湾的公民社会在对抗这种恶质的资本攻势的时候,必须树立一种“global civil society (全球公民社会)”的理念,它必须和它香港的伙伴串联,必须跟中国社会正在兴起的社会力量交流,然后同时跟东亚诸国、国际的社会力量连接,也要诉诸普世价值、普世人权。这是一个总的想法。

台湾和大陆的进步派有合作的契机,就像这次台湾声援《南方周末》,和大陆人也声援台湾的反媒体垄断一样,其中两个阵营的分野已经浮现出来,一方是资本和国家的结盟,另一方是两岸公民社会的连结。从这个视野来看,两岸是有很好的合作可能性,这个合作可能性,是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国共合作、资本合作完全

不同的局面，那我们就开辟这个战场。这是想像中的运动，一个具有广泛的公民社会合作的可能性，这是一个理想高地，而且一些人士已经在是做了，并不是一个凭空的发明，跨海峡公共领域、跨海峡公民社会串联，是可能为一个朝向进步的社会、民主的华语世界，开创出一条新路的。

这条实践道路会遇到的险阻不少，就台湾内部而言，这个思维，就要先跟“内向性”产生对话，才能过关。这种内向性是一种总体氛围，涵盖了统独左右的光谱。台湾长期在外来政权、殖民体制统治之下，它具有一种强烈的、为了自保、为了转型正义、并追溯自身的历史身世所产生的内向性，我们不应苛责这个历史产物，因为我们自己都是这个历史性运动的产物。因此，台湾的共同体意识是某种必然的历史性，因为台湾过去是外来性的统治，台湾社会必须很珍贵地去保存它被压迫、被限缩的主体性、价值观，然后在历史变动的契机中寻找发展的机会。所以说，这肯定是在我们自己生活的圈子中去“捡”——想像你很多好的东西、优良的资产，被威权专制的统治者、被殖民国家扫到垃圾堆，很多珍贵的东西你要把它像宝一样捡回来，这样的历史进程所产生的运动的世界观，必然是在地性的与内向性的凝聚，这是无可避免的。但是目前，如果要按照我说的进入这个跨海峡公共领域的运动，这个新的局面，对于过去几十年来台湾内生的反抗运动的实作策略一定会产生冲击，

当我们要开始从事中港台的公民社会串联，这件事对于台湾

的本土派民主运动者来说,意味著你的价值系统必须调整、改变,也就是说,你的价值参考点,必须调整到一个新的座标,它能够涵纳具有本土性,可是又具有外向性、而且进步性的价值,跟普世价值系统连接。这些就意味著我们的价值系统必须更新、扩充,也意味著我们在实践价值观的过程,必须要改变日常所有思考政治的习惯。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比如说,台湾就要多花一点时间来了解香港和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对于中国,你就不再只是走马看花,这个马上就影响到有限的时间、精力的分配,其实也是整个视野的变化,你必须和你观察互动的对象交换观点来看问题,你需要同时具备批判和同理心的眼光,这个改变一定会产生陌异、不舒服、甚至痛觉,就是要不断地去要求自己做改变,改变本身不是轻松的过程。这将是缓慢发生的,是长时间的互相磨合与学习摸索的过程。

政见 CNPolitics:

您认为是否应当避免台湾经济对大陆形成依赖性?您怎么看待“陆客团”和开放陆客自由行这两件事情对于台湾和两岸关系的影响?

吴介民:

首先,我认为这种经济依赖本身就不是健康的事情,更何况这个经济依赖产生了政治杠杆。

陆客来台近来是呈现大量增加的趋势,但主要还不是自由行,基本上大多数都是“团进团出”,和香港在2003年之后推动自由行是不一样的情况。陆客来台观光的问题颇复杂。

首先,陆客团来台湾观光,带给台湾小商家的利润实际上是非常微薄的,这里面的大块利润都是被寡占资本集团以及在这个观光利益链上的政商团体赚走了,《天下杂志》曾经做过专题报道里面的一些故事与细节。

另一方面,以目前这种观光品质,陆客了解的台湾是片面的、片段的,他们来台湾七天、九天,被拉车、吃团餐、购物,看固定的地点、拍照,在一些象征性的景点像太鲁阁、日月潭之类兜风一两个小时。台湾现在基础设施也不足,以游览车为例,很多游览车司机都过度加班。还有很多导游带团都是“零团费”,最近甚至出现“负团费”的现象,因为政商利益链为了压缩成本不让导游有团费,如此“台湾游”的便宜价钱才能吸引游客,同时旅行社又要抽成,所以这些“零团费”、“负团费”就会造成导游和商家结合,带游客去买各种“台湾土特产”。买得不够的话,导游就没有钱赚,从而产生纠纷。曾经就有陆客抱怨说被关在一个商场里面不让出去,不买东西就不能离开。这种事情是政策因素使然,是非常不合理的一种观光组织方式,这其中一定会产生很多摩擦和冲突。所以我相信在这个走马看花过程里,陆客了解台湾是极其有限的,同时也引致台湾民众对陆客产生反感。比如现在台北故宫在白天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去的(已被陆客塞爆),其他各处景点情况

也类似,挤满陆客身影。最近,故宫博物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还特意设立了一段夜间开放时间。

对于台湾来说,大量的陆客来台观光对于台湾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情。还有台湾美丽湾 BOT 案的问题,看起来和中国因素无关,但是仔细思考一下还是有关的。美丽湾周边的不少海滩据说都被圈围了,准备盖度假旅馆,为了迎接更多的游客(主要是陆客)。这种情势发展,仅仅在环保生态标准低落化上面,就是一件很令人沮丧的事情,因为这样下去台湾的环境就会被糟蹋掉。

所以说,如果有深度旅游的自由行,我还是建议大陆游客选择这种,不要集中在几个固定的观光地点。其实台湾很多乡间小地方是不错的度假地,需要你待下来,慢慢品味。如果台湾政府发展深度自由行,一方面大陆游客能够摆脱这些旅游工业利益链的控制,另一方面自由行这种“慢活”的旅行方式也会使得大陆民众和台湾民众的互动好很多。到目前为止,凡是参与“陆客团”的陆客,他们在评论台湾印象时,比较容易出现负面的评价;但是来台自由行的游客,还有在台留学的陆生和交换生,就对台湾的印象好很多。

此访谈稿经过廖卿桦、廖美、张贵闵等人评论并提供修改建议,在此致谢。

本文刊发前经吴介民教授本人审订,刊发时略有删节。个人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文章链接(CNPolitics.org/2013/02/wu-jiemin),媒体及商业网站转载、摘编请联系授权: Webmaster@CNPolitics.org。

政见视图

十八大贺电背后的政党外交

十二大期间,绝大多数贺电来自信奉马克思或受其思想影响的政党。到了十八大,在460多个发来贺电的政党中,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仅占大约1/5,其余均是与中共有着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

苏颢云 / 制图师 **娜迪娅 / 特约观察员**

五年一度的党代会既是中国国内政治的核心事件,亦是观察政党外交的一个窗口。

据官方数据,截至2012年12月20日,中共十八大共收到来自174个国家460多个政党、140余个其他组织及个人的贺电函共计1013份,其中祝贺大会召开的493份,祝贺中共新任领导人当选的520份。

从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党代会,即十二大,到2012年的十八大,中国共产党与国外政党的关系究竟有着怎样的发展和变化,通过党代会的贺电来观察是一个可行的角度。

30年前的十二大,中共收到了来自20个国家的21个政党和

政界人士发出的 22 封贺电。其中绝大多数来自信奉马克思或受其思想影响的政党,如朝鲜劳动党、罗马尼亚共产党、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者联盟等。

时间推至十八大,在 460 多个发来贺电的政党中,与中国共产党同样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占约 1/5,其余是与中共有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如日本自民党、澳大利亚自由党等。这种变化是因为,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中共中央对于我国政党外交原则有了新的方向,此前以意识形态为标准的交往原则被“广交朋友”的目标替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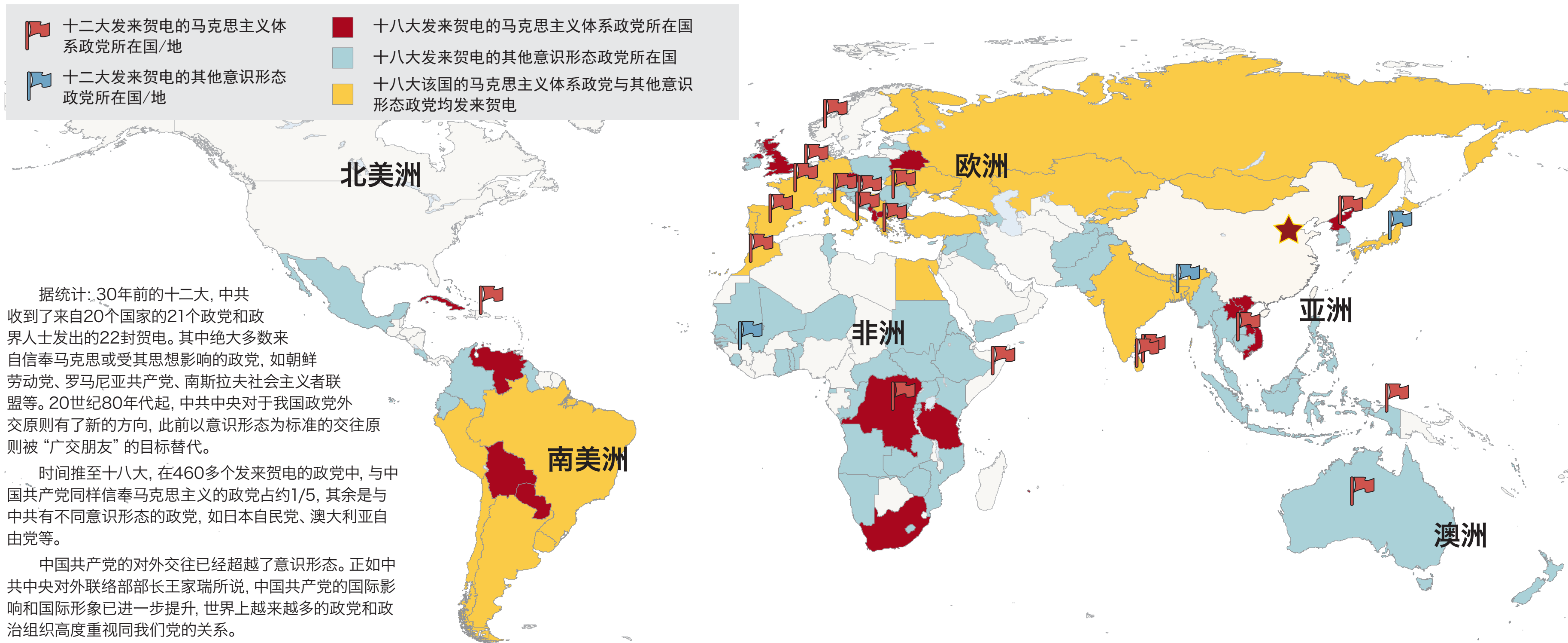
从这个数字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

解读中共十八大政党贺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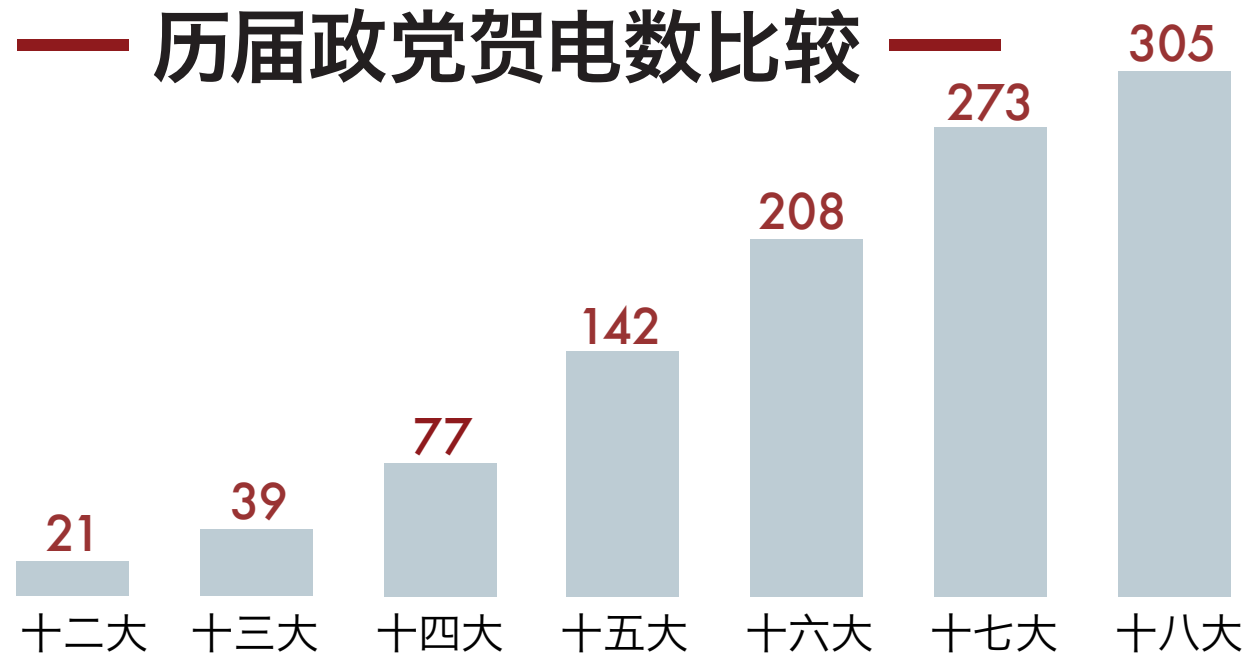
政见 CNPolitics.org

自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次党代会，即十二大，到刚刚结束不久的十八大，中国共产党与国外政党的关系究竟有着怎样的发展和变化，通过党代会的贺电来观察或许是一个可行的角度。据官方数据，截至今年12月20日，中共十八大共收到来自174个国家460多个政党、140余个其他组织及个人的贺电函共计1013份，其中祝贺大会召开的493份，祝贺中共新任领导人当选的520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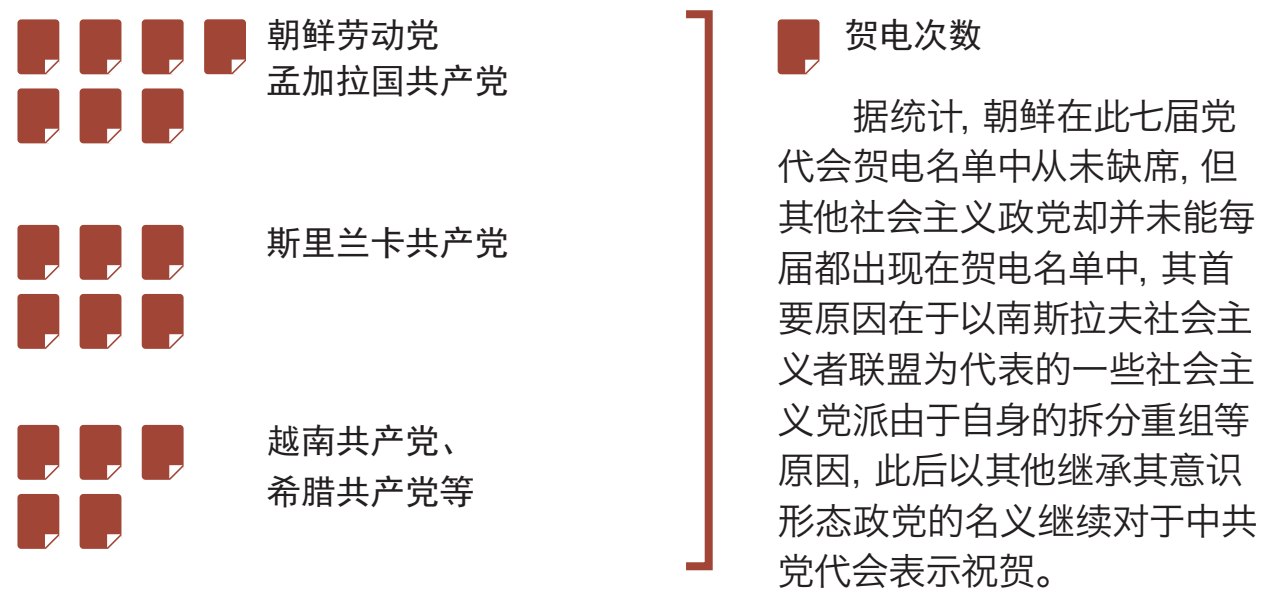
—— 十八大政党贺电地图 ——



—— 历届政党贺电数比较 ——



—— 哪些政党的支持始终如一？ ——



—— 朝鲜、日本、美国比一比 ——



CNPOLITICS.ORG

政见出品
政见 CNPolitics.org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资料库

文字：娜迪娅 | 制图：苏颢云
版权所有，欢迎个人转载，媒体等机构转载请联系
@政见CNPOLITICS

“政见”网站已获得方正字库的发布权。

图解中国官员级别

中国的官员级别结构究竟是怎样的？所谓“四套班子”是什么，它们和纪委及“两院”是什么关系？在中央层面，“党和国家领导人”指的是哪些人？在地方，不同的职务对应怎样的级别？不同级别的官员分别有多少人？

黄俊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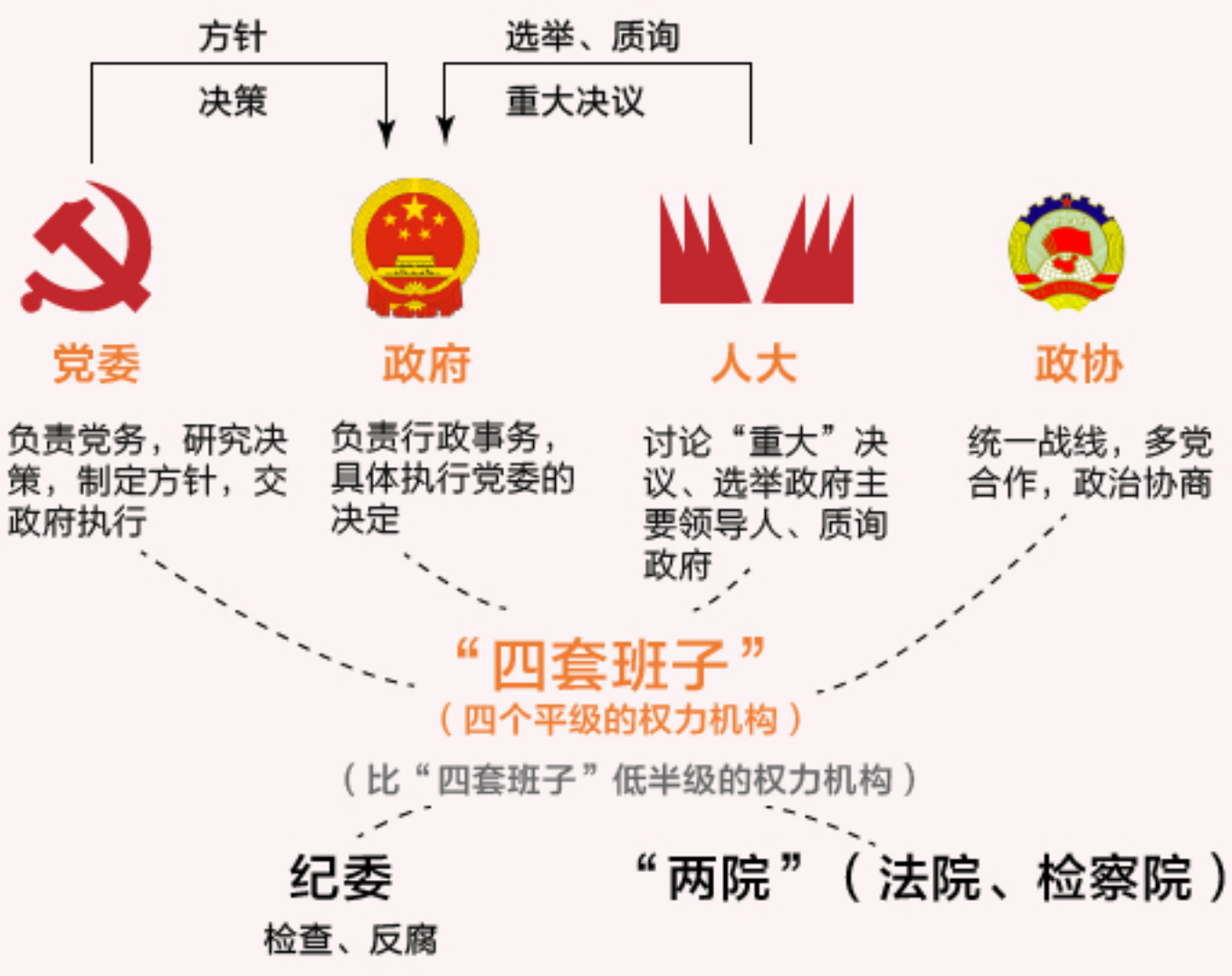
2013年“两会”落下帷幕。在过去几天中，从国家主席到总理，从“两高”到各部“掌门人”，中国新一届政府的阵容已经形成。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行政机构。根据2010年的统计数据，中国公务员数量为689.4万人（未包括参照公务员管理的群团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是拥有行政级别的官员。以下这张信息图将为您解析：中国的官员级别结构究竟是怎样的？所谓“四套班子”是什么，它们和纪委及“两院”是什么关系？在中央层面，“党和国家领导人”指的是哪些人？在地方，不同的职务对应怎样的级别？不同级别的官员分别有多少人？

图解中国官员级别

注：本图“官员”指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但未包含军警干部

政治结构



党和国家领导人

*注：红色为国家正级，橙色为国家副级，职位级别和官员实际级别可能有不同



部分特殊职位

- 具体职位的级别和该职位上的官员级别不一定对应，例如省委组织部是正厅局级单位，但组织部长一般由省委常委兼任，因此省委组织部长往往为副省部级
- 法院、检察院的政治部主任以及纪检组组长一般也为党组成员，和法院副院长、检察院副检察长级别相同

各级别官员人数一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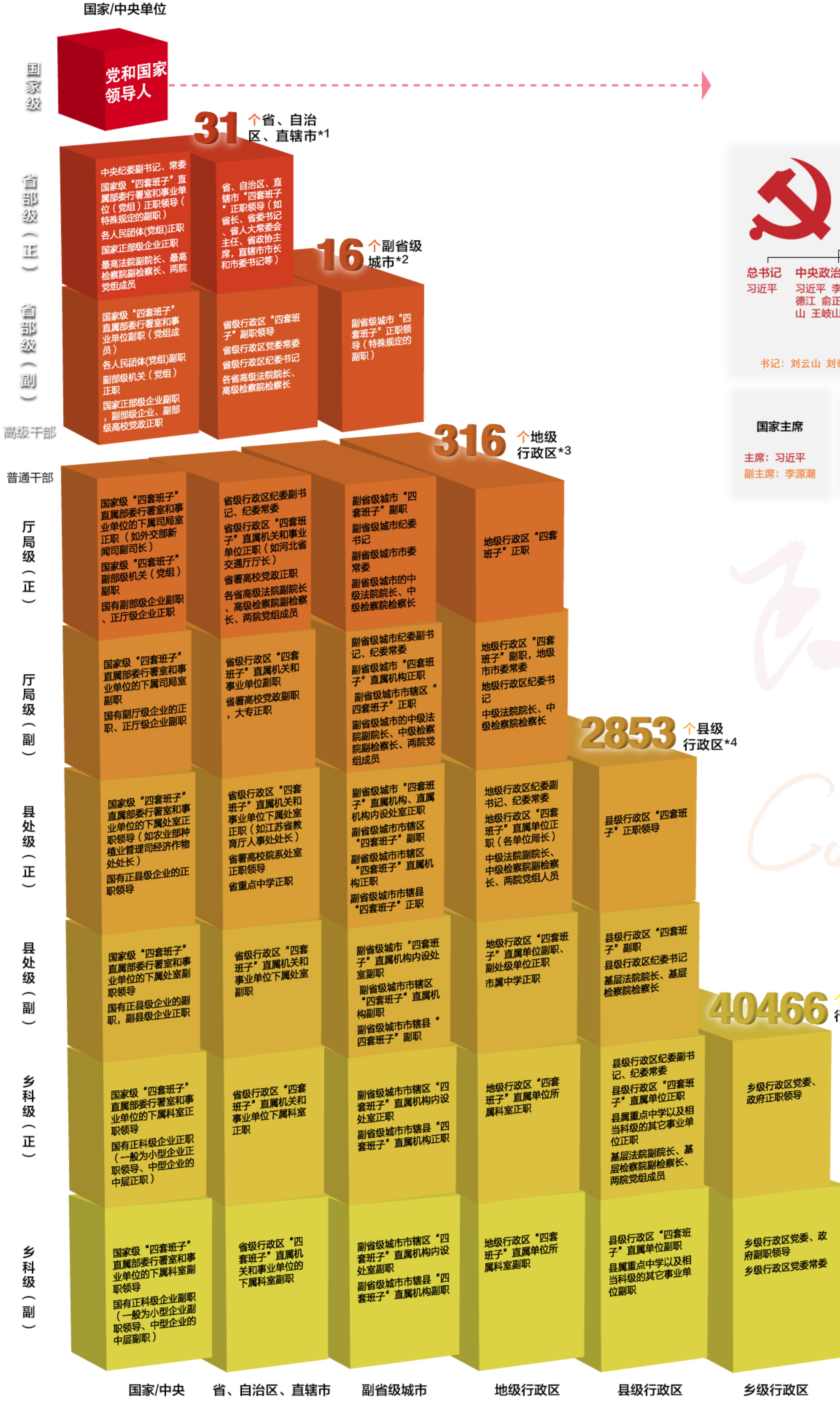


公务员总数：约6,890,000人

(党和国家领导人数为2013年3月数据，其余均据2010年数据)

行政区划简介

- *1全国共有34个省级行政区，本图未包含特别行政区，图中“省级行政区”仅指大陆地区的省级行政区，包括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 *2副省级城市包括哈尔滨、长春、沈阳、济南、南京、杭州、广州、武汉、成都、西安、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伊犁自治州
- *3全国共有332个地级行政区，包括地级市、地区、自治州、盟，316为除去了16个副省级城市后的数字
- *4县级行政区包括市辖区、县级市、县、自治县、旗、自治旗、贵州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湖北神农架林区
- *5乡级行政区包括区公所、街道办事处、镇、乡、民族乡、苏木、民族苏木



资料来源：

- 《中国干部级别一览表》，党建网，http://www.dangjian.cn/syjj/mtjj/201202/t20120223_518141_4.shtml
- 《2011年全国行政区划统计》，行政区划网，<http://www.xzqh.org/html/2008/0923/4846.html>
-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印发《关于副省级市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中编发[1995]5号
- “党和国家领导人”，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lliao/2004-06/22/content_1540150.htm
- 官员升迁时刻表(视频)，《壹读》，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zODk4Nzg0.html
- 《中国有多少部级单位？》，《南方周末》，<http://www.infzm.com/content/70110>

资料整理/制图：黄俊如

©政见CNPolitics 2013年3月

本图信息仅供参考，有错误与疏漏之处敬请不吝赐教(邮箱webmaster@cnpolitics.org)，我们将及时修改，谢谢！

政见阅读

政见书情

2012年12月至2013年2月

2012年12月至2013年2月的3个月间,有哪些与中国政治相关的著作被人们关注和讨论? 我们为你精选了以下书情。

吴瑶

改革

《The Logic and Limits of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著: Joseph Fewsmith

在过去十多年,中国已经尝试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以增加民众的政治参与,减少基层官员滥用权力,不过这一进程谨慎而缓慢,有些方面还发生了倒退。曾经长期关注高层政治的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近五六年来

将目光投向地方，他到对温州、温岭等地的考察，从基层政治的研究入手，写成《The Logic and Limits of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一书。

博士卓试图在这本书中解答这一问题：创新改革的诱因已经很充分，却为何没有足够的力量延续深化改革？通过研究一系列改革“样本”，揭示基层政权的运作方式以及各级地方官员的行为动机，博士卓指出：此类改革会深刻影响执政党的组织结构，因为它要求地方官员更多地对公众负责，而非上级部门。全书共分为五章，分别是中国政府治理的问题、自下而上的改革与自上而下的发展、党内民主、温州模式和温岭模式。

在今年初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博士卓对书中的观点作出了详细阐述。他认为，对于基层政权来说，只需简单的“对上级负责”，尽可能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发展经济，这是高压之下的体系，“从这个逻辑点出发，中国的基层官员首先考虑的不是对基层民众负责。”于是，征地纠纷或其他社会治安事件容易成为导火索，引发社会矛盾，甚至导致暴力冲突。

在书中，博士卓留意到一些地方为改变这种状况所作出的尝试，他剖析了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基层民主选举等制度化的尝试。新河镇还在编制财政预算时引入民主恳谈，博士卓认为这种做法值得借鉴。

尽管有地方试点的存在，博士卓在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采访时直言，他并没有看到中国从底层开始发生系统性转型的可能性，

“中国如果有系统性的改变,应该是自上而下的。”同时,他对于中国实现“民主化”抱着理性审慎的态度。傅士卓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演讲中还指出,与其强调“投票选举”的民主,还不如期待中国出现更自由化的政治体制,比如在基层政权中吸纳民意参与到政策决策当中。

《中国改革的歧路》

著:朱嘉明

作为经历了文革、改革开放,并且曾经投身八十年代中国政治经济改革浪潮的学者,现任教于维也纳大学的朱嘉明新近出版的《中国改革的歧路》一书给处于改革深水区之中的探索者们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本书收入的文章不多,只有三篇——一篇2011年的访谈,一篇是2012年的演讲,还有一篇半年多来记录的笔记,但观点和思想密度非常高,涉及到了改革发展的方方面面。

第一篇《中国改革的歧路:朱嘉明先生访谈录》,基于台湾《思想》杂志的这篇访谈,从朱嘉明的个人经历入手,从他经历的文革、改革开放等大事件中,寻找共和国历史的逻辑,也探讨了中国的未来。

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已经被谈论太多,朱嘉明在访谈中指出了过去三十年积累的各种负面后果,包括水资源和土壤破坏等生

态危机、以 SARS 为代表的公民卫生和健康危机、制度性贪腐等社会危机、福利水准不足带来的经济危机，还有政治统治和治理危机，“中国未来的根本挑战是：不仅要维持经济增长和发展，还要面对和正确处理过去三十年所积累的各种危机。”朱嘉明说。“中国现在到了必须回归理性的时候了。”

第二篇题为《从不断革命到持续改革：中共应对政权“合法性危机”的模式》，则追溯到建国前，讲述共产党如何通过革命、改革以确保其统治的合法性，对当下的制度作出反思。

而最后一篇《中国国情的八个关键问题》，主要着眼于政经关系和改革方向，系统简要地探讨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垄断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公司化、既得利益集团、经济增长、城市化和城镇化、执政党、国家和社会，以及中国和全球化八个问题，每一个都戳中当下改革的要害。

“如果把‘改革’比喻为行驶了三十五年的一辆列车，十几亿人是乘客，政府是车组人员。车组人员已经更换多次，车体很少维修。乘客从失望到绝望，却依然不知道这趟改革列车还要走多久，尽头在哪里。现在，已经到了全体乘客和车组人员都要面对如何把列车从歧路搬回正轨的时候了。否则，列车越走越远，难以避免出轨倾覆的危险。这样的代价是整个民族和国家所承担不起的。”在本书的前言中，朱嘉明写下了这段恳切严肃的话。

钱永祥为本书所作的序，也值得一读。

《“中产”中国：超越经济转型的新兴中国中产阶级》

编著：李成

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里，中国已经摆脱了贫困，往中等收入国家的目标迈进，中产阶级的崛起和增长被视作改革发展洪流中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的中产阶级是指哪些人？中产阶级的崛起对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会产生什么影响？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在两年前编著出版了《China's Emerging Middle Class: Beyo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一书，这是最早系统研究中国中产阶级的英文著作之一，此书的中文版新近出版。

李成关注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近二十年。据《财经国家周刊》报道，1996年，李成曾经试图出版关于上海中产阶级兴起的著作，却被出版商回绝，在外国人看来，那时中国还不存在中产阶级。十多年后，“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已经被讨论得沸沸扬扬，讨论的范畴不仅局限于社会机构和经济格局，人们开始关注其在社会和政治变革中的角色，其中不乏与美国中产阶级的对比。

李成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达到2.43亿人，占中国人口总数的23%。在这本书里，作者们从不同的分析角度审视了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和演变，讨论中产阶级的教育水平和职业构成如何，他们是否有共同的身份认同，对政治的认识和世界观是否相对统

一, 中国的中产阶级与其他国家的区别。

多位中国问题专家曾在 2010 年底布鲁金斯学会的研讨会上围绕本书探讨中国中产阶级的现状。李成乐观地认为“长远来看, 在改变中国发展轨迹的诸多力量中, 或许没有哪支力量比以爆发式快速增长的中国新兴中产阶级更为重要”, “中国中产阶级可能很快会成为一股促进政治革新的关键力量。”

李成在演讲中表示, 国家垄断、国进民退、“黑领”阶层的出现都会让中产阶级感到不满, 而中央领导层也似乎也意识到了中产阶级潜在的政治力量。他还认为, 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或有助于促进和改善中美关系, 在全球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发挥作用, 因为“中产阶级已具备相对成熟的世界观, 能更深刻地理解国际合作的作用”。

不过, 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怀默霆 (Martin K. Whyte) 对中国中产阶级的作用并没有那么乐观, 他在这场研讨会中指出, 中产阶级除了迫切要求变革, 或者是成为政治稳定的推动力之外, 还有一种最可能发生的情况是, 由于其过于庞大和多样化, 无法发挥协调一致的作用, 因此谈论整个中产阶级意义不大。

2011 年, “政见”专文介绍过这本书的英文原版。

《China's Uncertain Future》

著：Jean-Luc Domenach

此前，“政见”书情介绍的大多是来自英语国家的中国研究学者的著作，这期书情将推荐一位法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作品，主题是有关中国当下和将来在世界中的位置——巴黎政治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任杜明（Jean-Luc Domenach）的《China's Uncertain Future》一书最近翻译成英文出版。

杜明在本书研究的都是最关键的问题，包括中国经济的增长（或衰落）、政府一再拖延的民主化，潜在可能发生的政治危机，或是修正后的威权主义可能加强。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现在轻而易举地实现了一系列成就取得进步，可能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更为艰难的发展时代。

他精准细致的分析抓住了中国精英面临的艰难抉择——他们要以创新和消费为基础发展经济，压力巨大，又要改善一个法治的、有公众参与的政治体系，他们还要重新思索民族认同和空间结构，寻找到一个更为积极的路径去面对世界的难题。同时，这些领导人还被腐败问题、暴增的城镇人口等问题困扰着。杜明挖掘了这些让人焦虑的问题，尝试提出了解决之道，他认为，中国的自信和安全感远没有外界想象的那样强烈。

外交

《Lee Kuan Yew: 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著：Graham Allison；Robert D. Blackwill；Ali Wyne

短短几十年时间里，新加坡从一个不起眼的效果变身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从地缘政治到经济、文化，它都处在中西方的交汇点上。李光耀亲历并缔造了这段历史，他被称为新加坡“国父”，1959年到1990年一直担任新加坡总理，后来任内阁资政，期间经历了中美两国的多任领导人。《Lee Kuan Yew: 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一书集结了对李光耀的采访、他的演讲、撰文等，提供深刻而独特的见解。

比如，在提到中国的未来时，他说“中国希望与美国平等地共享21世纪”，并且为新中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战略建议。李光耀肯定了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地位，但也对其政治体系中的异常之处表示了担忧。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也是李光耀这本书中谈论的话题，包括印度的未来、伊斯兰恐怖主义、经济增长、地缘政治和全球化、民主化等。

对中美两国现状和将来的种种剖析，都必然引向两国地位的

较量,李光耀讨论了这些问题:“中国是否还会以快于美国三倍的经济速度发展,成为一号经济强国?“中国是否渴求成为亚洲、甚至世界第一大国?“中国会像日本那样成为西方俱乐部的荣誉会员吗?”

“如果只能问一个人,基辛格给出的答案是去问李光耀。”本书的作者、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弗尔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 Graham Allison 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 Robert D. Blackwill 今年二月在《外交政策》上撰文指出,在李光耀看来,将来十年中国还将以几倍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速度发展经济,中国领导人希望成为亚洲和世界的顶级强国,但中国不会简单地在美国缔造的世界秩序中谋求地位。“中国希望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国家,而且是作为‘中国’而不是西方俱乐部的荣誉会员被世界接受。”李光耀在 2009 年的一次演讲中曾说。

普利策奖获得者 Karen Elliott House 在华尔街日报的书评中说,李光耀坦陈了中国的问题所在,法治的缺位、腐败的普遍存在,尤其是大众对于腐败问题的痛恨是留给中国领导人的最大担忧。

李光耀还针对多元文化主义、福利国家、教育和自由市场等提供了坦率的观点。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著：David Shambaugh

“中国制造”已经遍布世界，中国对外投资、收购企业也不罕见，没有人能否认全球化浪潮全面袭来时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中国国内也在发生变化，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之下国力不断提升，甚至有人预计，到2025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第一经济大国。

现在，中国在参与全球事务的过程当中变得更为主动和果断，但它的影响力是否真的像人们认为的那么大？在《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一书中，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从五个方面回顾分析了中国登上全球化舞台的表现——外交、全球治理、经济、文化和军事实力。

与三十年前相比，中国在东亚地区发挥了更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但不满足于此，从非洲矿产、西方货币市场、中东油田到拉美农业产业，现在都有中国身影，但问题也无可回避。沈大伟指出，虽然中国的全球化存在更为广泛深入，但中国只是一个全球事务的参与者，没有掌握真正的全球权力——他因此把中国称为“不完全强国”（partial power）。比如，沈大伟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制于创新的缺乏，也不是作为“全球定调者”存在，虽然GDP数据显示其经济的健康发展，但社会分层又揭示了新的问题。

沈大伟分析认为，尽管中国没有提出明确的目标，但已经显露出对于获得世界尊重的渴望，要实现这一点，中国还需要提升自身的软实力，让自身文化吸引更多的关注、进行政治改革，改善公共关系等等。

英国《全球政策》杂志的一篇书评指出，这本书给那些鼓噪于“中国热”的人打了一针镇静剂。沈大伟认为中国的重新崛起并不预示着全球体系的潜在分裂。不过，他也提出，到今天为止中国崛起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全面，同时充斥着缺点和失误，但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要比西方国家“更为复杂和令人不安”。

《The China Fallacy: How the U.S. Can Benefit from China's Rise and Avoid Another Cold War》

著：Donald Gross

在美国政府中，相信和反对“中国威胁论”的官员们各有其人。鹰派长久以来担心，中国试图将美国“驱逐”出亚洲，称霸世界，并且威胁到美国的就业和经济繁荣。尤其是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经济很快摆脱了负面影响，甚至扮演起帮助一些国家走出经济危机的角色，“中国威胁论”因而影响了美国政府的政策制定。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为应对这些担忧采取了措施，但仍然

无法打消人们的忧虑，也无法抑制中国的发展。

在前美国国务院官员 Donald Gross 看来，这些措施都还不够。他在《The China Fallacy: How the U.S. Can Benefit from China's Rise and Avoid Another Cold War》一书中指出，美国不应该过多地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而应该按部就班落实政策。他从安全、经济、外交等多个方面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政策建议。

在安全政策方面，Donald Gross 认为美国应该重回传统的政策目标，确保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这一思想与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是吻合的。但 Donald Gross 又强调，美国在亚太地区并没有特意寻求无可争辩的霸权地位，只是在二战日本投降后顺势填补了权力空缺。

Donald Gross 提出，中美关系应该出现新范式，来建立“稳定和平”这一基石——共存和更紧密的合作。他表示，两国应该签署新的框架协议，帮助建立新的双边外交体系。虽然发展互惠合作的关系会遇到很多困难，但这样的关系是全球稳定和平的基础，“如果两国发生冷战，足以扼杀一代人在亚太地区所取得的进步。”

在这本书里，Donald Gross 还剖析了中国带来的威胁和它的“和平崛起”政策，并且讨论了核优势、贸易逆差和人权等中美官员交流中经常提到的问题。中美关系如何导致美国政策的根本性转移，如何要求两国共同努力巩固合作伙伴关系，美国的政策转

移带来了什么,它对日本、台湾、朝鲜半岛的关系有什么潜在影响,也都是书中谈论到的问题。

《The Hungry Dragon: How China's Resource Quest is Reshaping the World》

著: Sigfrido Burgos Cáceres; Sophal Ear

这本书探讨的是中国对全球能源、自然资源和稀有材料的需求,尤其以对石油的需求为突出案例。中国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等地无处不在,从经济、政治和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世界格局或将因此重塑。作者还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战略做了全面剖析。

在本书的头两章,作者分析了中国与能源市场及世界的关系,同时研究了基于中国资源需求的全球地缘政治内涵。作者以安哥拉、巴西和柬埔寨三国为案例深入说明了这些问题。

当然,中国面对的机遇和风险也在书中有所涉及,尤其是它的能源安全战略如何转化成实际的行动。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论和待解的难题,比如在全球金融危机和传统强国发出异议的声音时,如何重新平衡这些关系;在全球治理、新自由主义和贫困陷阱等背景下,获取自然资源所引发的问题;等等。

《改变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

著：马秋莎

要盘点“境外势力”给中国留下的财富，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北京留下的协和医学院一定不会被忽略。实际上，洛克菲勒留下的不仅是这座顶尖医院，它在慈善事业、乡村建设等领域亦颇有建树。美国欧柏林大学教授马秋莎所著的《改变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回顾了它与中国合作的漫长历史——立足于“改变”，基金会遭遇过成败得失，这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

洛克菲勒是最早进入中国的海外基金会之一，1915年创办的协和医学院，被称为“洛克菲勒基金会上闪光的宝石，1916年到1947年的32年间，基金会用于协和的拨款总额就达到了4465万美元。当然基金会不止关注精英的医疗教育，在中国的乡村也投入了热忱，开展平民教育运动。建国后，基金会虽然退出了内地，但改革开放之后，它又成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外国非政府组织，到现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已经与农科院、中科院等国内学术机构结成紧密的合作关系。

中港

《边城对话：香港·中国·边缘·边界》

编：彭丽君

香港回归十五年，与内地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

“内地”一词在香港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从“国民教育”到“双非孕妇”、“奶粉水客”，这些都影响了香港人的日常生活。也有香港人担心，内地的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香港作为金融港口的需求会渐渐地被忽视。

在《边城对话：香港·中国·边缘·边界》一书中，13位学者和专业人士从各自领域剖析了“边缘化”之于香港的含义，探索中港关系的多元性。

第一部分的四篇文章，都是从历史和地理的宏观角度探讨中国边界的构成，关注边缘论述的历史性，作者们跳出了香港，甚至追溯了从清朝到现在中央政府的边疆政策，纳入了西藏和台湾的鲜活案例。也有作者从文化统一的角度出发，理解少数民族音乐在正统历史中的生存状况，探究统一文字背景下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

在第二部分当中，潘毅写的富士康、陈顺馨写的中国农村，则关注国内弱势群体的状况，借此分析边缘和中心的关系。

重头戏还是在中港关系的第三部分，周耀辉讨论香港流行文化的边缘化，马杰伟则探讨港人的身份认同，李祖巧从建制派的地位变化做了剖析。

编者彭丽君在导论中指出，“边界的生活容易被边缘化，但是又因着其他的权力因素影响，边界可以成为中心。香港人和中国的很少数民族都生活在国家的边界，但香港的境遇特殊，不但没有被边缘化，反而成为进步的指标，又或者，中国的沿海地区才是这个国家的中心。我们无法让自己成为真正的国家边缘，但我们可以通过对边缘生活的关心和阅读，发展一种比较理智的模式，反思自己跟权力的关系。”

社会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in China》

著：Timothy Hildebrandt

虽然不少既有事实已经证明：NGO 等社会组织有能力改变政治现状，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威权国家，NGO 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在其他国家出现过的改变。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中国政治学讲师 Timothy Hildebrandt 在这本书里就讲述了这种不同以往的状况。不仅如此，他还探究了中国的 NGO 怎样适应中央和地方政府不

断变化的利益需求,甚至为国家服务,解决社会问题。因此,中国 NGO 的成长壮大等于助政府一臂之力,而非削弱它的权力。

作者对比分析了中国的环保、预防艾滋及 HIV、同性恋组织等三类 NGO,但他又不仅仅局限于这三类组织。“这本书是关于 NGO 在中国生存的复杂环境,以及威权政治背景下,国家 - 社会关系发生变化的一面。”作者在序言中说。

NGO 为适应当下环境的行为,对组织本身有什么影响,对这个国家呢?他认为,中国的 NGO 和政府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互相依赖关系,一方面,政府需要 NGO 的协助进行治理,尤其是在创新和加强社会管理的背景下,这个需求显得更为迫切;另一方面,NGO 需要政府释放足够的政治、经济、私人领域的机会来维持生存。

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提出放宽社会组织登记注册的门槛,最新表态来自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可以直接申请登记,但政治法律类、宗教类等社会组织以及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代表机构并不在此列。

此前“政见”曾经介绍过 Timothy Hildebrandt 的关于中国社会组织登记的研究。

史论

《China on Film: A Century of Exploration, Confrontation, and Controversy》

著：Paul G. Pickowicz

这是一部关于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史的书籍。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历史系特聘教授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研究中国电影三十多年，他回顾了中国电影制作的发展历程，并认为它与中国的历史和政治紧密相关。在不同的阶段，毕克伟提出特定的关键词展开研究，比如20年代默片中现代婚姻的定义变迁，30年代电影里东西方的文化冲突，三四十年代对夸张表现手法的追捧，还有40年代在日据时期的上海电影生产的政治化争论。作者还探究了内战时期电影的关键角色。

当然，毛时代的电影历史是一定要提到的。在这些章节里，毕克伟记录了那些与新中国格格不入的银幕上的传奇人物，在后革命时代为了继续获得关注，用艺术和政治武装自己的名人，60年代积极反抗文革极端产物的电影专业人士，等等。而毛时代之后，出产的电影有过一段时间的集中宣泄，也有电影打了民运的擦边球，到了90年代，地下电影和独立电影渐渐兴起。

在漫长的电影史中，中国好像被卷入了看似无止境的战争、

革命和冲突的社会变革里,虽然存在着审查制度的障碍,中国电影人还是会想法子在电影里表达政治观点,参与当下最受关注的社会、文化、经济议题的讨论。毕克伟没有回避中国电影人经常遭遇的痛苦의辩论和争议,反而以此入手作为一个独特而深刻的视角,展示了中国文化和社会特征。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对此书的评价是,“它就是历史、电影、政治、人性的万花筒,折射了近百年纷乱的图景,跨度非常惊人。”

《Reinventing Modern China: Imag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

著: Huaiyin Li

我们读到的历史是如何写就的,它为谁服务?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教授李怀印在《Reinventing Modern China》中给出了答案。他剖析了鸦片战争至今的中国近现代史撰写的轨迹——无论什么政治背景,对抗、论争和妥协之后的书写是不变的主线。李怀印发现,尽管历史学家们努力如实还原历史,但最后总是不可避免地写出既符合现实议程,又为政治合法性服务的历史。

从鸦片战争到建国前,历史叙事有“现代化”和“革命”两大

主导方式，到了 1949 以后，抑制浪漫主义的学科化叙事和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激进化叙事相继出现，除了反映执政党内部的斗争之外，也揭示出历史学家与社会背景的关系。

在李怀印看来，改革开放是中国现代史撰写的一个转折点，那时，历史学家们开始以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作为工具，重新书写宏大的中国历史，不同于以往强调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深处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学家们更多地将目光投向普通人，投向地方，投向大时代背后的日常社会。

但“历史如何书写”这个问题和历史本身一样，一直处于开放的被书写的状态。现在的历史学家需要在宏大叙事和微观研究之间找到平衡点，当然，他们仍在努力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对历史书写的操控——它虽然呈现越来越少的趋势，但并未消失。

文体传媒

《Politicisation of Sport in Modern China, The: Communists and Champions》

著：Hong Fan; Zhouxiang Lu

当人们讨论如果没有“举国体制”，中国能不能诞生这么多奥运冠军时，当国家体育总局官员批评冬奥会冠军周洋不感谢国家

时，体育和政治已经天然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体育事业，更蒙上了浓重的政治化色彩。

爱尔兰科克大学亚洲研究院院长凡红和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讲师 Zhouxiang Lu 在本书中，按照时间顺序检视了在历史、政治和社会语境下的中国体育。他们探讨了中国体育发展复杂的时代背景，比如“两个中国”、冷战、文革等造成的影响，也挖掘了体育政治化的表现，比如体育政策和实践的苏维埃化和体育外交、体育军事化。当然，中国参加亚运和奥运，从屈辱战绩到耀武扬威的历史也被写入了书中，不可回避的还有政治与不光彩的兴奋剂策略等。像北京奥运这样的重要时刻，无疑是展示中国实力的一个大好平台。前任外长杨洁篪就曾经在 2009 年的记者会上说过，把奥运会搞好，2008 年的中国外交就成功了至少一半。

两位作者分析了体育与外交、政治、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尤其关注体育在中国崛起的过程当中扮演的角色。体育政策制定者、奥运奖牌获得者和普通国人都是他们的访问对象。

《The Party Line: How the Media Dictates Public Opinion in Modern China》

著：Doug Young

曾经是路透社记者、现在任教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阳歌在

《The Party Line: How the Media Dictates Public Opinion in Modern China》一书中揭示了中国官方媒体的本质角色。中国有 13 亿人口,但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对形形色色的问题抱有惊人相似的观点,因为他们从中国政府严格控制的官方媒体那里获得的信息也惊人的一致。

在中国,信息这样流动: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最上层媒体代表官方给出统一口径,然后往下到达地方媒体,最后释放同样的信息。这样一来,中国人似乎就能在国内外众多事件中保持相同的“志趣”。阳歌认为,官方媒体不仅仅影响了舆论,更是在“创造”舆论,从西藏问题、台湾问题、环境问题、中美贸易关系到 SARS、北京奥运,挑选出的这一小部分案例已经足以阐明这个规律。

说起阳歌萌生写这个本书的原因,还得追溯到 1980 年代他刚到中国时候的经历。他在接受 CBS 新闻网采访时说,当时他游历了中国多个地方,发现各地的报纸看起来都怪异的相似,无论是上海那样的大都市,还是小县城,报纸头版有领导人的照片,有无聊的会议新闻,“有一种奥威尔的感觉”。后来他成为了一名记者,才慢慢开始了解中国的媒体如何运作,也就找到了相似信息流动的规律。

不过,阳歌也承认,现在中国媒体已经非常多元,从传统的党报到风格类似西方的杂志都有,记者队伍也分化得厉害。另外,

信息在互联网的流动使得这个畸形的系统出现了一些转变的迹象，网民们可以扮演政府监督者的角色，比如给穿戴奢侈的官员找茬。

政见专题——政好读书

政好读书

2012 私人阅读书单

在刚刚过去的 2012 年里,你们读到了哪些社会科学类的好书? 这里是我们提供的一份书单,汇总大家的阅读经验。

“政见”团队成员将晒出他们的年度最佳,学界业界的老师们也将给出他们心目中最佳图书的推荐语,我们同时接受读者们的投稿。

《国家为何失败》

作者: 达龙·阿塞莫格鲁; 詹姆斯·罗宾逊

出版: Crown Business, 2012 年 3 月

推荐人: 李华芳 (美利坚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大龙他们 (Daron Acemoglu 和 James Robinson) 的书《Why Nations Fail?》大气磅礴,系统反驳地理因素论、文化决定论和领导无知论,回应的却是斯密提出的老议题: 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些国家穷? 答案是制度能否允许人参与分享权力,能否对人产

生经济激励,至关重要。中间对中国的分析尽管简洁但力道十足。这本书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正面的评价就不说了,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背书推荐。也有像福山、萨克斯这样重量级的批评者。

作为一个资深 #翻书党# 人,我想和大家说一句,真正值得读的书其实并不多。一本好书或许不在于取得一致的赞扬,而是在一群聪明人中引发争议。所以我的年度之选是《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消散的现代性》

作者: 阿尔君·阿帕杜莱

译者: 刘冉(政见观察员)

出版: 上海三联书店, 2012年8月

推荐人: @立早君_ (香港中文大学传播学博士生)

阿帕杜莱以此书与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展开对话,他沿用了“想象”一词,作为思考全球化的文化维度的关键概念:想象不只是私人化的,亦可为集体行动提供能量,以此观之,它亦是一种社会事实——个体意志通过现代神话可以超越和重构日常社会生活。受电子媒体的“脱域”效应与大规模的跨国人口迁移的共同影响,全球的文化想象不再囿于传统的“民族—国家”

的框架,而成为任何一种身份政治 / 族群认同的基石。在后民族秩序时代,且看阿帕杜莱将种族、技术、媒体、金融、意识形态五大配料丢进现代性这口锅,煮出怎样的“想象的世界”?

《党员、党权与党争》

作者: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出版:华文出版社,2010年11月

推荐人: @jinger0536 (新浪微博网友)

《党员、党权与党争》,王奇生先生所著,“摸国民党的脉,诊共产党的病”,要了解中国政治,最好的参考莫过于同根同源的国民党了,看看国民党经历了什么,深思如今的中国,大有裨益。

《希特勒的私人图书馆》

作者:提摩西·赖贝克(美国学者,曾任教于哈佛大学)

译者:孙韬

出版:金城出版社,2012年12月

推荐人: @倦眼书生 (新浪微博网友)

通过藏书去窥看一个人的思想,从未曾有人像赖贝克一样用

这么枯燥的学术考据做这么有趣的事情，那些被你读过的、废弃的、或是珍藏的书，倒映的其实都是你内心剧烈的情感激荡，作者从希特勒藏书的冰山一角出发，试图通过这一点来告诉我们一个我们心中的“恶魔”是怎样炼成的。过程结论有些枯燥，但手法创意很是有趣。

《1968——撞击世界的年代》

作者：马克·科兰斯基

译者：程洪波；陈晓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10月

推荐人：康夏（参差计划创始人）

这是2012年我的一本索引书，和同样喜欢以年份为线索写作黄仁宇不同的是，这本书并不像《万历十五年》一样专注于公元1587年的中国明代社会历史，它的叙述横跨美国、德国、西班牙、墨西哥，俄罗斯，日本、巴西、英国跟中国，事件涉猎革命，战争，暗杀，选票，悼念，民权与嬉皮士的最后年代，把整个1968年的人类历史牵系成为一条逻辑暗合的线。

肯尼迪说，“几百万个从勇气和力量的中心泛开的小涟漪交叠在一起，就会汇集成一股洪流，冲垮最强大的压迫之墙”。就像书序里讲的一样，“1968年是黑鬼变成黑人的一年，1968年对女

性来说是重要的一年，1968 年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把诗歌当回事的一年…… 马克·科兰斯基非常热衷于用这样刚烈简洁的句式开头，仿佛只有这样暴力式的行文才足够给劲”，作者马克·科兰斯基在试图以一种几乎暴力式的叙述方式，横刀竖砍地勾勒出混乱、疯狂、矛盾的 1968 年，字词之间张力十足。

之所以讲它是我的索引书，是因为读过这本之后，就按图索骥地又继续读了马克·科兰斯基 2007 年的 Dayton 文学和平奖获奖作品 *Nonviolence: The History of a Dangerous Idea*，还有 1997 年由一条鳕鱼写出世界历史的 *Cod: A Biography of the Fish That Changed the World*，2012 年，这本书让我看到历史叙述经行在有意义和有趣之间的平衡方式，谨此推荐给政见网各位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中国的自由传统》

作者：狄百瑞（前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出版：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年 9 月

推荐人：于灵歌（“政见”团队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生）

洛克、密尔、哈耶克、罗尔斯…… 西方自由主义的盛行，深深影响了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价值观。中国有自由主义的传统吗？狄百瑞先生就中国宋明理学的传统讨论中国思想中的自由主义特

质。本书是其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的演讲集，书中论及新儒学“学以为己”的个人自发色彩，从乡约制度与朱熹的博学倡议中强调君子自求得道、推己及人、相互存敬的精神，从黄宗羲的自由思想中看明代士大夫自任于天下的责任感。在书的最后，狄百瑞指出传统自由思想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局限。本书名为讨论“自由主义”，但并不是单纯用西方观点套用在中国历史上，而是强调回归中国历史传统本身找寻新的经验，给当代以新的启示。

《转型社会的研究立场和方法》

主编：李友梅；孙立平；沈原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3月

推荐人：张跃然（“政见”团队成员，杜克大学学生）

当下中国，正走在一条世所罕见的社会转型道路上。在这前所未有的转型历程面前，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显现出无力性和局限性。层出不穷的现实“怪象”逼迫社会科学不断调整自身，打破陈规，拓宽视野，从而将人类认知的边界一点点向前推进。

这本书旨在揭示：中国的转型社会研究需要不同于以往的研究立场与方法，需要社会科学界掀起一次大变革。书中萃集的文

章,均来自于社会发展与转型领域的著名学者。他们从不同方向,为“新的社会转型研究”探寻可能性:研究者积极介入干预、强化实践取向、打破价值中立……这些迥异于传统社会科学研究原则的“异端邪说”,有望将中国社会转型研究带入一个新的高度。

《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勿忘国耻)

作者:汪铮(美国西东大学教授)

出版: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

推荐人:赵蒙眇(“政见”团队成员,香港中文大学新媒体系学生)

今年看的新书里,印象最深的是汪铮老师的《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勿忘国耻)》。从鸦片战争到战后重建,从北约轰炸到汶川与奥运,现代中国的每一次转折都是建构集体记忆的绝佳素材。作者通过对会议记录、新闻报道、历史教材等的内容分析证实:国家通过宣传机器的强大作用,将精心选择的政治语汇与过滤后的事实一起烹煮,从而一方面强化了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成功动员起大众的民族主义心理。当历史缠绕上政治权力,真实历史已然被塑造成第二历史。而民众对于第二历史的信奉,是中国崛起的叙事与现实下不容忽视的一个面向。

《囚室之春》

作者：施明德

出版：寶瓶文化，2006年9月

推荐人：许知远（作家，媒体人）

台湾民主运动主要人物施明德一生中坐牢超过25年，其中有13年的时间囚禁独居房。监狱是一个以空间换时间的地方，怎样面对空间的急剧缩小？这种特殊的环境能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很多问题。

《甲骨文》

作者：何伟

出版：八旗文化，2011年6月

推荐人：苏颢云（“政见”团队成员，密苏里新闻学院学生）

我推荐何伟（Peter Hessler）写的《甲骨文》（Oracle Bones）。

《甲骨文》是何伟中国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一个外国人写了本关于中国的书，这一点都不稀奇。然而何伟书写的是一个我再熟悉不过、习以为常却其实知之甚少的中国。他书写了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对于人情世故的观察与描写琐碎却不失深刻。书中

线索复杂而凌乱，像极了这个变化太快，高深莫测的国家。

我不敢说他的笔锋触及了中国的内核，可是读罢怀有深深的羞愧：对于自己的祖国，我是否曾经竭尽全力地去了解、探索、剖析过？对于身边来来往往的人们，我是否真的好奇过他们各自不同的思想与灵魂？

仅此一点，我感激何伟那么耐心地展示了他的视角，他的思考。

《审查历史》

编者：劳拉·赫茵；马克·塞尔登

出版：社会文献出版社，2012年6月

推荐人：吴瑶（“政见”团队成员，南方都市报记者）

本书讨论了日本、德国和美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和审查问题。其中，以二战和越南战争为代表，如何讲述战争成为最核心的议题。是反思民族主义，正视人性当中不光彩的一面，还是为国家利益辩护？伴随着战争史叙事而出现的诸多问题在两位编者看来“直切国家观和公民观的核心”，它将决定国家的未来走向和地区局势。

因此，这本论文集探讨的其实是政治与历史的关系——政治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历史教育的内核，塑造出国民的历史记忆和

历史观,两者正是国民身份认同的基础,这对于社会的维系和发展至关重要。从这点上来说,本书与美国西东大学怀特海德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汪铮的“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勿忘国耻》)有着相似的初衷,只不过后者剖析的是中国的历史教育。两书对比阅读,理想的历史教育的轮廓将更为明晰。

《中国政治制度史》

编者:左言东

出版: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

推荐人:刘岩川(“政见”团队成员,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政治经济官员)

比《资治通鉴》更简短,比《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更厚重。虽然对历史细节的详实描写偶尔让读者感到乏味,虽然对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频繁引用时常让读者感到疲倦,左言东的《中国政治制度史》仍然抓住了一条有趣的历史线索:中国古代的诸侯列国,闭关自守、拒绝改革、并且由权贵阻碍社会进步者亡;对外开放、招贤纳士、不计谏言人出身卑微而推行变革者昌。

纵观历史,刚刚享受了改革红利的当权者,往往在新兴权贵或旧势力的胁迫下,牺牲了改革家甚至改革本身。因此,旧时代的改革者无不面临着权贵的反扑,以及随之而来的身败名裂、人头落地的危险。如今,改革之谈再起,今日中国是否已经逃脱了

历史的窠臼呢？

《Does Peacekeeping Work》

作者：Virginia Page Fortna

出版：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年7月

推荐人：周航（“政见”团队成员，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助理）

21世纪以来，维和行动获得国际和地区组织的青睐，成为解决内战冲突、恢复和平最常使用的政策工具。然而，维和部队90年代“兵败”卢旺达和索马里的阴影仍历历在目。维和行动真的能如其名维持和平吗？倘若维和行动本身的有效性尚未得以证实，政策制定者对维和行动的再次热衷为内战国家带来的恐怕不是和平的曙光而是再次重复的历史悲剧。

这本书通过缜密的定量研究对这一疑问给出了答案。作者的研究并未仅仅停留在回答这一“是否”的问题之上，而是透过在数个内战国家详尽的田野调查，尝试揭示维和行动是如何具体影响交战双方的动机与行为，从而影响国家战后的持久和平。本书重新审视了当下的维和行动热潮，其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设计也为冲突调解研究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范本。

《只是孩子》

作者：帕蒂·史密斯 (Patti Smith)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

推荐人：绿茶 (书评人)

帕蒂·史密斯是我最喜欢的摇滚女歌手之一。这本书是她的自传，记录了她从懵懂的少年时代开始在纽约闯荡的经历。在那里，她与同是懵懂少年的罗伯特·梅普尔索普相识并展开一段恋情。后来，帕蒂·史密斯成为“朋克教母”，罗伯特则成为著名的前卫摄影师。

书中不仅记录了个人故事，也反映了70年代纽约的摇滚文化、地下文化。这本书曾获得2010年美国最高图书奖“美国国家图书奖”。

《Ghetto: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世界中心的贫民窟)

作者：麦高登 (Gordon Mathews)

出版：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年6月

推荐人：李大岩 (“政见”团队成员, Sarah Lawrence College 13级)

时代杂志在2007年将香港重庆大厦评选为“亚洲最能体现

全球一体化”的例子。本书作者以自身人类学的专业背景知识配合长期的田野调查,对香港低端全球化典型地带重庆大厦做了详尽剖析。

作者展示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为了不同目的来到重庆大厦后,面对的文化冲击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从非洲商人到东南亚餐饮业者,再到政治庇护寻求者,重庆大厦里少数族裔间的互动、心态和梦想在作者的描述下十分饱满。除了展现重庆大厦里多元文化的交流、互动和冲击,该书亦为跨文化交流和全球化背景下无国界移民所带来的问题提供了一些解决思路。

《The Uyghurs》

作者: Gardner Bovingdon

出版: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年8月

推荐人: 励轩 (“政见”团队成员,印第安纳大学中欧亚研究系博士生)

Bovingdon 教授本人精通汉、维、哈三语,从 90 年代跟随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教授读博时就已开始研究新疆,该书是他的第一本专著。

Bovingdon 教授认为,无论是中国官方还是维吾尔民族主义者都利用历史来为现在的政治诉求服务。官方编写历史的时候,努力证明汉人很早就已定居新疆,从而暗示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

国一部分；维吾尔民族主义者则在历史书中声称维吾尔人定居新疆六千年，以暗示新疆是维吾尔人的。Bovingdon 还认为造成新疆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在于名不副实的自治，维吾尔人在这一制度下实际上处于他治 (heteronomy) 状态。此外，Bovingdon 还提出，境外流亡维人组织势力较弱，且只有极少部分人认可暴力，他们也难以进入新疆发动恐怖袭击。

如果要全面了解新疆存在的问题，此书值得一读。

《Mao's Invisible Hand》(毛看不见的手)

编者：韩博天 (S. Heilmann)；裴宜理 (E.J. Perry)

出版：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1 年

推荐人：陶郁（“政见”团队成员，牛津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

在连“告别革命”都已不再会被认为是一种新思潮的今天，革命似乎早就固化成为了国人头脑里一帧发黄褪色的陈年旧画。但是，韩博天、裴宜理和他们的七位同事却极富洞见地指出：革命遗产依然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当下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方方面面。

无论曾经习惯使用“激扬”还是“血腥”来形容革命，无论曾经偏好选取“进步”还是“破坏”去标记革命，跟着这些社会科学研究者重新审视几十年前的那段历史，你都不得不承认：党在

革命年代所形成的许多政策风格，原来一直在你我身边从未走远。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被化用作销售美食手册的广告词，当你死我活的残酷厮杀被凭着想象改编成荧幕上缠绵悱恻的爱恨情仇，在这个盛行解构革命的年代里反潮流地认真思考革命，或许不仅是茶余饭后的一大快事，也是认识现在和预见未来的一条途径。

《Challenges to Chinese Foreign Policy》（中国对外政策挑战）

主编：郝雨凡；魏楚雄；罗德明（Lowell Dittmer）

出版：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9年

推荐人：宿亮（“政见”团队成员，新华社记者）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所以受到全球瞩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作为一个图像性的标志象征着中国成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关于中国外交的讨论也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甚嚣尘上，西方观点与中国观点终于出现了交锋，遗憾的是，双方自说自话的沉疴依旧。

本书收录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具有海外研究、教学经验的8名著名学者的文章，分别就他们所研究领域进行论述，其中不乏宋新宁、郝雨凡等大家。书中对“和平崛起”及其深层含义进行解读，归纳世界观察中国外交视角观点的演进，同时针对性地分析中国对美国、欧洲、日本、俄罗斯和其他亚洲诸国的外交战略。

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在西方学者力图通过历史和理论方法论分析中国的同时，中国学者用同样学术方法予以回应，用西方学界能够听懂的语言贡献了中国人关于外交和国际关系的研究成果。

《正义的理念》

作者：阿马蒂亚·森

译者：王磊；李航

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

推荐人：柏蔚林（时评人）

如果把福利经济学派视为经济学对自身学术价值取向的调整，阿马蒂亚·森就是这种调整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森的盛名与学术成就并不仅仅来自于多年的职业积累，更在于其思想的前瞻性与革命性。通过对饥荒与贫困的研究，森提出的理论框架对以往占据统治地位的各种话语提出了挑战，并大大拓宽了这一特定研究领域的视野。通过他的研究，我们对于人类贫困现象的认识，跳出了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框架，并上升到了伦理与政治哲学的层面。

从十年前的《以自由看待发展》到今天的《正义的理念》，代表了森学术思想不断的飞跃。目前中国国内贫困问题已经日渐浮

出台面,而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进展缓慢。在这种情况下,森的思想尤为值得重视。

《市场、阶级与社会——转型社会学的关键议题》

作者:沈原

出版: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7月

推荐人: @魏振铎(新浪微博网友)

这本书不仅有转型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概述,探究市场、阶级(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且最终将研究的焦点置于中国的工人阶级,关注农民、农民工、城市有房阶级。作者提出:通过社会学者和社会公民的行动干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文明的孩子——布罗茨基论诗和诗人》

作者:布罗茨基

译者:刘文飞

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

推荐人: 杨潇(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作为一名流亡诗人,如何看自己的处境,与往昔的关系,诗歌

与政治,我觉得他表现得复杂敏锐又谦逊。

我是在莫言获奖争议后重读这本书前半部分一些文章的,觉得密度真大,真好。

《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制度变革与结构转型》

作者:肖耿

出版:译林出版社,2012年11月

推荐人:于伊莎(编辑)

制度变革与结构转型,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两个最主要的问题,讨论的人很多,但是很少有像肖耿教授写得那么清楚,条理分明,而且视野开阔。作者用了众多国际比较,使我们对这个问题增添了许多新的认识。

《永不抵达的列车》

编者:杜涌涛;徐百柯

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7月

推荐人:@阿狸凶猛(新浪微博网友)

这本书精选了中国青年报2010~2011年20篇最具影响力

的冰点特稿。在一片纷乱喧嚣中，冰点将目光一次次投向大变革中那些普通的小人物，注视他们被时代裹挟的命运，诉说他们微小的愿望与简单的快乐、深深的无奈与绵长的苦痛。从关注人的命运出发，冰点一直着力维护许多最基本的价值，比如悲悯、宽恕、正义、自由……希冀给沉默的大多数以温暖、勇气和力量。

加入我们

“政见”是一个完全由志愿者组成的团队，成员以国内外政治学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和媒体人为主。我们致力于将理性、深刻、富于启发的政治研究成果介绍给大众。我们相信：志同道合者在一起工作，协力实现自己的想法，是一件快乐而又令人获益良多的事情。我们随时欢迎新成员的加入。在这里，你可以与一群优秀的朋友共事，施展自己的才华。“政见”自身拥有多种新媒体平台，并和国内外多家媒体建立起了（或正在建立）合作关系，可以为你的作品提供广阔的出口。

如果你认同我们的理念，并且能够完成以下几项工作当中的一种或多种，那么你就是我们希望吸纳的新成员——

- ※ 阅读学术期刊或智库报告中与中国政治相关的文章，并撰写千字左右的文章对作者观点予以介绍。（例文：《“重感情”的中国基层政治》CNPolitics.org/2011/12/local-political-participation）
- ※ 联系研究中国政治的国内外学者，进行访谈。（例文：《访法国汉学家潘鸣啸》CNPolitics.org/2012/02/michel-bonnin）
- ※ 对制作中国政治主题的信息图 (infographic) 感兴趣，可以寻找有趣的选题，并进行数据和信息的梳理，拟定制图思路，但不必掌握制图技术。（例图：《图解中国左派和右派》CNPolitics.org/2012/02/left-right）

加入我们的团队之后，你的义务将是定期提供稿件。因此我们希望你每周能有一定时间用于“政见”团队的工作。我们没有收入，因此没有办法为你支付薪酬；但如果作品被合作媒体选用，你可以得到稿酬。

有意加入者，请发送简历和 1-2 篇作品至 Webmaster@CNPolitics.org，作品的类型须从上述三类中选择。来邮必复。期待你的加入！如果你对“政见”的发展有其他方面的想法，也欢迎随时联系我们！

政见 CNPolitics.org © 版权所有

新浪微博：@政见CNPolitics

腾讯微博：@政见

网易微博：@政见CNPolitics

人人小站：zhan.renren.com/CNPolitics

Google+：+政见CNPolitics.org

欢迎投稿推荐或自荐研究成果！

联系邮箱：Webmaster@CNPolitics.org